

炎黄春秋

第 **1** 期
2011年

胡启立：耀邦诞辰95周年感言

长征“密电”问题的来龙去脉

习仲勋冤案始末

论表达权与言论自由

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

目 录

新年献词

- 1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本刊编辑部

本刊特稿

- 2 人生·人格·人心——耀邦诞辰95周年感言 胡启立

求实篇

- 4 习仲勋冤案始末 贾巨川

- 11 长征“密电”问题的来龙去脉 夏宇立

- 17 “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 雷 颐

- 22 胡乔木词与杭州毁墓拆碑 毛德传

春秋笔

- 25 肥东县大李大队1960年饥荒调查 管怀伦

- 31 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 尹曙生

一家言

- 36 我看“中国模式” 杨继绳

- 43 论表达权与言论自由 郭道晖

- 48 错案探究：公权无界与私权无助 魏兴荣

往事录

- 51 逃港潮与相关政策变迁 王 硕

- 56 池东明炮打张春桥 卞 权

沉思录

- 60 1980年代思想启蒙感言 符利民

- 63 “史民文化”与“史官文化” 黄一龙

怀人篇

- 65 潘复生晚年一席谈 赵宗礼

- 69 黄宗江的新居 沙 漠

- 71 女书法家冯铸 礼 谦

亲历记

- 73 我国首枚地对地中程弹道导弹常规弹头研制纪实

..... 王菁珩

- 79 1945年8月：牡丹江焦土之战 闫 强

- 84 一个被俘志愿军战士的自述

..... 王二根 口述 李文林 整理

- 89 《故事报》的“精神污染”案 高跃男

品书斋

- 91 读《茂林悲歌》 刘谓福

编读窗

- 93 再谈毛泽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起草者

..... 高 放

- 94 来信摘登 王友琴等

顾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宏遵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保育钧 郭道晖

资中筠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副 总 编 辑: 徐庆全

社 长 助 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经 理: 李 晨

副 总 经 理 兼 网 络 总 监: 张晓鸥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 白建钢

秘 书 长: 吴 思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淞赵晖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本 刊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 68525374 办公室: 68522852

传 真: 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8.00元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本刊编辑部 / 文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提法符合国情，顺应民意。我们完全支持这一提法。

为什么把“积极”放在首位？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邓小平在1986年就说过：“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25年后重读这段话，倍感深切。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权力缺乏制衡，今日中国的公权腐败已经让社会难以忍受，成为全民感到剧痛的社会癌症。权力进入市场，参与或控制了市场交易，就不可能有公平。腐败，不公平交易，使得社会财富向有权力的人集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由于行政权力过度干预经济和社会，底层百姓提高社会地位的通道堵塞大半，社会阶层趋于固化。近30年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原有的增长方式不可能持续。而增长方式难以改变，其深层原因还是政治体制。以上种种，使得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加，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

社会矛盾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快，社会矛盾的积累速度就慢；政治体制改革速度慢，社会矛盾的积累速度就快。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矛盾就会快速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有可能出现爆炸式的危机。因此，对政治体制改革持消极态度，会把中国推向危险的地步。这正是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涵所在。

怎样才是积极的态度呢？首先在改革目标上要尽快取得共识。要取得共识，就得允许人民讨论。退一步说，如果在总目标上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可以先落实邓小平在1980年代讲过的和在以后各次党代会通过的政治改革承诺。如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解决权力不受制衡的问题，确保党在宪法限定的范围内工作，扩大党内民主等。不采取具体措施落实这些已经通过的决议，显然不是积极的态度。在落实这些的基础上，对一些有利于民主的改革应该积极推进。例如放松舆论控制，落实宪法给予的公民

言论自由，按层级逐步废除干部任命制，让民众选贤任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赋，等等。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执政集团的作用当然十分重要。但每一位公民也责无旁贷。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民主就需要用个人权利来制衡公共权力。一种好的政治制度是各种力量均衡的结果，不是按照某种政治理想设计而建立的，也不是等待某一位英雄哪天一个命令就能建立的。权势利益集团只有感到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妥协。所以，发展民间民主力量，加速民间力量的成长，才是最为关键的事。专制和独裁只有在大多数民众的公民责任心没有觉醒的条件下才能存在。进行公民教育，唤醒公民的权利感和责任感，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紧迫的任务。

作为知识分子，既要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也应当有建设性。要尽可能从现有体制内部实现和平转型。既要大胆揭露和批判公权的腐败方面，也要维护政府善治的权威。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稳步演进，是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最好途径。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风险的。为了把改革造成的震动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限度以内，必须稳妥。所谓稳妥，就是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所谓激进，就是改革方案脱离现实太远；所谓急切，就是改革的时间表安排得过于紧迫。中国近百年来吃激进和急切的亏太多了。激进和急切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社会失去控制，处于无政府状态，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混乱、建立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会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堕入暴民和暴政相互交替的恶性循环。

民主化，市场化，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也是中国必须完成的两项任务。今天，市场化已有了一个框架，而民主化还有遥远的距离。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的先驱做出了重大选择。建立民主制度是先驱们百年来的梦想。我们在纪念这两个重大节日的时候，也得有前人那种勇气，把民主化大胆地提上日程，把先驱们的梦想尽快变成现实。



胡耀邦(1915-1989)

人生·人格·人心

——耀邦诞辰 95 周年感言

胡启立 / 文

饱经风霜, 历尽磨难, 九死一生, 但他始终矢志不渝, 痴心不改。他对人生目标和人生道路的选择, 使他平凡的人生注入了伟大的内涵, 提升了他的生命的质量和高度, 使他整个人生变得厚重而博大, 从而青史留名, 影响了千百万人的生活道路。

近二十年来, 我常想, 在耀邦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结构中, 他有别于其他人, 即他独特的人格操守和道德准则是什么呢? 我想, 如果归结到一点, 那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天。纵观耀邦的一生, 他全部的思想与实践, 他终生的追求和坚守, 一以贯之地充盈和激荡着一种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民至高无上的道德精神。可以说, 这是他人生的基石和支点。

正是立于这个基石和支点, 形成了他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胆略。他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 果断平反冤假错案, 诚恳吁请小平出山, 奋力推进战略大转移, 披肝沥胆推动全面改革开放……一桩桩, 一件件, 无不顺应历史潮流, 无不顺应党心民心。在这过程中, 明枪暗箭, 凄风苦雨, 蜚短流长, 他全然不顾, 坚持道义担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党内和社会上开始出现消极腐败现象, 引起了人民群众的议论, 也引起了耀邦高度警觉和重视。耀邦率先旗帜鲜明地提出, 要抓大案要案, 端正党风, 要从自己身边抓起、从中央抓起, 并以此为题, 在首都八千人大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这件事震动之大, 得罪人之多, 老实说, 我当时是为耀邦捏一把冷汗的。但耀邦是义无反顾。他忧心于党的前途命运。我至今记得, 八千人大会后, 一次陪耀邦在中南海散步, 耀邦对我说, 贪污腐化, 以权谋私能否制止, 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他一连用了三个“最”, 说要用“最大的决心, 最大的毅力, 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 坚持到底。他说, 抓这件事不能讨好, 不能怕得罪人, “宁可一家哭, 不可一路哭”, “宁可得罪个别人, 不可

岁月如水, 逝者如斯。转眼间, 耀邦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一年了。

二十一年, 二十一个春夏秋冬, 我们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耀邦, 经常情不自禁地谈起耀邦。

二十一年, 二十一番花开花落, 我们仍清晰地感到, 耀邦从来就没离开我们, 他依然鲜活地生活在我们中间, 无时无刻不和我们在一起, 共忧患, 同凉热。

二十一年, 世事沧桑, 变化之大, 让人有如隔世之感; 但在岁月的长河中, 依然流淌着的, 是人们对耀邦的不尽思念, 是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不倦思考和探索。

今天是耀邦诞辰九十五周年, 我无意去谈耀邦一生的伟大历史功绩、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这样宏大的话题, 只是把他作为一个人, 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来解读、体察和感悟, 就此谈一点个人感想。

人生如旅。人的生命是一个既长又短的过程。

人, 生而平等。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布衣百姓, 是豪商巨贾还是贩夫走卒, 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然而, 人各有志。道不同, 志不同, 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命轨迹, 从而使具有相同生命的人, 人格有高低之分, 人品有好坏之别, 人性有善恶之辨, 人生有成败之论。

八十年前, 十多岁的耀邦从湖南浏阳的山村农舍走出, 投身到为中国大多数人谋幸福、求解放的事业中来, 为此孜孜奋斗达六十余年。其间

得罪十亿人！”他还用一种凝重的语气对我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今天，重温这番话，真让人感慨万千啊。

正是立于这个基石和支点，造就了他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在耀邦身上，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作风是强烈而自觉的。一九八二年，我在中办当主任，一次去看望叶帅。叶帅特别关心地问：政治局、书记处的民主集中制坚持得怎么样？我回答说，耀邦同志非常民主，他能听进各种不同意见，所以大家都能畅所欲言，重大问题都能反复讨论，最后形成决策。叶帅听了很高兴，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直到现在，很多同志还留恋那一段党内形成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内外一致公认，耀邦任总书记时是党内民主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

正是立于这个基石和支点，养成了他的清廉作风和求实精神。在耀邦心目中，人民利益重于泰山，人民呼声重达千钧。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很注意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关注民生，体察民瘼，倾听民声，尊重民意。他和广大老百姓的心贴得很近，很紧。在总书记位置上，他亲自批阅新华社内参数千件，足迹遍于全国一千多个县。想不到，这一点后来被一些人指责，竟成了他的所谓“错误”。

正是立于这个基石和支点，锻造了他的坦荡胸怀和磊落性格。耀邦一生襟怀宽广，光明磊落，对同志、对朋友、对上下级，从来开诚布公，坦诚相见。他心里想的，口里说的，手里做的，是一回事。真的是心口一致，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他至真至纯，有时近乎天真的程度。他在政治风浪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一点也不世故圆滑。他几乎不知阴谋、权术、机巧、算计、出卖、诬陷为何物，以至自己被算计了，也不失本性，不改一颗赤子之心。他心里始终充满了阳光，这阳光温暖了自己，也温暖了别人。连反对他的人都承认，耀邦是个品德高尚、光明正大的人。

正是这样一种崇高的精神，博大的胸怀，优良的品德，坚定的操守，构成了耀邦特殊的人格。耀邦是人不是神。他也有缺点和错误。但他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从不自以为是，更不自诩为一贯正确。这就是耀邦的魅力所在。

人的一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耀邦一生也曾面临各种选择。但我们看到的是，他在邪恶面前选择正义，在逆流面前选择真理，在风浪面前选择坚定，在高压面前选择抗争，在得失面前选择良知，在误会面前选择理解，在后进面前选择善意和提携，在差异面前选择比较和包容……正是这样一次又一次选择，使他一生在心灵上和肉体上深受戕害，失去了许多、许多，但与此同时，他却赢得了人世间最稀有的珍宝——人心，赢得了亿万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和信赖。有人说，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知，是共产党的形象代言人。对此，耀邦是当之无愧的。

世上公道自在人心。位高权重，万人仰视，可以得到表面上热烈的掌声和客气的笑脸，但不一定得到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如水乳交融般的感情；银海金山，富可敌国，可以买到香车宝马，豪宅盛宴，却买不到知识、品德和人格；哗众取宠，表面文章，可以哄人于一时，但换不到真心的拥护和信赖。

人心可贵，人心难得。人心得失，存亡攸关。心是要用心来换的。只有你把一个滚烫的心捧出来，奉送给人民，人民才能把真心交给你。公道可贵，公道难得。公道不在庙堂在草野，不在史书在人心。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后人铭记即不朽，活在人心变永生。

耀邦用他一生的实践，演绎和诠释了人生、人格、人心的全部真谛，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座丰碑。

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就是长期在耀邦手下工作。我是受他影响和教育最多，精神上、心灵上受惠得益也最多的人之一。早先我对这一点感觉并不十分强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生阅历的积淀，这种感受就越加分明，越加深刻。

追随耀邦的脚步，牢记他的教诲，以他的人生为标尺，以他的人格作典范，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是我的心愿。

让我们祝愿耀邦忧国忧民之心在九泉之下能够安宁。

愿我们所有人、健在者、后来者都学习耀邦，把人生的路走好！（责任编辑 杨继伟）

习仲勋冤案始末

贾巨川 / 文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9月24日至26日又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从北戴河会议起,遭到康生等人诬陷,被加上了“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种种莫须有罪名,立案审查长达16年之久,制造了少有的株连数万人的旷世文字冤狱,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终由党中央予以彻底平反昭雪。

祸起萧墙

7月25日开始的北戴河会议议题是:讨论有关包产到户问题在内的农业、粮食、财贸、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到了8月5日、6日,毛泽东先是在华东、华小组会议上开始吹风,继而在大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正式讲话,接着又于9、11、13、15、17、20日的6次中心小组会议上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的讲话观点。他把党内一些认识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一些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言论,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由此,会议即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阶级和阶级斗争也自然成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

习仲勋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在此期间,他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习仲勋在座谈会结束以后,去北戴河休息一些日子。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于7月30日开始举行,8月24日结束。会后,习仲勋即按周恩来安排到北戴河休息。

同一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结

束。这时,习仲勋没有想到,一场政治厄运正在向他一步步地逼近。

在刚刚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开始给他罗织罪名,并把他和曾经共同驰骋西北战场的彭德怀元帅与所谓“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习仲勋冤案的发端,是彭德怀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公正地审查和处理自己问题的长篇申诉。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遭到错误批判和处理,但在后来贯彻调整政策,为“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打击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的过程中,彭德怀问题没有得到平反。刘少奇在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会”上,讲到为什么要肯定庐山“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时说:“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91页。)“都有国际背景”(同上)、“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同上)。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当时插话补充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当他知道在会上再次受到批判以后,即拍案而起,连声喊道:“诬蔑!诬蔑!”他不得不对强加给自己“里通外国”这一莫须有罪名,进行辩解和申诉。4月16日,彭德怀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递交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他不承认自己有“阴谋篡党”的问题,不存在“彭德怀、高岗联盟问题”;不存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自己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的军队建设,不能得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论”。8月22日,即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彭德怀再次致信毛泽东、党中央,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这两封信又

被认为是彭德怀利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和国内发生了困难而借机翻案,是向党的新进攻。8月5日,毛泽东点名批评彭德怀: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参加会议的一些同志也认为,彭德怀逼着中央全会来讨论他的问题,是向中央挑战。由此引发起一场气势不亚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对彭德怀所谓“翻案风”的激烈批判。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甚嚣尘上的声浪中,出人意料地又多出了一个杂乱的音符。

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同时结束。这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听到了有关《刘志丹》小说的汇报,即利用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和刘的妻子李建彤,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4页。)习仲勋是“翻案风”中又一个“挂帅人物”。当天,康生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说《刘志丹》小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096页。),并要求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由此,习仲勋的人生经历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审查、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岁月。

一部小说辨浊清

1962年8月26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在北京举行。习仲勋在北戴河休息了两天之后,便回北京参加八届十中全会。这时他的心情是愉快的,对于康生在北戴河会议上已将斗争矛头对准了自己的情况及其险恶用心,没有丝毫的察觉和心理准备。

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先期重点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两个文件,批评了所谓“单干风”,接着讨论了国际形势和有关文件。9月6、7日,6个小组



习仲勋(1913-2002)

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并把《刘志丹》小说和习仲勋联系起来,作为“翻案风”的另一个批判对象。

9月8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议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后来又说是‘第一作者’,‘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中心的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迅速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于是,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同上)。

9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反党集团”,进而又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又称之为“习、贾、刘反党集团”,说《刘志丹》小说就是这个集团的反党纲领。进而把习仲勋说成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是“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页。)

在这种不正常的批判中,性情率直的习仲勋郑重地向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与《刘志丹》小说的来龙去脉。

《刘志丹》小说的写作时间要追溯至1956年之前,当时工人出版社把这部小说列为他们的选题计划。并约国务院监察部主任监察专员后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李建彤来写。由于李是刘志丹胞弟刘景范的妻子,也是延安时代的老同志,且有早期文学创作经历,所以工人出版社认为请她来写有许多的便利,特别是主人公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工人出版社认为作品题材重大,因而对作品的写作抓得很紧,并派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何家栋指导写作。李建彤开始也有思想顾虑,认为这部书题目太大,思想、艺术上都没有准备,特别是同刘志丹相连的是一段复杂的西北革命斗争历史怕拿不下来。习仲勋当时对以上情况还是闻所未闻。

李建彤为写好这部作品,专门请了创作假,与工人出版社的编辑一起先后在北京和陕西走访了300多位老同志,在陕西省档案馆和西北党校党史资料室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作者知道习仲勋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担任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刘志丹早年并肩战斗的战友,便拜访了习仲勋并讲了工人出版社约写小说《刘志丹》的经过。习仲勋表示,“写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同上)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可以作为片断来写,不要写成大部头的小说。

1958年,作者写出以记述真人真事内容的《刘志丹》初稿,继而又改出第二稿。作者在工人出版社编辑帮助下,历时三个春秋最终写成了小说体裁的《刘志丹》第三稿后,便送习仲勋审阅。

习仲勋对《刘志丹》书稿非常慎重。他还特意把工人出版社总编辑、编辑室主任叫去谈话。提出作品要注意思想性、政治性,要能够表现“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何家栋《刘志丹》小说写作的前前后后,2005年3月18日。)习仲勋还当面告诉李建彤:“写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的许多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如果写一些片断的革命回忆录岂不是更好!”(范民新《十六年的苦难考验》(油印

稿),1996年6月15日。)但作者没有认真接受习仲勋的意见,仍坚持要尝试地写出来。随后,习仲勋还约请刘景范谈话说:“最好能劝劝李不要写《刘志丹》小说,她没有参加过西北苏区革命斗争,不是非常了解这段历史情况,不一定能写得好。你是刘志丹的弟弟,建彤又是你的妻子,就是写得很好,也很难避免引起对西北党史分歧意见的争论。特别是对于像高岗这样的历史人物,很难通过小说形式把握得准确。对此,我都有些犯愁,难道你们就没有顾虑吗?”(范民新《十六年的苦难考验》(打印稿),1996年6月15日。)

刘景范听了习仲勋的意见后,表示愿意劝说作者改变想法,但又似乎有点为难地说:“她非要写,我也没办法。”

1959年冬,习仲勋接到《刘志丹》小说修改稿清样,此时他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政务工作异常繁忙。他在粗略阅读了书稿后,仍然感到没有把刘志丹写好,特别是书中涉及一些史实和功过是非问题,在老同志中间存在着不同意见。习仲勋再次表示不同意写《刘志丹》小说。但李建彤还是强调说已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许多老同志如王世泰、张秀山、马明方、马文瑞等都是赞同写的。她已与工人出版社订立了出版合同,工人出版社还派编辑帮助写作。她仍请求习仲勋支持她脱产写作。这时,刘志丹的老战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也劝习仲勋支持《刘志丹》的写作。刘景范甚至颇动感情地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你们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页。)

1961年春夏之际,李建彤又送来了小说修改后的清样,习仲勋实在抽不出时间,即委托秘书田方详细审读并提出意见。田方说:“我是抱着满腔热情来阅读这部小说的,小说主要描写了刘志丹童年及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从接受革命教育及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到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过程;特别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既要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又要和党内‘左倾’盲动路线进行斗争,小说还表现了刘志丹对毛泽东领导红军在井冈山开

展游击战十分敬仰,再三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武装割据的思想;小说还通过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太婆,为刘志丹送鸡蛋,抚摸刘志丹双手的动人情节,来反映革命领袖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还有刘志丹见到党内‘左倾’分子逮捕他的密令后,以大局为重,避免分裂,自动接受‘审查’,而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等情节,非常感人。所以我读完书稿以后,只能对文字和一些技术性问题,提出了意见。”(田方:《习仲勋与刘志丹的荣辱》(油印稿),1996年6月10日。)

习仲勋在听取了秘书对书稿意见以后,先后两次约请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的两位编辑以及作者李建彤本人,就《刘志丹》小说进行座谈。马锡五是歌剧《刘巧儿》中的“马青天”马专员的生活原型,与刘志丹同为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人,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比较熟悉陕北党组织的历史,在陕北的老同志中享有威望。习仲勋约请马锡五也参加座谈,除了希望其能对书稿中某些涉及西北党的历史问题做出妥善处理外,还因为马锡五也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便于和这位老同志共同说服作者。习仲勋在座谈中发表了意见。他说:“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一代’,‘把刘志丹写成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并把这个胜利写成是全国革命斗争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习仲勋还说:“写西北革命,要写整个一个时代。思想呢?就是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刘志丹具体实现。‘左’倾冒险最后只留下一个陕甘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出发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写好。当然也有许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没有大错。最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也完了。”(范民新:《十六年的苦难考验》[打印稿],1996年6月15日。)习仲勋在谈到高岗时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岗的一些主张也是对的。但是,在书中最好不要写他。

座谈会以后,李建彤再次赴陕甘宁革命老区深入生活,并按照座谈的意见,于1962年改写出了《刘志丹》小说第五稿,在送习仲勋等人的同时报送中宣部审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这时已开始发表小说的部分章节。李

建彤一边广泛征求意见,一边作第六次修改,准备正式出版。习仲勋告诉李说,要将修改稿送给那些对西北党史有不同意见的老同志审阅,宁可在出版之前让他们把意见讲出来,发现问题还来得及修改,避免在出版后引出乱子。但是,李建彤有些急,说她已取得中宣部同意,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还指定专人同她联系,作经常性的指导。正巧习仲勋一次在北京长安剧院看戏时与周扬相遇。周扬说,看了李建彤写的《刘志丹》小说样稿,觉得还写得不错,可以出版。习仲勋把周扬的原话告诉了刘景范、李建彤。刘、李自然是高兴的。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转载小说部分章节。他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095页。)阎红彦认为,书中反映的许多重要问题与历史不符,便找李建彤谈话,因为话不投机,发生争吵。阎红彦又从北京饭店打电话给习仲勋,问道:“写《刘志丹》小说你是否知道?”习回答说:“在1960年以前我是不赞成写这部小说的,后来同意了,并要李建彤将小说样本送给有关同志审阅,征求意见后再出版。习仲勋还建议阎再找李建彤谈谈。阎红彦没有再谈,便一面要求有关报刊停止连载小说;一面报告了康生。康生获此情况,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载小说。他并没有看《刘志丹》小说,却武断地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而是反党‘政治纲领’问题,进而穷追不舍,立案审查。”

1962年9月13日,习仲勋给党中央写信,坚决不承认小说《刘志丹》是自己主持写的,坚决不承认康生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但这封信写出后的第二天就在全会的简报上刊登出来。他本想向党中央说明事实真相,为自己洗雪不白之冤,不料却招致批判的进一步升级。39年后,习仲勋秘书范民新回忆这一事情经过时说:“中秋节那天晚上,我正在中南海划船,突然接到电话,让我赶快去习仲勋家中。我去后看到刘景范、李建彤也在座,一起研究给党中央写信问题。习仲勋显然对手里的稿子不大满意,就要我重新来写。我按照大家商量的意见另起草了一封短信,习仲勋修改签名后即送了上去。他当时有一种如释重负之

感,认为事情已经结束了。晚上跳舞时遇上了康生时,他特别说明小说不是我主持写的。但康生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范民新谈话记录,2001年6月6日。)

9月19日,在全会预备会上非常奇怪地公布了高岗的妻子李力群于1959年9月19日写的揭发彭德怀、习仲勋问题的一份材料。这份长达万言的材料是李力群给中央一份重点揭发习仲勋同高岗的谈话内容的信,揭发材料编造了一系列不实之词,涉及习仲勋的主要是有关“陕北救了中央”等问题,说习仲勋在谈话中煽动高岗不满。中央对这封信在当时并未予以理会,却在时隔3年之后公布,它不仅加重了习仲勋的“罪责”,也预示着对习仲勋的批判和审查不会很快结束。

后来,《刘志丹》小说重要当事人之一、曾任该书责任编辑的何家栋回忆说:第一稿出来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弄出来的,弄出来以后就送给习仲勋审查。其实何必去送他审查呢?现在想想,送给他审查就不大对,既然这样的一个事,就应该叫他避点儿嫌疑,可是当时又送去了,而且习仲勋也觉得写了这么一本书还是不错的,还认真地看了,提了些意见。他的意见虽然提得也没有超出常规,因为他还是说要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这实际上还就是毛主席的那些话。(何家栋访谈录,2005年3月18日。)

文字冤狱“莫须有”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志丹》小说问题进一步升级,批判“翻案风”浪潮甚嚣尘上,一个现代文字冤狱的铸成已经在所难免。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理论权威,指康生。)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页。)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与会人员也不得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看待《刘志丹》问题,会议的气氛处于异常紧张和扭曲状态。习仲勋的辩解和发言被视为“不老实”、“和党对抗”,而违心承认又招致没完没了的追逼批判。习仲勋在无所

适从的情况下,找到周恩来,表示向全会请假。他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页。)

习仲勋的请求,得到了中央批准。

但是,八届十中全会并没有因为习仲勋的离开而减轻对他的批判。9月24日上午,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开幕,毛泽东发表讲话时,收到了康生递的一张条子,上面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便在讲话中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他讲道,1959年八届九中全会胜利粉碎了彭反党集团向党的进攻。十中全会又一次揭露彭反党活动高饶反党分子成员习仲勋。又说:“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096页)毛泽东这些讲话不但对十中全会作了错误的导向,而且在以后的数年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被林彪、“四人帮”集团奉为批判“文艺黑线”、扼杀文艺作品、制造现代文字冤狱的“最高指示”,严重影响了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进而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酿成了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

9月24日,即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的第一天,康生建议并经会议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5人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国庆节不上天安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将彭德怀、邓子恢、习仲勋三人的案情定为当前阶级斗争的三个重大事件。9月27日下午,中央全会正式通过决议,分别组成“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和“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任主任,安子文、张达志、王恩茂、刘澜涛、张德生、杨植林、杨静仁、王世泰为委员。委员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由康生、安子文、刘澜涛组成,下设办公室,安子文负责。专委会成立后立即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也是仅有的一次全体会议。康生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全盘审查研究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活动,在适当时

机作出报告,提交下一次中央全会讨论。“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发表意见的人不多。”(刘澜涛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0月1日。)专案审查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即不与被审查者本人见面的秘密审查形式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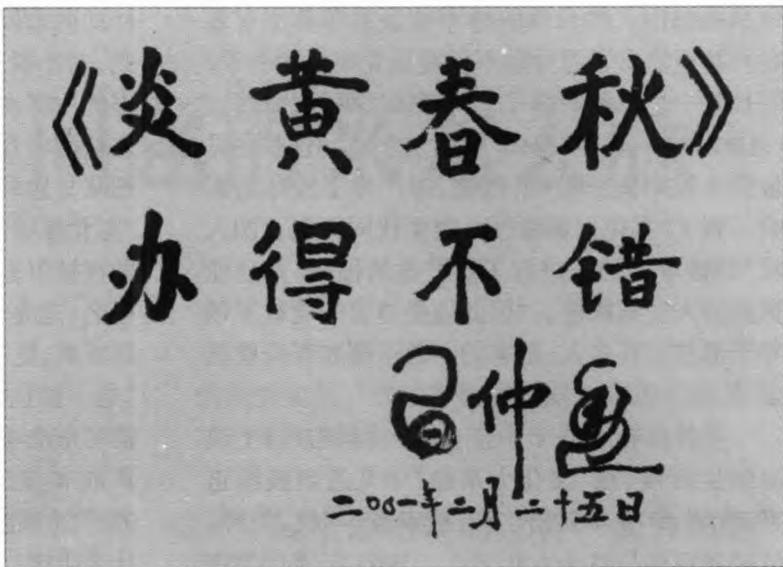
全会在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初步为这桩文字狱所罗列罪状的主要内容是:《刘志丹》小说是“伪造党史”,把陕甘边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小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小说中的“罗炎、许锺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随即,该书的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习仲勋被宣布停职检查。

会后,专案审查委员会指定专人清查清理习仲勋办公室文书档案,习仲勋按规定将所有文件包括历次参加会议的笔记等,全部上交中央。

这场猝然而来的灾难,使习仲勋陷入极端苦恼之中。他回到家中后,整日沉默不语,暗自伤神。这时,周恩来和陈毅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找习仲勋谈话。陈毅快人快语,首先宽慰道:“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周恩来拉住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周恩来、陈毅一番饱含深情的话语,在习仲勋的心头犹如一缕春风拂动,顿时禁不住流下两行热泪。

“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习仲勋诚恳地向周恩来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彭德怀没有出席八届十中全会,但是当他听到在全会上也以“翻案风”批判了习仲勋等人时,心情异常沉重地对妻子浦安修说:“怎么他也出事了,我的问题怎么把他也连累了。”(习近平谈话记录,1996年12月24日。)



《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时,习仲勋为本刊题词

八届十中全会在激烈批判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的同时,也指示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集中搜集一批反党文艺作品迅速上报,一时形成了会内会外到处抓“反党小说”的浪潮。中国作协党组也不例外地进行刊物杂志检查,并决定把一批“毒草小说”报到中央全会,其中包括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短篇小说《访旧》和《月夜清歌》。中宣部还根据康生的指令,追查习仲勋曾批示“同意发表”,刊载于1962年《红旗飘飘》第17期王超北的革命回忆录《古城斗胡骑》。康生说,回忆录所写的地下党机关,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会后即提出这是习仲勋“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党活动”的又一严重事件。

对《刘志丹》小说和习仲勋的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也未结束。1965年春,党中央决定将彭德怀、习仲勋两个专案委员会合并,统一工作。同时决定成立西北调查组,机构设在西北局机关,对外称中央组织部调查组,由西北局一位副书记任组长。调查组集中调查核实习仲勋所谓的“反党活动”。同时,陕西省委和甘肃省委也相应成立调查组,协助工作。这个调查组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于1966年6月撤回北京。撤离之前,调查组就习仲勋专案问题,向西北局书记处作了汇报,提出了极为错误的意见。调查组认为:习仲勋在西北地区执行了投降主义的路线,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搞“投降合作,取消阶级斗争”。编造出习仲勋在高岗死后没有停止活动,要

做高的忠臣，与台湾陈建中有联系等莫须有罪名。甚至提出了习仲勋不仅是反党集团的头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惩处的意见。（刘澜涛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2月1日。）这些意见虽然未被中央所采纳，但是，却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对被审查的人进行了更严重的摧残，并且使更多的人受到株连。“因此而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

习仲勋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因《刘志丹》小说遭康生诬蔑，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残酷迫害，直到1978年复出工作，被审查、下放、关押、监护蒙冤受屈达十六年之久。1963年他作为中央党校的特殊学员，单独居住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叫“西公所”的地方，闭门思“过”，接受审查。1965年12月被下放到河南省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参加车间生产劳动。1967年1月，他被西安红卫兵非法带到陕西，在西安、阎良、富平等地，遭受批判斗争、游街示众十余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8年1月，在周恩来过问下，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度过了漫长的八年“监护”岁月。1975年5月，又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继续接受审查，直至1978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拨乱反正”之时。

冰消雪化待有时

毛泽东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但是由于他的一句话，直接导致了小说《刘志丹》冤案的发生。他后来曾讲：“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批示重新审查此案。中央组织部对小说《刘志丹》案进行了复查，并于1979年7月14日向党中央写出《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提出：（1）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是工人出版社的约稿，并非康生说的“蓄谋已久”，同习仲勋没有关系。（2）习仲勋只是在1960年向作者和工人出版

社的同志谈了两次他对《刘志丹》稿样的意见，除此，对小说创作没有过问过，康生说习仲勋是此书的主谋、“第一作者”是没有根据的。习仲勋两次谈话内容也是正确的，康生说习企图在小说中把陕甘边写成“中国革命的正统”和“中心”，作为“篡党篡国的纲领”，全属诬陷不实之词。（3）习仲勋在被审查时向党说明真相，不承认康生强加的罪名，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也是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更不应该以此定案。报告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把这部小说定作毒草的4点理由是和小说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反党集团。’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党中央于8月4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并指出：“中央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26页。）

为了更严肃慎重处理好这一株连甚广的政治文字冤狱，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组织部对这一历史遗留案件进行了复查，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因此案受株连迫害的干部群众，均应以平反，恢复名誉。

（贾巨川系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习仲勋传》作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启 事

2009年精装合订本 100元，简装 95元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长征“密电”问题的来龙去脉

夏宇立 / 文

“密电”问题产生的过程

1937年3月，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了一段举座为之震惊的话来：“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第 666 页）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密电”之说的源头。

1951年8月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在对“巴西会议”的注释中，有这样的叙述：“这时，张国焘率领一部分红军和中央分裂，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脱离危险区域，并率领服从命令的红军向陕北前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根据 1952 年 8 月第一版重排本，1966 年改横排本第 501 页）这里的“企图危害中央”、“脱离危险区域”，就较“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大大地跨前了一步。

“文革”前后，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的吕黎平说得更为具体：“密电”是他亲自参与译出的；“密电”内容性质更明确，即“武力解决”，还回忆了“密电”的全部文字，同时也把当年收译和送交“密电”的全过程作了展示。

20 世纪 80 年代，又有一些新人加入进来。除了前面吕黎平“译电”的吕氏“密电”之说外，又出现了一个贺俊楨“破译电”的贺氏“密电”之说。译电和破译电是两种不同的渠道。译电是内部的通讯，破译电是对敌方的电讯侦察。这就是说，按

他们的说法，这两种途径中双双获取了张国焘“武力危害中央”“密电”。

四个理由表明没有“武力危害”“密电”

“武力危害”“密电”说法一出，立即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他们当中既有当事人，也有学者。其中国防大学朱玉、王年一教授从四个方面的分析中，作出了彻底的否定。（朱玉、王年一《也谈长征中的“密电”问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6 期）第一，始终找不到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从 1935 年 9 月 3 日张国焘致“徐、陈并转呈中央”电起，直至 9 月 14 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的相互往来电报，还有中央致“徐、陈”电报，以及其间彭德怀、李富春与林彪、聂荣臻之间的电报中，都没有“武力危害”中央这样的文字。1936 年 7 月 14 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电专门报告了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及张国焘所犯严重错误，其中也只讲南下电令，没有“武力解决”。此外，从各档案馆历来积存的所有文电中也都找不出有这类内容的电报。

第二，从一系列有关文献的查阅结果中，断定没有“武力危害”中央的电报。如，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1935 年 9 月 12 日）、张国焘的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1937 年 2 月 6 日）、凯丰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1937 年 2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 年 3 月 31 日）、《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约在 1937 年 3~4 月间）、张国焘的检讨《关于我的错误》（1937 年 4 月 6 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38 年 4 月 18 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

(1938年4月19日)等有关历史文件,均未见有此记载。

第三,从有关亲历的高层人物的回忆中,没有发现“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内容。根据编造者提供的材料,所谓“密电”的直接接触者,在高层只有六人:一是张国焘,是“密电”的制造者;一是陈昌浩,是“密电”的接受者;一是朱德,是目睹南下“密电”者;一是徐向前,是“密电”的接受者或目睹者(一种说法是“密电”发给徐、陈,一种说法是只发给陈昌浩);一是叶剑英,是“密电”的目睹者和偷出者;一是毛泽东,是叶剑英偷出“密电”的目睹者。此外,再也没有高层人物直接接触所谓“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了。

“密电”的所谓始作俑者张国焘,无论在其叛党前的检讨中和晚年写的回忆录中,均未承认有此“密电”。1937年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有人质问张国焘企图用武力解决中央,张当即反驳。他说:“在南下开(松)岗会议,总司令提出问题,为什么要用武力解决中央,(周)纯全答复并无此事。我要说明的就是发展到陷害总司令与武力(斗争)解决同志,如果是这样,便反革命了。”

陈昌浩因执行“国焘路线”而多次受到批判,不断检讨。我们查阅了他在延安时写的检讨,并未提及“密电”问题。“文革”中他惨遭迫害致死。生前曾多次向家人谈及一生中犯了不少错误,但强调唯独张国焘发给他“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是没有的。他说:“我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电报”,“我没有看到,我和徐向前同志都没有看到”。

徐向前在晚年口述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中央和张国焘争论和斗争的过程,叙述了收到9月8日的南下电令,并由陈昌浩报告了中央的情况,此外不知道还有另外的“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1982年8月24日,他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同志的谈话中,专门回答了“密电”问题。他说:“接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的最大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还有,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人译的,发给谁,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

是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1988年11月5日他在致函中央党史研究室时,又明确表示:“关于张国焘‘密电’,企图危害党中央的问题,我不知道有此事。”“党史上的重大问题,一定要做到确有根据。”

叶剑英晚年回忆:“那天,前线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我一看电报报头是给陈昌浩的,便递给了他,他讲话正兴头上,没顾得上看,又顺手给了我。我一看才知道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看到这个电报后,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叶帅在这里只说电文“语气很强硬”,而未讲具体内容,更未提“武力解决”。

朱德在中南海一个座谈会上说到:一、四方面军北上,张国焘“到阿坝时,他就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发电报要将北上的部队调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接着,告诉中央毛主席,没有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上去的部队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朱德委员长谈红二方面军渡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纪要》,1960年11月9日下午,政治学院资料室藏)

毛泽东的回忆我们见到的有两处。一是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清算“国焘路线”时所说(见上文略)。另一处是1971年8月28日他在长沙与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的谈话,要他们尊重叶帅。谈话被整理成《毛泽东谈话内容追记稿》。毛泽东概述了党内前五次路线斗争后说:“以后就出了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在这件事情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徐向前、陈昌浩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先给了我,我们才走了,否则,我们就当俘虏了。”毛泽东的一次发言,一次谈话,所指出的问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的发言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意思是张国焘叫部队南下,南下后再“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而不是就地“武力解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与“反右”、“反倾向”、“开展路线斗争”一类的话,都是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语

言,与“肃反”、“武力解决”不是一码事。后者的谈话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我们就当俘虏”等,性质就变了。变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陈和四方面军就要就地“解决”中央,“俘虏”中央,即是要动武。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徐、陈既没有动武的任何军事部署,且在中央率军北上出走后,又严令禁止部队追击(徐向前当时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可见,后者这次谈话,与前者的发言出入甚大,与事实也相去甚远。

综合这些当事领导人的回忆材料,虽然说法不尽相同,但不难看出,都是围绕“南下”电令,而不是什么“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这也有9月8日22时张国焘致徐、陈的南下电报,9月9日中央致“国焘并徐、陈”的“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和“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的电报为证。

第四,直接接触“密电”的机要电台工作人员,没有发现“武力危害”中央的“密电”。电台工作人员,能够直接接触“密电”的主要有四人。他们是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在左路军者为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电台台长宋侃夫、机要科长曹广化;在右路军者为三局一台台长王子纲和二局局长蔡威(长征后期病逝)。当时,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各有自己的电台密码本,收发报均按自己的密码本发出和译出,谁也无法译出对方的电报。张国焘从左路军发给右路军徐、陈或中央的电报,均须由左路军的四方面军电台发出,由右路军的四方面军电台译出。因此,所谓“密电”当事人的电台工作人员,便主要有宋侃夫、王子纲、曹广化、蔡威等人。几位发电报或收电报的同志,都有各自的回忆,全都否认“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

宋侃夫(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说:“那时候,凡是张国焘发出的电报或收到的电报,无论指定人译的或亲译的,都要经过我(左路军方面)和王子纲(右路军方面),我们从来未见过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张国焘发电报只能经过我这里,他不可能在别的台发,这是肯定的。再说一、四方面军的密码又不一样,因而一方面军的同志也不可能译出四方面军的电报。那边只有蔡威、王子纲能译,译出来只能交徐(向前)陈(昌浩),不可能交给别人。这是规定,也是机要工作

的原则。”

王子纲(曾任邮电部部长)的回忆,与宋侃夫的回忆相吻合。同时他强调说:“当时,译电员在我的一台,译好的电报由我们台派通信员送给总部首长,根本不经过其他人。”“我在右路军跟徐、陈期间,所有的电报都是徐、陈两人收,根本没有单独给陈一个人的电报。”“假如真的有‘亲译’的‘密电’,那么陈昌浩还没有看到电报,电文未译出来,别人拿到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你怎么知道是要‘武力危害’中央的‘密电’?”

曹广化(曾任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说:“关于‘武力解决’的‘密电’,或者现在有人说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因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电报。我那时当红军总部机要科长,我不记得从我这里发过这样的电报,也从来就不知道有过这样一个电报。”“要问我现在看法,我说没有这个电报。为什么呢?第一,张国焘给陈昌浩发电报,应该是由他拟好电文,交给我们机要科,由译电员译成密码,再交给报务员发出,对方收到报译成电文,才交给收报人,这是当时发电报必经的几道程序。现在是,当时在机要科的同志和在右路军的报务人员都说未见过这样的电报,我想,张国焘自己是不会把电报发出去的。第二,在我的印象中,张国焘给右路军发电报都是给徐、陈两人的,如果有这个电报,这是调动整个右路军千军万马的大事,怎么能抛开总指挥,单独给陈昌浩一个人发电报呢?这个不可信。第三,那时候电报那么多,前后的电报都没有丢,唯独把这个电报丢了,那不是怪事嘛。那时我是科长,从未听说丢过电报。”“再说,那时的机要纪律是很严的,如果真的有这个电报,中途被人‘截获’,那张国焘、陈昌浩还不追查,杀我们的头?”(朱玉、王年一:《也谈长征中的“密电”问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对“密电”重要关联者的探究

吕黎平“帮助翻译”“密电”及递送“密电”的说法,成为“密电”问题的重要节点,自然吕黎平也就成为“密电”问题的重要关联者。然而,正是这一说法令人困惑不解,他的行为使人顿生疑

奏。

首先,吕黎平绝对没有译电和递送“密电”的资格。笔者长期从事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据我所知,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前,红四方面军电台还不多,其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台,既要做通讯,有的还要做侦听,而做通讯的主要由总部和担负远距离独立行动的部队使用。比如,1935年5月底,李先念奉命率部南下懋功地区迎接中央红军,带了一部电台。而6月20日,张国焘南下懋功两河口与中央会合,就没有带电台。后来他与红四方面军总部徐向前、陈昌浩联系就是利用李先念所带电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因一方面军电台较多,中央抽调了几部电台给四方面军部队使用,至此,四方面军下属各军才配齐了电台。当时,会合后的10余万红军部队,由于各自担负任务的需要,分布在川西北高原的五六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上,相互联系主要依靠电台。各单位所配电台也基本固定。比如,后来分左右路军时,左路军朱德、张国焘使用宋侃夫台,右路军徐向前、陈昌浩使用王子纲台。另有二局的蔡威台,也跟着徐、陈。也就是说,当时跟左路红军总部(朱、张)的只有宋侃夫台,跟右路前敌指挥部(徐、陈)的只有王子纲台、蔡威台(蔡威为二局局长,该台主要搞侦察,此时也跟徐、陈)。因此,宋侃夫说那时“张国焘发电报只能经过我这里,他不可能在别的台发”,“那边(右路军)只有蔡威、王子纲能译,译出来只能交徐、陈”。这就是当时的客观情况。所以,在徐、陈的前敌指挥部所配属的电台中要译出张国焘的电报来,是绕不过王子纲、蔡威的。当时电台属机要部门,一部电台的保卫极为严密,常常是一个连的警卫部队,内勤外勤,极为周密,无关人员是绝不可能接近的。吕黎平(一方面军干部)时为作战科副科长,他没有资格进入机要重地,更不可能越俎代庖,帮助译电。同时,一、四方面军密码不同,密码又不在手中,他如何能译?并且当时巴西、班佑地区房屋有限,部队驻扎分散,吕黎平所属作战科与机要电台并不在一块,他也绝无跑到机要科闲逛的可能。

所以,红二方面军老战士、曾任昆明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陈靖曾当面质问和批评吕黎平。陈靖说:“我问吕黎平:你一个作战科的副科长,怎么能看到属于机要科的密电?按纪律规定,

你是不能跑到机要科串的。吕回答:是帮助翻译。我说,这可能吗?还有,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你怎么能看?这是犯纪律的!电报又不是给叶剑英的,你怎么还能给他呢?吕黎平支支吾吾,无言以对。这都是不可能的,编得漏洞百出,还说怎么送给毛泽东。收发报的两方面,谁都说没有。吕黎平是捏造出来的。还说是人家让他说的。”“如果真有的话,1937年批张国焘批得那样厉害,连桃色新闻张国焘如何摧残16岁的小姑娘的事都拿出来,怎么不把这拿出来?1938年张国焘出走,开除党籍时怎么也不拿出来?”“怎么出来的呢?叶剑英把吕黎平找到北京,谈了一次话,吕黎平就开始讲了。其实,这都是毛泽东为了找理由。”(陈靖与笔者的谈话,2001年7月22日)

其次,吕黎平所述“密电”内容前后矛盾,缺乏可信度。他在其署名文章《严峻的时刻》中,这样介绍“密电”内容:“×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复。”(《解放军报》1979年5月1日)

虽然他的记忆功夫貌似清晰,但是,这里刻意编造的痕迹十分明显。笔者翻阅过的张国焘所发电文不下千份,但从未见过有“余”字的自称。并且,这里只是“密电”内容的一种说法,同样出自他的口中,“密电”内容有多种说法。他在另一次回忆中,其“密电”内容则是:“×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转引自范硕:《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秘》,《中华儿女》国内版,2003年第十一期)此电文关键的后一部分,与前一次电文的后一部分内容上有很大区别。并且,前一次,吕黎平把接收和译出及递送“密电”的时间,说在9月8日,这一次,说在9月9日。

他于1984年9月7日在军事科学院的一个

小型座谈会上又这样回忆“密电”内容：“以前我回忆的只是大意，事过五十多年，不一定记得一字不错，但有几点是肯定的：（一）坚决反对北上；（二）要右路军回头南下；（三）如中央不同意南下就要监视其行动，要‘彻底解决’或是‘武力解决’。”（转引自《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年第 115 页）

他还在另一篇回忆文章《在严峻的时刻》再一次叙述了“密电”内容：“9 月 9 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第 583 页）

这样，吕黎平笔下“密电”内容又变成“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了。严肃的历史文电，修来改去，变化无常。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变化呢？据范硕先生在《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秘》中吐露，因为当时的军委某领导人“单独接见”了吕黎平，对他所回忆的“密电”内容并不看好，从而启发他“据我知道，电文不会那样长”，“要按毛主席的说法，抓住核心内容‘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吕黎平心领神会，所以，其回忆的“密电”内容“按需”作了调整。然而，历史电文变来变去，它又能值几何？

与吕黎平所说译电版截然不同的贺俊桢破译版“密电”更令人匪夷所思。贺俊桢长征时任中革军委二局报务员，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无线电技术学校校长等职。他在接受范硕先生访问时说道：“我们二局的主要任务是侦破敌人的电台密码。在一、四方面军分家前气氛就比较紧张，我们就注意收听四方面军的电台。”“当时我们破译的水平比较高。破译电报的是一科科长叫曹向人（曹祥仁），译后交给曾（希圣）局长，由曾局长和叶帅联系。那个电报我是收到看到了，是‘十万火急’（当时电报分等级，有记号，与国民党的不一样。四方面军自己有密码。这个报是用他们的密码，但我们可以破译）。”（范硕《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秘》，《中华儿女》国内版，2003 年第十二期）

请注意，如果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正如他所说，二局是搞侦听破译的，是专门对付敌人的，现在拿来对付兄弟的红四方面军，这可是件大事，是一种非常

行为，谁这样决定的？可能吗？

不过，还请注意，如果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并按这一逻辑来推理，那这里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大发现：它给了人们一个获得破解“密电”找不到了”这个世纪谜案的最后线索，并回答了一个“密电”藏身之处的大问题。这也就是说，已经有了两份内容一致的“密电”：一份“吕氏译电”，一份“贺氏破译电”。其中的“吕氏译电”就算是叶剑英看完后，交给陈昌浩了，这份译电失踪了（曾有人诬指陈昌浩藏匿或销毁了“密电”），但是，那份破译出来的“贺氏破译电”不是还在吗？因为它用非常手段破译出来的，当然决不会也交给陈昌浩，也决不能让陈昌浩知情。这也就是说，这份电报的原破译件还在有关高层人物手中，因为，从贺氏提供的情况看来，这份电报只能是到了他们那里，按说绝不可能会有丢失的道理。

可是，这就又奇怪了！若干年来，这份“密电”老不露面。20 世纪 80 年代初，党史专家胡华在会议上公然宣称“武力危害中央的问题，危害的实质不能改变”，“电报在叶帅手里”。（转引自朱玉《与廖盖隆谈话要点》，1982 年 10 月 28 日）结果有人来到叶剑英处，找出来的还是一张报纸，还是报纸上那段吕黎平的回忆。贺俊桢不过是讲了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

叶剑英是“密电”问题的最关键的关联者，是首先提出“密电”问题的毛泽东在发言中唯一涉及的人物。同时，毛泽东还着重指出了当时叶剑英“偷来给我们看”的电报内容。数十年来，关于“密电”问题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而无数与“密电”问题毫无关联的人士也都要来发表一通关于“密电”内容的文字。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偏偏最为关键的当事人叶剑英关于“密电”内容的具体说法，始终没有公布，笔者找遍了所有有关材料，都找不出叶剑英直接叙述“密电”内容的文字。

历史证明，叶剑英是一位大智慧者，他饱览历史风云，“一生唯谨慎”，“大事不糊涂”，自然也就有自己行事的逻辑和风格。不过，他终究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

“密电”问题产生的特殊背景

毛泽东为什么在 1937 年 3 月突然端出张国

煮“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种既令举座震惊，又无案可查的“密电”问题呢？答案就存在于当时的背景中。这一背景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半年前的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会师，长期独立奋战的三支红军主力终于汇集在一起，从此，中央和军委直接领导指挥全国红军的局面正式形成。同时，这种领导指挥的大统一，又有赖于指挥权威的进一步强化。第二，刚刚发生的红西路军的失败，不仅是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重大损失，也必然会对国内政治生态和党内政治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影响。第三，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建立，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总趋势正在加速形成，中共已摆脱困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此时身在陕北的中央领导人也正信心满满，底气十足。毛泽东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在批张国焘时，说到西路军，给西路军定性；说到“密电”问题，给张国焘在长征中的分裂主义定性。

历史事实早已证明，这些说法并不实事求是。比如西路军。早在会宁会师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从国际战略和中国革命发展大局出发，决定中国红军向西靠近苏联，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援助。于是，在中央和军委的直接领导指挥下，红军西渡黄河，发起宁夏战役，不久，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计划从新疆方向打通苏联。红西路军艰苦奋斗，有力地策应了党中央和河东主力部队的生存与安全，以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是，由于中央军委战略指挥等方面的严重失误，二万余人的西路军虽经艰苦作战，终于在1937年3月惨遭失败。就在红西路军失败之时，延安发起了批判张国焘运动，“清算国焘路线”。运动发起之前，中共中央按组织原则曾向共产国际书记处作过请示，遭到了明确制止和严肃批评。“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做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开展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1937年3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88页）而中共中央并没有顾及共产国际态度，延安的批张斗争按期进行，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渡河的时候，

他（张国焘）要全部过去，过了三军我们才知道，于是只好顺水推舟，‘批准了’。”（《毛泽东在延安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3月27~31日）已经公开的大量历史文电表明，西渡黄河和西路军在河西军事行动的指挥者正是毛泽东。（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369—401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803—1029页）他的这一说法，正是“张国焘擅自命令西渡黄河”、“西路军右倾逃跑”说法的最早来源。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端出了“密电”问题：“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66页）历史地看，毛泽东这一说法，也另有缘由。1935年9月初，红军左路军在草地进军途中遭遇葛曲河涨水，张国焘遂顽固坚持南下，中央为了实施北上方针，于1935年9月9日深夜率领红一、三军和中央纵队连夜秘密出走，脱离右路军驻地单独北上。中央坚持北上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有的做法也欠妥，直到多年后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也还称其为“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洛甫（张闻天）《整风笔记》，1943年12月）中央当时仓促北上，丢下了数百名伤病员（徐陈给林聂发电，1935年10月11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20页）并瞒过了处于同一防线的友邻红四方面军部队，致使原驻地班佑被反动武装乘机侵占，次日凌晨，友邻红四军十师三十团猝不及防遭到敌人从班佑方向的突袭，损失百余人，红三十团团长负伤。（张国焘致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电，1935年9月12日1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8页）这些情况的发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政治影响。当时，红军指战员，包括一方面军未走的同志，都很不理解，难免心生怨愤。而一同从中央苏区长征而来的五军、三十二军，则意见更大，特别是军领导人，认为把他们甩在草地上，尤为愤激难平。虽然时间过去了一年多，但是人们心里的疑虑和隔阂并未完全消除，因而，毛泽东这一“密电”之说，正是为

“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

雷 颐 / 文

《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发表了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口述回忆《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在这篇文章中，她披露了一些瞿秋白被害、家属后来遭遇等以往人们知之不详的细节，颇有意义。不过，她说“‘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却不甚准确。因为，“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说认定他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时“文革”尚未开始，“四人帮”远未形成。也正因为主要并非“四人帮”为瞿“定性”，所以瞿秋白的平反过程才非常曲折艰难。瞿独伊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发表的《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一文中，对平反过程的曲折艰难有详细叙述，但对为何如此曲折艰难的原因则语焉不详。只有了解瞿秋白冤案的起因，才能明白为何为他平反如此曲折艰难。

对于“瞿案”，“文革”后参与复查、平反工作的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孙克悠，中国社会科学院



瞿秋白(1899-1935)

近代史所研究人员陈铁健，都有回忆文章公开发表。笔者谨以这些文章为基础，对“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略作概述。由于事情重大，而且孙、陈的文章早就公开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故笔者将在多处直接引用这些资料，一为慎重，二为使这些珍贵史料为更多人所知。

1979年3月《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所学者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公开为瞿秋白平反。此文一出，引起轰动，因为此时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一些冤案开始平反、昭雪，但刘少奇案、瞿秋白案等一些“格外重大”的案件尚未平反。所以，对此文有人在报刊上著文“大批判”，东北一家省报，用整版刊出批瞿长文。这些“文章”，仍坚持“文革”时的“钦定”标准，口气严厉。陈铁健要求著文反驳，却被拒绝。1979年6月，他到福建才溪参加学术讨

了说明当时面临非常情况，“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很明显，“密电”问题正是对单独北上的政治交代。不可否认，对于人们思想疙瘩的解除，也发挥了非凡效能。

所以，毛泽东的“密电”之说，尽管缺乏事实根据，但是，它为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定了性，纾解了人们在长征中因红军分裂产生的困惑，其目的还是为了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肃清不利的消极政

治影响，维护团结和统一，维护中央领导集体权威，以便迎接摆在党和人民军队面前的更为复杂和艰巨的新任务，这在当时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就免不了其中的一部分人群将要面临委屈和不公平，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作者为军史专家，著有《史说长征》)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论会，主持者执意要他在全体会上讲瞿秋白，然后对他进行事先准备好的“围攻”。

但就在被“围攻”两天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转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知，要陈铁健即日赶赴上海，与瞿秋白案复查组人员会合，参加复查工作，这时会议的“论调”突然一变。7月1日，陈赶到上海，住东湖招待所，见到中纪委瞿秋白案复查组负责人、时任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的孙克悠，她向陈详细介绍了情况。

瞿秋白的亲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多次给中央写信要求为瞿恢复名誉。中纪委在1979年春成立了“第八组”，准备复查瞿秋白案。瞿的胞妹、此时已79岁的瞿轶群从居住地杭州写信给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再次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并要求修复“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陈云同志于1979年5月20日对此信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请你阅批’。同年5月22日耀邦同志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请现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决。请陈野苹同志办’。陈野苹同志于同年5月29日对该件批示：‘请鹤寿同志阅后再转中纪委第八组’。”（孙克悠：《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问题复查工作的回忆片断》，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三]，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陈野苹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样，中纪委临时机构“第八组”就于1979年6月开始瞿案复查工作。“第八组”由五人组成，先已借调了中央调查部常凡、中央党校李玲玉参加工作，中纪委则由孙和军队团政委出身的老王参加，孙读过《重评〈多余的话〉》，于是要求陈也参加。孙克悠任“第八组”组长，具体负责此案复查工作，中纪委常委曹瑛则代表中纪委常委分管此事。

6月18日，中纪委书记王鹤寿、秘书长魏文伯首次约见了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希望她相信党中央会做出正确结论。

二

“中纪委第八组”在上海、杭州、南京、常州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工作，与瞿的多位亲人见面访谈，访问知情者，举行座谈会……

他们了解到，瞿秋白1935年6月被国民党

杀害后一直被视为烈士，所以他的家乡江苏常州从1953年开始筹建瞿秋白烈士纪念陈列展览，于1959年开始陈列展出，而后，又准备瞿秋白故居陈列展。“1964年，瞿秋白故居陈列展开始接纳内部参观。不久，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在南京传达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批评，瞿秋白陈列于8月停办。”（陈铁健：《导读：书生革命者的悲剧情怀》，瞿秋白《多余的话》，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原来，有两件事成为“瞿案”的导火索：一、1962年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的司马璐写的《瞿秋白传》，书后附录《多余的话》全文。二、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为叛徒。戚文刊出后，学术界和文艺界反映强烈，意见反映到国务院。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中共中央宣传部约集二十多位历史学家开会，讨论此文，与会者严厉批评此文歪曲历史。中宣部表示赞同与会者的观点，认为戚文在事实上站不住脚、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

然而，1962年后重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先后在《瞿秋白传》附录上看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历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并且急切地把两者与他想要解决的‘党内叛徒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做出异乎寻常的重大政治判断。”（上引书第23页）以下三条重要材料，说明此点。（此三条材料引自上引书第23~26页）

一、周扬1979年8月28日在万寿路住所对中纪委第八组谈话时说：

戚本禹评李秀成的文章（指《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当时，我不知道，没有看。有一天看戏，总理问我看过的文章没有，我说还没有。总理说你要看看，过问一下。现在台湾也在反对太平天国。这么样一个历史人物翻案，怎么也不和中宣部打个招呼？弄得阳翰笙的戏（指《李秀成之死》）写李秀成征战，太平天国灭亡也不演了，博物馆也停了（英国送来一把剑刻有李秀成的名字，文章一发表引起全国反响，剑也收起来了）。

我看过戚文后，在中宣部召开一个会，意思是戏还要演，文章也作为学术讨论大家发表意见。范文澜、郭老、刘大年都对戚文章有不同意见。刘大年根据我的意见写一篇文章，尚未发表。

文化大革命就批判刘大年、周扬为叛徒李秀成辩护……

我问陈伯达,对李秀成怎么看。他说李秀成还不是为了保他部下那些人。陈是为李辩护的。陈伯达又说,瞿秋白不是也写过一个自述吗?陈说是黄敬告他的,因为黄敬被捕后也写过这种东西。

我见到江青,向她说起黄敬说瞿秋白写过自述的事。江青说:什么自述,他(黄敬)根本就是自首分子,所以我才和他离开的。

我见到了(毛)主席时,把对李秀成有不同看法向主席汇报了,主席一言不发。

以后江青见到我,说:主席认为李秀成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晚节不终?),不足为训!”主席关照不要告你,但我还是告你了。

我又见主席时,主席第一次对我那么生气地批评了我(他从来总是表扬我,没有批评过)。他说:范文澜、郭老,还有你,你们都为李秀成辩护。你这个人没办法,你是大地主阶级出身,本性难改……。我当时听了很难受。总理在一旁承担责任说他有错误(因为是总理要我过问的)。我说还是我的责任。这时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我问主席看《多余的话》没有,主席说: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江青不同意罗尔纲的观点(罗认为李秀成是伪降),她会经常向主席讲的。

二、陆定一 1979年4月16日在北京医院对中纪委第八组等谈话时说:

1964年,香港的国民党杂志,又把《多余的话》登出来了。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有毛主席,有总理,还有我,三个人,怎么谈起的我不记得了。我向他们报告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香港那里又登出来了。毛主席就要看,我就拿给他了,请他看。……后来,毛主席看了以后,就对我讲,就是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方志敏……他的话是那么讲的,此外就没有多的话了。周总理想把《多余的话》的原稿找到,据我所知,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1966年总理派了两个人来问过我瞿秋白的事情,我就把以上情况再一次报告了他。



瞿秋白与鲁迅

三、戚本禹 1979年6月12日在秦城监狱的交代材料:

三年困难时期,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我给总理写信说:彭德怀反对毛主席是错误的。总理告诉我,他把我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这时有人提出彭德怀有功,军事上行,演出《李秀成之死》是为彭德怀翻案的。我认为这是攻击主席,我应起来作战。1963年,我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写的目的是说对人的评价应看到功劳,也要看到晚节,晚年反对毛主席也不行。这是决定我对《海瑞罢官》的态度。我投入文化大革命,犯错误,都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我的文章发表后,全国都知道,斗争是尖锐的。当时周扬批评我,他骂我很厉害,翦伯赞也反对我。这时我与江青就有接触了,她批了一个材料给我,我也不知道她是赞成我,还是反对我。那时我跟田家英很好,田也支持我的文章。江青叫我去,田家英说你要去,她是中南海的首长。我去了,江一开口就说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毛主席表扬了你,他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你可别骄傲。又说主席叫把《李秀成自述》原文影印本给你,叫你继续作

战。我说现在还开会围攻我，她听了大发其火，说她给主席汇报。这次接见是决定我以后跟她跑的原因。在我困难时，她代表主席支持我。她叫我再写文章，要快写。这是1963年底的事。

看到戚本禹这篇交代材料，陈铁健和中纪委八组同事们感到有些事情要进一步查清，于1979年秋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问他写《李秀成自述》是否涉及瞿秋白。戚回答说“1963年他写批判李秀成文章，开初只是认为中国‘防修反修’可从近代史上找到同类例证，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1963年底，江青找他谈话，说是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扬你，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可以请教康生的‘九评’（指与苏共论战的九篇评论文章）写作班子。戚写完第二篇文章，到钓鱼台找康生。在饭桌上，康生等要戚不必跟着批评者的观点跑，而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予以反击，务使对手无还手之力，如此，才能置对手于死地。1964年，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发表，明确提出叛徒问题，从李秀成、汪精卫到彭德怀，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鲁晓夫，大批特批，其势汹汹，在全国引起更大震动。”（上引书第26页）

“瞿案”复查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认真、仔细查阅从公安部调来的关于瞿秋白被害案审查卷宗，共二十卷，约三尺厚。公安部关于瞿秋白被害问题的调查，是1954年初根据湖南省公安厅上报的两名参与杀害瞿秋白案犯的有关口供材料，按照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指示，责成湖南省公安厅追查的。同年10月，由公安部十三局组织专门力量查办。“经过十年的严密调查侦审，于1964年10月19日完成《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中央决策者完全可以据此做出瞿秋白在狱中敌斗斗争坚决、从容就义的结论。而这时正是常州瞿秋白故居陈列展被下令停办之后两个月。又过两个月，1964年12月30日，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依据中宣部向陆定一、康生和中央的报告，‘将陈列中出现瞿秋白、项英、博古、谭政、甘泗淇、袁国平、彭雪枫、陈光等人的名字和形象文物’完全除

掉。历史事件的真伪，历史人物的沉浮，就这样被某些人为了某种目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颠倒于股掌之中了。”（上引书第28页）附提一句，项、博早就明确犯有“路线错误”，将他们“除名”不足为怪，谭、甘、袁、彭、陈不知当时被扣上什么“帽子”，后又怎样平反，尚知情者能详述其情、披露真相，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蒙冤者在天之灵的安慰。

以打倒刘少奇为主要目的的“文革”开始，批瞿亦随之公开。瞿母金衡玉1916年因贫债交逼自杀，葬于常州，1967年1月19日，其墓被红卫兵砸毁。1967年2月8日，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瞿秋白墓上像被红卫兵砸毁。1967年5月12日，瞿秋白墓被红卫兵砸毁。瞿父瞿世玮1932年在济南贫病交加中去世，葬于济南南郊，“文革”中也被红卫兵砸墓平坟。而且，“1972年中发12号文件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孙克悠：《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问题复查工作的回忆片断》，前引书第293页）正是这个重要文件，给瞿秋白平反造成巨大障碍。

根据这些材料，陈铁健认为：“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公开判定于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而其张网以待的秘密部署应不晚于1962—1963年间。”因为“大跃进”导致数千万人饿死，“面对灾难，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中央的指导方针和一系列政策举措正误的估量，存在着巨大差距。毛泽东始终认为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即正确占足九成，错误微不足道。刘少奇则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特别是1962年召开的党内“七千人大会”，使毛极为不满。（上引书第22、21页）将瞿打成“叛徒”是毛泽东准备“倒刘”的一个铺垫，姑且不论陈铁健的这一分析是否准确，但瞿秋白冤案至少起源于“四人帮”还未登上历史舞台的1964年底，则确凿无疑。

三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瞿秋白问题复查组”在1979年底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

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中共中央通过的包括《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一系列文件。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但遗憾的是这次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则未被大会采纳,所以五中全会没有讨论也没有通过有关瞿秋白的平反文件。对此,瞿独伊难以理解、接受,她回忆说:“我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宣部长王任重,问为什么父亲的平反问题在五中全会上没有讨论,是不是因为毛主席定的十二号文件(文件中说瞿秋白自首叛变了)不好改,他回答是这样。当时‘两个凡是’还起一定作用。”(《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

对这个至关重要的“12号文件”,如前所引,孙克悠说是“1972年中发12号文件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瞿独伊也说:“毛主席定的十二号文件(文件中说瞿秋白自首叛变了)”。按此理解,是这个“12号文件”说瞿秋白是叛徒,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但事实却是正是毛泽东说瞿秋白是叛徒,由“12号文件”将毛泽东的话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传达”。这个“中共中央中发[1972]12号”文件,是“文革”中影响最大、传达范围最广、学习时间最长的文件之一。这个文件题为:“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在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到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多次谈话。正是“林彪系”人员将这些谈话向林汇报,触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1972年的中央“12号文件”转发了这些谈话,作为“批林”的重要材料,当时,确实做到了传达到每一个机关、车间、营房、田头、教室。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几乎都是“党的历次路线斗争”,谈到瞿秋白时毛泽东说:“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这是目前看到的毛泽东对瞿秋白的最后“定论”。

虽然因为毛泽东的“定论”使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未获通过,但在1980年2月29日的五中

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有人提到如何评价瞿秋白时,邓小平则明确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尽管为瞿平反的文件未获通过,但事实上已经开始为瞿“平反”。1980年6月17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会议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贺敬之主持,中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在会上讲话,高度赞扬瞿的一生。座谈会上还有许多人发言,孙克悠回忆说:“在这个会上,我记得李维汉同志曾经说过,在中国共产党历届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瞿秋白是最能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他不搞家长制。”(孙克悠《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问题复查工作的回忆片断》,前引书第297页)第二天,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负责人、社科院研究生院负责人、中纪委第八组负责人及瞿的亲属瞿独伊等人,在八宝山瞿秋白被砸的墓碑残基前,敬献了中组部送的花圈和亲友献的鲜花。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结束了对此案的复查工作。该“报告”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标志着对从1964年就开始罗织的“瞿秋白自首叛变案”的正式、彻底平反。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陈铁健《导读:书生革命者的悲剧情怀》,前引书第46页)从“瞿案”的起源、定性到最后平反,可以清晰看到“权力”是怎样宰控“历史”的。(责任编辑 杨继伟)

胡乔木词与杭州毁墓拆碑

毛德传 / 文

—

1964年12月8日，浙江省杭州市的中共省、市委机关党报和广播电台，头条新闻报道了西湖园林景区清理坟墓碑塔，扫除腐朽反动思想影响，改变与“鬼”为邻现象的消息。宣称“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的这一重大措施”。

文化革命行动于12月2日夜开始，省、市委组织和政府，发动有关部门人力和器械设备，并责成省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芳（王后为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兼武警部队第一政委）、公安厅厅长吕剑光调用大批劳改犯人，在探照灯下，先在西湖孤山、西泠桥、白堤附近平毁古墓三十座。

被开头刀是美妓苏小小坟，岂容这臭婊子祸污人间天堂。与苏小姐为邻的杀人狂武松墓立予砸毁。他竟将丫环、小童、伙夫（俱是受压迫阶级弟妹）及妇女、孩子都毒刀惨杀。方腊是宋代农民起义英雄，又是“武松断臂擒方腊”，却在湖畔毒害两浙及全国游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山阴徐锡麟（蒋经国长子孝文夫人徐乃锦，就是徐先烈独子学文之女）打入清朝已任道员、安徽巡警学堂总办，在安庆手抢击杀巡抚恩铭，被捕遭惨杀。尽管徐系辛亥革命英烈，但，也是“鬼”，徐坟平毁。风流和尚苏曼殊坟就更不用说了……

碑、亭、坊、柱砸毁的有秋瑾小碑亭，武松牌坊，冯小青诗碑，徐锡麟石像石碑，苏曼殊碑塔；裘绍、尹维峻墓地石狮、望柱，苏小小石亭，林和靖牌坊，林启牌坊等等。

12月15日前，又在湖滨拆毁“国民革命军八十八师淞沪战役纪念碑”、“北伐纪念碑”和“陈英士像基座”等。88师系蒋介石黄埔嫡系精锐，由“一战”时德军总参谋长赛克特上将为首的德

国军事顾问团所训练装备。1937年“八·一三”日军在上海点燃侵略战火，88师（师长孙元良）由苏州驰援淞沪战场，8月14日加入战斗。该师264旅攻击日本驻沪海军司令部，伤亡官兵一千余名，少将旅长黄梅兴（黄埔一期）于江湾战死。中外驰誉的坚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就是88师262旅524团一部，由团副谢晋元指挥。但88师不是中共武装。北伐时，总司令是“人民公敌”蒋介石。而陈英士系CC派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叔父，更无论矣。不许他们在杭城占一席之地。与此同时，明代保卫北京的于谦、明末抗清十几年的张苍水和俞曲园、陈三立、刘大白墓亦予平毁。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些宗教古建筑自然也在“横扫”之列，省市党组织迅速关闭净慈寺；关闭天竺庙宇并拆除佛像，拆除钱塘江边六和塔中的三十尊菩萨，拆毁了云栖寺内莲池大师塔坛和佛像……。

幸运的是，园林、民政、文化、统战部门若干干部头脑并不发高烧，在郊区征用了土地若干亩（把二十余穴老百姓祖坟平毁），为某些“鬼”中的辛亥先烈和文化名人，草草修筑了十座小型合墓和单坟。计有浙军阵亡将士合墓，徐锡麟和马宗汉、陈伯平合墓（马、陈系安庆起义同时殉难），裘绍、尹维峻墓，陶成章、杨哲、沈由智墓，林寒碧墓，惠兴墓，苏曼殊和尚墓，陈模墓，林启墓，徐寄尘墓。

二

1964年，党内才子胡乔木患较严重的精神衰弱症，到杭州休养，住西湖汪庄一年又三个月。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江在井冈山任毛泽东秘书）以下党政主要首长时来问候，恭聆教益，生活上更是十分照顾优待。

1964年秋,乔木在杭写了词十六首,其中一首“习作”即《沁园春·杭州感事》,鼓动阶级斗争,有强烈的政治性思想性。

沁园春·杭州感事

穆穆秋山,娓娓秋湖,荡荡秋江。正一年好景,莲舟采月;四方佳气,桂国飘香。玉绽棉铃,金翻稻浪,秋意偏于陇亩长。最堪喜,有射潮人健,不怕澜狂。

天堂,一向宣扬,笑古今云泥怎比量!算繁华千载,长埋碧血;工农此际,初试锋芒。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

(有“·”处系毛泽东改定的文字)

(此处及后文所引,俱据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胡乔木诗词集》、《胡乔木书信集》——德传)

胡乔木专门将沁园春词作给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林主管党群意识形态;后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省委常委兼秘书长陈冰(陈后为天津市政协主席)看了。胡告林陈,毛主席在西湖刘庄眺望,见古人坟墓,与鬼为邻,很不高兴呀!胡又将词《杭州感事》主旨向省委书记处书记霍士廉(兼常务副省长,霍后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吴宪(吴曾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许多年)提出。江华对乔木指示不敢轻怠,召开书记处办公会议正式决定,立命省有关部门和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李元贞、陈侠及市长王子达火速执行。

12月2日,胡乔木将内有沁园春词三首和信送北京呈毛主席,就在同日夜间,省市联合雷厉风行采取革命行动,突击毁坟驱“鬼”,初战大捷。

三

胡乔木信中报告毛泽东就词沁园春与浙江省委领导交谈情况称“省委决定对西湖风景区进行改造……把苏小小墓等毒害群众的东西加以清理”,胡信又说“这是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泽东批注: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此事待有结果后再行报告,以便能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有所响应。”1964年12月5日,胡乔木将词作送

《人民日报》编辑部。附函称词“多关时事……内杭州一首借指文化革命”、“国内至今庙坟如此之多,毒害群众,亦觉须加挞伐……杭州一呼,全国响应的日子,想亦不远。”胡乔木竭力想把杭州掘坟墓砸碑亭作样板推行于首都北京和各省市自治区。他的信函如得到毛主席批上十几字几行字,即可号令全党全国遵行。

《沁园春·杭州感事》送主席润正时,毛泽东有旁注称:“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故不宜加上那个说明。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

四

1965年1月1日,经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词十六首,《红旗》杂志也于1965年第一期发表。中共浙江省委知道胡词来龙去脉,吃透上头精神,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广度与深度。此前,于12月下旬起已发起第二波行动,在1965年元旦后掀起第三波革命高潮。在杭州市中心城区和近郊更大规模清理坟墓、牌坊、佛像、华表、匾额等。据不完整统计,破拆牌坊55处、石刻7处,掘毁坟墓654座(内28座迁葬)……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大体有三类型。

(一)是反帝反侵略。当年一贯宣传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办学堂、医院及慈善机构只是迷惑中国人的手段,“是从事精神侵略”。摧毁了九里松石莲亭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美国、加拿大神父、牧师的二十个墓群,包括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美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父母之墓。铲平桃源岭天主教修士墓群。拆除四宜亭天主教圣心医院横额。

(二)宣扬忠孝节义封建道德及官僚题刻予清除。有竹竿巷孝子坊石牌楼,解放路两浙忠义祠碑亭和同治皇帝御书“湖山生色”,万松岭的万世师表牌坊,云居山孝女坊牌坊,众安桥忠显祠南宋岳飞父子初葬处(衣冠冢、碑、铜钟),吴山石刻“忠孝节义”,中山路文天祥庙牌楼、碑,道古桥李鸿章所立牌坊,中山公园朱文忠公匾额等。

(三)在驱鬼宅、除妖骸及佛像、牌坊范围者,不胜枚举。

1965年1月28日,胡乔木给词十六首读者徐某某回信,说明“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上文的土偶妖骸所指很广,亦不限于有形的庙、坟,一切旧文化中的偶像骸骨都包括在内,对这些东西必须进行很艰巨的长期斗争。

就在胡发出此信的上一天即1965年1月27日,倚天剑杀向女鬼秋瑾。将孤山西泠桥畔钢筋水泥砌成的鉴湖女侠墓炸开(前已拆除小碑亭)。劈开先烈棺材,捡出一把短剑(穿和服握短剑是秋瑾标准形象)及金银首饰、绣鞋等遗物陪葬品,将秋瑾遗骨放入瓦罐里,匆匆送去双峰村马坡岭,埋入已预挖好的土坑中。既没有建墓,也未树坟碑。(但女侠忠骸幸得保存)炸毁秋瑾墓是杭州革命行动压轴,自上年12月2日起,到1965年1月27日,共三波,计五十七天,胜利结束。而大量珍贵历史、革命文物、古迹名胜遭人为灾祸毁灭,永远无法再生。

1981年即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已将秋瑾忠骸迎回西泠桥畔。灵瓶埋于汉白玉雕成的鉴湖女侠塑像之下。西湖添彩,吴山增辉,中外游人瞻仰凭吊者不绝。

胡乔木《沁园春》提出的毁坟驱鬼的样板,1965年未向全国推广,浙江各地也未照办。

五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曾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朋友告我,“文革”中掘坟毁尸,破庙砸佛,浙江省最剧,全国第一。浙江是否占全国鳌头,我未调研无法说,但浙江表现杰出,倒是事实。试举例:

(一)陈布雷遭劈棺鞭尸

陈布雷先生1948年12月10日安葬杭州九溪十八涧。墓地解放后为疗养院圈入侧后一角,医护及疗养者极少进去,而在1964冬,侥幸漏网。

“文革”乱起,省市机关干部和工人学生红卫兵赶去九溪疗养院,不料受到持钉巴铁锄的当地贫下中农造反派拦阻。称这个命应由当地来革。后提出,棺内随葬品可能有珠玉,特别是那副棺木据知质特优,战斗果实应归农村造反派所有。原来为此,马上允许。于是在陈布雷墓穴前齐读

毛主席语录,高唱语录歌又祝四个伟大万寿无疆后,演出大劈棺鞭尸。

(二)观音居处毁菩萨驱僧尼

普陀洛迦佛教圣地,世界有名。1966年尚有寺庵二十余处。各地红卫兵涌到,将全山所有塑像不管如来、观音大士(含龙女、善财)、弥陀、文殊普贤菩萨统统拉倒砸毁。仅一个逃脱,那是唐朝阎立本刻雕杨枝观音,由几位和尚得村农帮助,涂上灰泥,丢入农家堆杂物小屋,现在是普陀佛国镇山之宝。全山僧尼被驱逐。幼小出家、主持全山佛协的释德明等被逼还俗,有的受迫害上吊自杀。

(三)溪口慈庵王太夫人寿域遭难

溪口镇及奉化县城是三野红军师于5月25日所解放。师党委迅即对丰镐房及祖坟妥善保护。师长胡炜(后为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师政治委员王静敏(后国家民航总局政委)师政治部主任李清泉(后为驻瑞士大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巡视丰镐房、慈庵、小洋房、武岭学校及雪窦寺,关照管事人,派师警卫连协助保护。直到1966年,蒋氏故居祖墓一直保护完好;当然,这也是对台蒋统战关系。

文化大革命开始,慈庵被砸稀巴烂,蒋母王采玉灵骨遭殃。中共宁波地委、宁波专署(虽已陷瘫痪,但党政机构尚在)派干部去看过,更无人敢阻劝!

开放两岸探亲人员交流后,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访台湾(蒋纬国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书时,谈家桢曾教过纬国课程,蒋尊谈为老师)谈告纬国“我上年去过溪口,见丰镐故居焕然,蒋母墓地安好,你早日回去看看啊”,不料,蒋听后沉默多时才回答:“可惜(祖坟)里面(王采玉太夫人灵骨)已没有了!”

(作者为离职休养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扩版启事

为了刊发更多读者喜爱的文章,应读者和作者要求,从2011年1月起,本刊正文从88页增加到96页。每期定价8.00元,全年96.00元。

炎黄春秋杂志社

肥东县大李大队 1960 年饥荒调查

管怀伦 / 文

1959 年冬天至 1961 年春天,中国面临建国后连续三年经济极度困难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严重饥荒,并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但究竟死亡了多少人口,至今人言人殊,难以定论(千万以上已有定论),并因此在党史与国史研究中成为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

安徽省肥东县原黄栗人民公社大李大队是笔者原籍,也是当年全国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在这场饥荒中笔者沦为孤儿,时年十岁,因此对当年遭遇的灾情具有切身感受和深刻记忆。现在,笔者已经接近花甲之年,更加觉得这段历史不能只是一个抽象概念,逝去的生命应该留下起码的痕迹。正是出于这个考虑,笔者于 2007 年一二月份先后两赴原籍,对当年隶属于大李大队的 14 个生产队的饥荒情况展开进村入户调查,并且获得了可靠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与数据。

本调查虽然把 1959 年冬至 1960 年春天作为特定的调查时间段,但调查结果显示,只有极个别人死于 1959 年的冬天,其他人均死于 1960 年春天,所以“60 年”一词在当地已经成为重大饥荒的代名词。当然,本调查所统计的死亡者唯一的死亡原因必须是饥饿,其他因素致死者不在统计之列。

大饥荒发生时的大李大队,如按自然村落布局划分,有“三管”(后管、中管、前管)“两白”(后白、前白)“一李”,即大李集;如按行政建制划分,共有 14 个生产小队;三管中的后管最大,所以分为管东与管西两个生产队;大李集作为自然村落范围更大,所以分为 8 个生产队;前白户与后白户各为一个生产队。由于近几十年来,农村无论村民聚居的自然布局还是其行政隶属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尊重历史,本调查因袭当时生产大队的行政建制,以生产小队为基础,把整个大李大队分解成为 14 个调查单元。但大李集第三生产队的资料不全,在前白户也没有获得准

确的数据,所以,上述两个调查单元不纳入总统计范围,所得不完整的数据只供参考。

在本调查进行过程中,笔者感触良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这项工作如不抓紧进行,再过几年,随着一些老人离世,将会成为永久谜案。二是就在笔者如此熟悉的地方进行此类调查,也已经不敢保证所有的饥荒死亡者都能被活着的人们记起——毕竟时隔四十多年了。这里,笔者愿意首先把最近两次调查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及数据公之于世,供相关研究者参考使用。

考虑到使用者的方便,笔者把整个调查材料分解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每一个生产队的各类项的具体数据;第二个层次是该生产队的各个类项的总计数据;第三个层次是 12 个生产队的各类项的总统计数据。在每一个调查单元的表格后面,注明该调查信息提供者和组织者的基本情况,既是对社会与历史负责,也是对相关人员的应有尊重。

(2007 年 3 月 15 日)

一、后管东生产队

人、户序号	姓 名	性 别	死亡年龄	备 注
1-1	管恒山	男	60 岁上下	该户共 2 人,死 2 人,绝户
2	杨 氏	女	60 岁上下	管恒山妻
3-2	管恒早	男	50 岁上下	该户共 4 人,死 3 人
4	李 氏	女	50 岁上下	管恒早妻
5	管怀中	男	10 岁上下	父子
6-3	管恒新	男	50 岁上下	该户共 6 人,死 4 人
7	管恒新子	男	10 岁上下	名字不详,乳名长元
8	管恒新母	女	70 岁	姓氏不详
9	二长子	男	8 岁	乳名,管恒新子
10-4	管茂清	男	60 岁上下	该户共 3 人,死 2 人
11	薛 氏	女	60 岁上下	管茂清妻
12-5	管恒良	男	40 岁上下	该户共 6 人,死 4 人
13	二涛子	男	11 岁	乳名,管恒良子
14	管怀源	男	8 岁	管恒良子
15	管怀意	男	4 岁	管恒良子

人、户序号	姓名	性别	死亡年龄	备注
16-6	管恒友	男	60岁上下	该户共11人,死8人
17	李氏	女	60岁上下	管恒友妻
18	管怀忠	男	24岁	管恒友侄
19	管怀本	男	40岁上下	管恒山子
20	刘氏	女	40岁上下	管怀本妻
21	管锦宝	男	17岁	管怀本子
22	管锦海	男	14岁	管怀本子
23	管锦堂	男	20岁	管怀本子
24-7	管恒富	男	60岁	该户共5人,死3人
25	计氏	女	57岁	管恒富妻
26	管怀玉	男	30岁上下	管恒富子
27-8	管恒业	男	60岁上下	该户共5人,死5人,绝户
28	计氏	女	60岁上下	管恒业妻
29	管怀银	男	30岁上下	管恒业子
30	唤英	女	8岁上下	乳名,管恒业孙女
31	想元	男	18岁上下	乳名,管恒业子
32-9	管恒升	男	50岁上下	共6人,死3人
33	计氏	女	70岁	恒升母
34	管怀堂	男	20多岁	
00-10	管恒义	男		共2人,死0
35-11	管锦堂	男	19岁	共10人,死1人
00-12	管怀榜			共6人,死0
00-13	管怀友	男		该户共3人,死0
00-14	管怀柱	男		该户共3人,死0
36-15	管茂业	男	73岁	该户共8人,死6人,丢1人
37	谢氏	女	73岁	管茂业妻
38	管恒俊	男	32岁	管茂业子
39	蔡继珍	女	32岁	管恒俊妻
40	管怀香	女	11岁	管恒俊女
41	管怀馨	女	7岁	管恒俊女
	管怀聪	男	2岁	管恒俊子,丢失
42-16	袁氏	女	70岁	该户共11人,死5人
43	管怀仁	男	40岁上下	袁氏长子
44	管怀礼	男	33岁	袁氏三子
45	蔡氏	女	33岁	管怀礼妻
46	管怀智	男	32岁	袁氏四子
47-17	管茂明	男	70岁	该户共6人,死3人
48	丁氏	女	70岁	管茂明妻
49	张氏	女	33岁	管茂明儿媳
50-18	管恒成	男	50岁上下	该户共3人,死2人
51	李氏	女	50岁上下	管恒成妻
52-19	管支财	男	50岁上下	该户共3人,死3人,绝户
53	张氏	女	50岁上下	管支财妻
54	小重圆	男	17岁	管支财子
55-20	管支银	男	50岁上下	该户共4人,死3人
56	管支银妻	女	50岁上下	姓名不详
57	管茂堂	男	10岁上下	管支银子
58-21	管支元	男	30岁上下	该户共2人,死2人,绝户
59	管支元母	女	50多岁	姓名不详
60-22	管怀苹	女	14岁	该户共5人,死2人
61	兰英	女	9岁上下	管怀苹妹妹
62-23	管恒春	男	60岁	该户共3人,死3人,绝户
63	管怀成	男	20岁上下	管恒春子
64	管怀美	男	20岁上下	管恒春子
65-24	管恒章	男	60岁	该户共5人,死2人
66	管怀德	男	23岁	管恒章子
67-25	丁氏	女	70岁上下	该户共有5人,死1人
68-26	管怀高	男	8岁	该户共6人,死2人
69	管怀姐	女	9岁	管怀高姐姐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26户
灾中绝户数	5户
灾中残户数	17户
灾中全户数	4户
灾前人口数	133人
灾中死亡数	69人
灾中存活数	64人
死亡率	51.88%
存活率	48.12%
绝户率	19.23%
残户率	65.38%
全户率	15.38%

本表信息提供者的一般情况：

1、管恒美,男,后管管中村人,生于1937年,现年70岁,中共党员,曾任生产队队长。1960年在南京大桥第二工程处工作,后来自动离职回乡务农。

2、管恒学,男,后管管中村人,生于1942年,现年65岁,初中文化,1960年饥荒发生时曾任吴王大队粮管员,现在居家务农。

3、马绍银,男,后管管东村人,生于1955年,现年52岁,高中文化,曾经加入共青团,做过乡办企业会计,现在管东村务农。

本表调查组织者的一般情况:管怀超,男,后管管中村人,生于1955年,现年52岁,初中文化,中共党员,现任安徽省肥东县杨店乡向阳村会计兼出纳。

二、后管西生产队

人、户序号	姓名	性别	死亡年龄	备注
1-1	李其昌	男	50岁上下	该户共6人,死4人
2	鲁氏	女	50岁上下	李其昌妻
3	李其昌女	女	7岁上下	姓名不详

人、户序号	姓 名	性别	死亡年龄	备 注
4	李其昌子	男	6岁上下	姓名不详
5-2	管支财	男	50岁	该户共6人 死5人
6	张万英	女	47-48岁	管支财妻
7	管茂元	男	22-23岁	管支财子
8	管茂贵	男	16岁	管支财子
9	管小妹	女	17岁	管支财女
10-3	管支和	男	41岁	该户共7人 死1人
11-4	龚 氏	女	50多岁	该户共1人, 死1人, 绝户
12-5	夏迺荣	女	40-50岁	该户共6人 死1人
13-6	王 氏	女	60多岁	该户共5人, 死5人, 李光余在劳改未列
14	朱 氏	女	30多岁	李光余妻
15	李炳辉	男	12岁	李光余子
16	李银姐	女	10岁	李光余女
17	李某	男	8岁上下	李光余幼子 绝户
18-7	管家应	男	60多岁	该户共1人, 死1人, 绝户
19-8	管家仁	男	60多岁	该户共7人 死3人
20	李 氏	女	60多岁	管家仁妻
21	管三平	男	13岁	管家仁子
22-9	管家斌	男	60多岁	该户共6人 死4人
23	王 氏	女	60多岁	管家斌妻
24	管儿媳	女	28岁	管家斌儿媳
25	管茂诚	男	4-5岁	名字不详
26-10	管支海	男	35岁	该户共4人 死3人
27	管支海女	女	7-8岁	名字不详
28	管支海子	男	4-5岁	名字不详
29-11	管家财	男	68岁	该户共15人 死7人
30	管支江	男	36岁	管家财子
31	管孝英	女	9岁	管支江女
32	管大祝	女	16岁	管支江女
33	管茂珍	女	13岁	管支江女
34	管冬姐	女	4岁	管支江女
35	管茂春	男	1岁	管支江子, 1959年冬天死亡
36-12	管家先	男	60多岁	该户共1人, 死1人, 绝户
37-13	管家仓	男	37岁	该户共1人, 死1人, 绝户
38-14	袁仲和	男	62岁	该户共3人 死2人
39	管 氏	女	60岁	袁仲和妻
40-15	管家怀	男	63岁	该户共12人 死4人
41	李 氏	女	61-62岁	管家怀妻
42	管支年	男	30岁	管家怀二子
43	管支年子	男	5-6岁	名字不详
44-16	管家华	男	70岁	该户共7人 死6人

45	蔡 氏	女	70岁	管家华妻
46	管支顺	男	40岁	管家华子
47	杨 氏	女	40岁	管支顺妻
48	管支顺子	男	7岁上下	名字不详
49	管支顺女	女	6岁上下	名字不详
50-17	管启运	男	72岁	该户共8人 死6人
51	管家礼	男	40岁	家信兄
52	管家信	男	39岁	家礼弟
53	乐 氏	女	40岁	管家信妻
54	管家信女	女	7-8岁	名字不详
55	管家信子	男	6-7岁	名字不详
56-18	管家春	男	63岁	该户共1人, 死1人, 绝户
57	夏迺华	男	65岁	该户共5人 死3人
58	管 氏	女	65岁	夏迺华妻
59	武 氏	女	28岁	夏迺华儿媳
60-20	夏朝根	男	36岁	该户共5人, 死5人, 绝户
61	武凤英	女	36岁	夏朝根妻
62	夏仕银	男	12岁	夏朝根子
63	夏仕银弟	男	10岁	名字不详 夏朝根子
64	夏仕银妹	女	8岁	名字不详 夏朝根女
65-21	管茂朝	男	48岁	该户共5人 死4人
66	许和英	女	47岁	管茂朝妻
67	管茂朝子	男	8-9岁	名字不详 管茂朝子
68	管茂朝女	女	6-7岁	名字不详 管茂朝女
69-22	管怀安	男	40多岁	该户共4人 死2人
70	管怀安女	女	10岁	名字不详
00-23	管家升			该户5人, 死亡0, 全户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23户
灾中绝户数	7户
灾中残户数	15户
灾中全户数	1户
灾前人口数	121人
灾中死亡数	70人
灾中存活数	51人
死 亡 率	57.85%
存 活 率	42.15%
绝 户 率	30.43%
残 户 率	65.22%
全 户 率	4.35%

本表信息提供者的一般情况:管支山,男,后管管西村人,生于1935年,现年72岁,高中文化,曾任肥东县黄栗公社小李小学教师,也是笔者启蒙老师之一,下放回村后任生产队干部,后又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现以教师身份退休,居住在后管西村。本次调查先后两次访问他,均获得他认真接待、全力支持,使我得以采集到完整的管西信息。

本表调查组织者的一般情况:管怀超,情况同前。

三、中管生产队

人、户序号	姓名	性别	死亡年龄	备注
1-1	管恒有	男	60多岁	该户共10人,死5人
2	张氏	女	60多岁	管恒有妻
3	管怀升	男	20多岁	管恒有子
4	金贵	男	7-8岁	管怀德子
5	管怀德女	女	4-5岁	名字不详
6-2	管恒忠	男	60多岁	该户共6人,死2人
7	李氏	女	60多岁	管恒忠妻
8-3	管茂文	男	47岁	该户共4人,死1人
9-4	管茂友	男	46岁	该户共5人,死2人
10	李氏	女	70多岁	管茂友母
11-5	管茂新母	女	60岁	该户共5人,死1人
12-6	管茂仓	男	44岁	该户共1人,死1人,绝户
13-7	李氏	女	60多岁	该户共1人,死1人,绝户
14-8	管恒彪	男	46-47岁	该户共6人,死2人
15	二河	男	17-18岁	乳名,管恒彪子
00-9	管茂全			该户4人,死亡0,全户

类项	总计
灾前农户数	9户
灾中绝户数	2户
灾中残户数	6户
灾中全户数	1户
灾前人口数	42人
灾中死亡数	15人
灾中存活数	27人
死亡率	35.71%
存活率	64.29%
绝户率	22.22%
残户率	66.67%
全户率	11.11%

本表信息提供者的一般情况:管茂全,男,中管村人,生于1925年,现年82岁,1956年加入中共,此后长期担任基层干部,饥荒发生时为中管生产队长。现在思维清晰,身体健康,可以全日从事正常农业生产,本次调查中他向笔者戏言“为儿子扛长工”。

本表调查组织者的一般情况:管怀超,情况同前。

编者注:这篇文章共列出了十三个生产队的入户调查表。由于本刊篇幅所限,只刊出以上三个生产队的入户调查表,其他生产队只刊出综合结果,省去入户调查表,读者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四、前管生产队

类项	总计
灾前农户数	13户
灾中绝户数	0户
灾中残户数	12户

本表信息提供者的一般情况:管支恒,男,前管人,生于1931年,现年76岁。高小文化,18岁以后务农兼做石

类项	总计
灾中全户数	1户
灾前人口数	79人
灾中死亡数	43人
灾中存活数	36人
死亡率	54.43%
存活率	45.57%
绝户率	0%
残户率	92.31%
全户率	7.69%

匠,现在从事家庭粮食、饲料加工。由于过去从事石匠工作需要走村串户,加之现在身体健康、记忆清楚,所以本次调查除大李集之外,他均提供了许多宝贵信息。

管恒美、管恒学、管怀超也帮助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

本表调查组织者的一般情况:管怀超,情况同前。

五、后白户生产队

类项	总计
灾前农户数	21户
灾中绝户数	2户
灾中残户数	12户
灾中全户数	7户
灾前人口数	87人
灾中死亡数	28人
灾中存活数	59人
死亡率	32.18%
存活率	67.82%
绝户率	9.52%
残户率	57.14%
全户率	33.33%

本表信息提供者的一般情况:吴元桂,男,生于1933年,现年74岁,高小毕业,出生于大李集,1952年以后来后白户落户。1951年冬,任大李乡办事员,1954年6月入党,1955年以后,先后任大李乡指导员(即党支部书记。据吴元桂与管支恒介绍,当时的乡比现在的村大,比过去的人民公社小),在1955~1958年的高级社时期任主办会计、小学校长、肥东县庐剧团会

计、黄栗人民公社供销社会计。现在是退休金领取者,居住在本表调查地后白户东北方向的王桥。

吴元桂夫人、管茂庭两位也对本次调查发挥了重要作用。吴夫人对后白户的情况记忆尤其清晰,为本次调查提供了宝贵而难得的支持与便利。管茂庭曾经是笔者家庭的近邻,现居王桥。

本表调查组织者的一般情况:管支恒,情况同前。

六、大李集——第一生产队 七、大李集——第二生产队

类项	总计
灾前农户数	12户
灾中绝户数	1户
灾中残户数	8户
灾中全户数	3户

类项	总计
灾前农户数	13户
灾中绝户数	0户
灾中残户数	6户
灾中全户数	7户

类 项	总 计
灾前人口数	50 人
灾中死亡数	21 人
灾中存活数	29 人
死 亡 率	42%
存 活 率	58%
绝 户 率	8.33%
残 户 率	66.67%
全 户 率	25%

类 项	总 计
灾前人口数	64 人
灾中死亡数	16 人
灾中存活数	48 人
死 亡 率	25%
存 活 率	75%
绝 户 率	0%
残 户 率	46.15%
全 户 率	53.85%

以上两表信息提供者的一般情况：李光柱，男，1944 年生，大李集人，初中文化，先后任生产队会计、人民公社拖拉机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长，现在大李集务农兼营商品零售。

本表调查组织者的一般情况：李光云，男，1957 年生，大李集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先后担任大李村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2006 年获“肥东县百强党支部书记”、“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八、大李集——第三生产队

人、户序号	姓 名	性 别	死亡年龄	备 注
1-1	陆 氏	女	70 岁上下	该户共 8 人，死 8 人，绝户
2	李应模	男	40 多岁	陆氏子
3	陆 氏	女	40 多岁	李应模妻
4	李光文	男	20 多岁	李应模子
5	李光斌	男	10 多岁	李应模子
6	李光？	男	10 多岁	名字不详，李应模子
7	李光？	女	7-8 岁	名字不详，李应模女
8	小四子	男	2-3 岁	乳名，李应模幼子

说明：第三生产队除了该户之外，其他农户及死亡人数已经无人能够回忆清楚。有鉴于此，本表统计数字不纳入总统计范围，只供参考。

本表信息提供者的一般情况：李应丰，男，生于 1939 年，现年 69 岁，大李集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20 世纪饥荒后的 60~70 年代任生产队会计、队长，1984~1997 年任大李村党支部书记，现在退休在家。

李光珍，女，60 多岁，大李集人，本表所列李应模之女，但自幼离家成为管怀朋的童养媳，现为向阳村管中组村民管怀朋之妻，笔者远房堂嫂。李应模一家的饥亡人口情况主要由她提供。

九、大李集——第四生产队 十、大李集——第五生产队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12 户
灾中绝户数	0 户
灾中残户数	7 户
灾中全户数	5 户
灾前人口数	61 人
灾中死亡数	18 人
灾中存活数	43 人
死 亡 率	29.51%
存 活 率	70.49%
绝 户 率	0%
残 户 率	58.33%
全 户 率	41.67%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10 户
灾中绝户数	0 户
灾中残户数	8 户
灾中全户数	2 户
灾前人口数	50 人
灾中死亡数	18 人
灾中存活数	32 人
死 亡 率	36%
存 活 率	64%
绝 户 率	0%
残 户 率	80%
全 户 率	20%

大李集——第四生产队信息提供者的一般情况：李光兴，男，1940 年生，现年 67 岁，大李集人，高小文化，长期务农，现在兼做商品零售。

本表调查组织者的一般情况：李光云，情况同前。

十一、大李集——第六生产队 十二、大李集——第七生产队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12 户
灾中绝户数	3 户
灾中残户数	6 户
灾中全户数	3 户
灾前人口数	58 人
灾中死亡数	26 人
灾中存活数	32 人
死 亡 率	44.83%
存 活 率	55.17%
绝 户 率	25%
残 户 率	50%
全 户 率	25%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13 户
灾中绝户数	1 户
灾中残户数	11 户
灾中全户数	1 户
灾前人口数	71 人
灾中死亡数	27 人
灾中存活数	44 人
死 亡 率	38.03%
存 活 率	61.97%
绝 户 率	7.69%
残 户 率	84.62%
全 户 率	7.69%

十三、大李集——第八生产队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15 户
灾中绝户数	2 户
灾中残户数	7 户

以上十、十三两表信息提供者的一般情况：

1、李葆辉，男，1931 年

类 项	总 计
灾中全户数	6 户
灾前人口数	57 人
灾中死亡数	27 人
灾中存活数	30 人
死 亡 率	47.37%
存 活 率	52.63%
绝 户 率	13.33%
残 户 率	46.67%
全 户 率	40%

生于大李集, 现年 76 岁, 初中文化。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 没有转正, 从土改至改革开放初期, 一直担任生产队长。

在本调查刚一进入主题的时候, 李葆辉即以过来人特有的感慨语气说出了两句概括性的语言: 一是整个大李集饿死了 40% 的人; 另一句就是珂荔武 (按: 自然村名, 当时是一个生产小队)

的胡萝卜救了大李集许多人的命, 不然还不知要多死多少人。根据调查者对大李集八个生产队中的七个生产队的统计数字, 平均死亡率已经达 38.27%。第三生产队虽然没有统计, 但从已经统计的一户死亡情况来看, 该队的死亡总数应该超过七个队的平均值, 可见 40% 应该是当时的统计数字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并固化成一个特有的概念, 所以他能以 76 岁高龄脱口而出。

2、李其山, 男, 生于 1944 年, 现年 63 岁, 文盲。由于当时孤身一人, 为生产队放牛, 生活比较自由, 接触社会成员较多, 因此对于较大范围内的村情具有惊人的记忆, 也是本次对大李集灾情调查极其重要的信息提供者。

十四、前白户生产队

据介绍, 前白户生产队在 1960 年饥荒发生前共有 30 多个农户, 120 多人, 1960 年的饥荒后有 8~9 个人搬迁离开, 剩下 60 人左右, 其他均因饥饿而死。

以上信息提供者的一般情况: 张文才, 男, 1949 年生, 现年 58 岁, 前白户人, 高小文化, 先后担任过生产队长、会计、民兵排长, 现在仍居该村务农。

调查附记: 由于该村姓氏复杂, 人员流动性大, 难以形成较严格的自然谱系, 加之当年饥荒的主要经历者多已过世, 确切的农户数目已经无人能够记忆清楚, 具体的死亡者姓名也无从细考。但根据人们的历史记忆, 该村死亡人数应不低于 50%, 最低也不应少于 40%。

在对前白户的调查中, 护城乡老杨村小蔡户

村民、笔者表弟蔡善荣、蔡善松二位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帮助。

类 项	总 计
灾前农户数	179 户
灾中绝户数	23 户
灾中残户数	115 户
灾中全户数	41 户
灾前人口数	873 人
灾中死亡数	378 人
灾中存活数	495 人
死 亡 率	43.3%
存 活 率	56.7%
绝 户 率	12.85%
残 户 率	64.25%
全 户 率	22.9%

十五、十二个生产队的 总统计数据表

编者注: 本文共分为甲乙两个部分, 甲为独立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乙为理论分析文章。由于版面有限, 本刊只发表独立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作者为中共南京市委
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1 年第 1 期目录

书屋讲坛	回首百年: 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雷池月
灯下随笔	调整经济结构已经迫在眉睫	高峰
	从“斯密悖论”说起	卢周来
	压制言论自由比言论本身的坏影响大千百倍	李启咏
	“郁郁乎文哉”——借自《论语》	韩羽
人物春秋	从劳改队走出的修文	英木兰 口述 丁品 整理
	石天河先生近况	谭定宇
	特立独行的何满子	肖跃华
	纪念杨坚同志	李冰封
书屋品茗	作家时刻	李木生
	唤醒中国——阅读札记	丁国强
	赵超构先生的两篇佚文	杨新宇
域外传真	美国末世灾难片中的国际政治	秦立彦
	略萨: 用抗争抵达天堂的那个街角	何贤桂
	于细微处见文明——欧行掠影	柳士同
教育论坛	我的教育理想	张国骥
说长论短	漫谈无稽的“大国学”	
	——《季羨林口述历史》读后	李廷华
	笑笑生为何反感江西官员	曹亚瑟
	墨家何以成为历史上的失踪者	陈玉明
思史佚篇	谁能这样牵动人心	陆其国
前言后语	我的西马情结: 一本书的出版感言	黄力之

邮发代号: 42-150 月刊 每月 6 日出版 定价: 6.00 元
地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书屋》杂志 邮编: 410007
电话: 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 0731-85790197
邮箱: nlh5314@263.net

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

尹曙生 / 文

1966年夏季，“文革”之风吹遍全国，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到处打、砸、抢、抄、抓，社会秩序混乱至极。1967年1月17日，安徽省2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十条紧急通令”：“勒令省委、合肥市委、省公安厅、合肥市公安局和全省公安机关，停止办公，接受群众组织指令，违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实际上，这时候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在造反派组织的冲击下，已经陷于瘫痪，不能正常行使职权。

公安机关的瘫痪，使得社会秩序更加混乱，犯罪分子乘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社会秩序严重失控，人民群众惶惶不可终日。有些犯罪分子冒充红卫兵，以扫“四旧”、搜查、抄家的方式，大肆入室抢劫。仅1967年1月25日夜，合肥市就发生这类抢劫案27起，被抢劫37家，受害者都以为是造反派扫“四旧”，不敢反抗，不敢报案（即使报了案，也没有人管），有3名省、市领导人家的被冒充红卫兵的劫匪以抄家名义抢去财产4万多元；一位副市长稍有微词，被打伤住院。一时间，分不清谁是红卫兵、造反派，谁是拦路抢劫、入室抢劫的犯罪分子。这么混乱的状态对“文革”本身肯定也是不利的。1967年3月11日，安徽省军区根据南京军区指示，对安徽省公安厅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公安厅军代表办公室”。紧接着，1967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指示：“立即接管（省）公安厅、公安局，彻底揭露这两个专政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1967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重新派出21名军代表，接管省公安厅，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安徽省公安厅军代表办公室”。这两次对公安机关的军管，没有能解决社会治安混乱的局面。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立即对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措施，于是，1968年1月8日，成立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安徽省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600多名干部战士，对全省95个县以上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省和地、市、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建立的“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和军管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从此，军队牢牢掌握了公检法机关的全部权力。一万多人的公检法机关干部职工，除极少数人留下外（公安厅500多名干部只留下23人），其余组织参加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班”，以后下放农村搞斗、批、改，揭批公检法机关的“阴暗面”。省公检法军管会提出对原公检法机关“组织上彻底砸烂，人员上彻底清理，工作上彻底揭露，路线上彻底批判”的四“彻底”办法，进行“彻底改造”，也就是“彻底砸烂公、检、法”。

这600多名军人对公安工作业务不熟，人数又少，无法担负维护全省社会治安的重任。怎么办呢？只好借助群众力量，于是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组织应运而生。1968年4月10日，在军管会的支持下，全省第一个群众专政组织——“合肥市文工武卫指挥部”正式成立。5月14日，省人保组（军管会）正式发出通知，要求“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在工矿企业单位，组织群众专政队伍，武装产业工人，把群众专政组织建设成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人保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革命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大打人民战争，清理阶级队伍，把暗藏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分子统统挖出来。”省人保组（军管会）通知发出后，到1969年春天，群众专政组织遍布全省城乡每个角落，队员发展、膨胀到110万人，它的统一名称是“安徽省××市、××县、××区、××公社群众专政指挥部”。单位和生产大队名称则是“××单位、××大队群众专政大队”。指挥部设正、副指挥，正副政委，指挥部机构内设政宣、指挥、参谋三个组。群众专政指挥部人

员采取集中住宿,有专人负责后勤保障;有些厂矿企业单位,仿照军事建制,设立群众专政指挥团(营、连、排、班)。所有群众专政组织必须接受市、县群众专政指挥部统一领导和调遣,而市、县群众专政指挥部接受同级人保组(军管会)领导和指挥。

省、市、地、县人保组(军管会)授予群众专政组织有权对杀人、放火、投毒、强奸、抢劫、偷盗等刑事犯罪案件,可以不经任何批准手续,立即采取扣留、关押等强制措施,然后向军管会(人保组)报告;发现所谓有违法活动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有权扣押,组织群众批斗后,实行群众专政(劳改、做苦工)。县以上群众专政指挥部对他们认为的违法犯罪人员有15天的扣留审查权。至此,群众专政组织俨然成了合法的专政机关,为日后无法无天披上合法外衣。

安徽省群众专政组织存在的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在军管会(人保组)领导下,先后对150多万人实行群众专政(其中包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清出来的40多万“坏人”)。那些被专政的对象,遭到残酷批斗、毒打,受尽折磨,其中有18万多人被非法长期关押、拘禁,最长时间的达3年2个月,直到1971年6月7日省革命委员会通知撤销群众专政组织时,仍有5万多人被非法关押在群众专政指挥部。

1967年9月5日,康生、江青等人在接见安徽省两大造反派组织头头的讲话中,直接点了混进两派组织里面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名单,要他们各自揪出混进本组织里的坏人。1968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中指出:“安徽省的阶级斗争极为复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掩藏在安徽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疯狂进行垂死挣扎和破坏……中央希望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批倒批臭。”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第一次全委会讨论通过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前进,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夺取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决议。决议提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清理阶级队伍,把混进党内和群众组织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下发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为安徽省清理阶级队伍提供借鉴,为此省革委会又作了一系列部署,清理阶级队伍在安徽省轰轰烈烈搞起来了。而担负这项工作的主力军就是遍布全省的群众专政组织。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种“坏人”43万多人。

这些“坏人”是怎么清理出来的呢?省革命委员会清队领导小组提出的清理对象是:“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有的地方还把“小爬虫”、“变色龙”、“铁杆保皇分子”、“黑干将”、“爪牙”等等,作为补充清理对象。省清队领导小组提出,对清理出来的“坏人”要求“从政治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大会批态度,小会短兵相接(武斗)”。于是打骂、体罚,刑讯逼供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手段,使用的酷刑手段有几十种、上百种,有的比《红岩》小说所描述的“渣滓洞”、“白公馆”还要残酷。笔者不愿意摘录那些惨无人道的酷刑,以免污染人们的灵魂,只公布清队造成的恶果,让人们自己去反思。到1969年4月统计,“清队”中清查出来的43万“坏人”中,被县以上专政机关关押的就有188225人,这些人因忍受不了刑讯逼供而在关押期间自杀的就有4646人,被群众专政人员用棍棒和其它刑具当场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伤而死亡的359人。

下面用一些地方、单位、个人做案例,进一步加以说明。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霍邱县是重灾区之一。1968年5至9月,全县在“清队”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90人,自杀445人。该县长集区“专政对象”刘××、曹××,因忍受不了刑讯逼供,就说自己藏有枪支,准备暴动。群众专政队信以为真,要他们带着去挖。先挖了3处都没有挖出枪支,于是挖了第四处,仍然没有挖到枪支后,专政队员一气之下将他们两人活埋在他们自己挖枪的坑里。他们俩有什么问题呢?不过是在解

放前被抓去当过几个月的国民党兵，被认定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经公社群众专政指挥部批准为专政对象，实行群众专政。

某市委机关共有干部职工 371 人，被揪斗、批判 154 人，其中专案审查的 47 人，1978 年全部平反，没有一个人有问题。某地委机关干部、职工 235 人，被清出 96 个“坏人”，“文革”结束后，除 5 个人积极造反，有打砸抢行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余全部平反。淮南某矿工医院 113 名职工，清理出来的专政对象 50 人。为了查清这 50 人的问题，仅专案组成员就有 41 人，最后一个坏人也没查出来。马鞍山钢铁设计院 978 名职工，被揪斗 134 人，大多数人是专家、技术权威，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坏人。合肥××大学教职工 327 人，被清出 192 个“坏人”，其中讲师、教授以上教学人员 57 人，党政干部 45 人，被逼自杀 8 人，最后查清只有 2 个人有些历史问题，但是在内部肃反中已经做了结论，不追究刑事责任。东至县在清队中清出 58 个反革命集团，成员 3564 人，其中贫下中农占 73%。被打死、逼死 37 人，事后调查，全是假案。灵璧县在“清队”中，挖出了一个“特务网”案件，涉及 4 省、6 市、9 县、30 个公社、12 个县直单位，挖出所谓特务组织 70 个，特务分子 1020 人，其中逮捕、拘留 18 人，立案调查 231 人，关押审查 965 人。在办案中刑讯逼供致死 120 人（基层干部 4 人，国家干部职工 16 人，其余都是农民），致残 146 人（其中终身残废、完全失去劳动能力 37 人）。在抓这个特务网案过程中，县、社、队先后办学习班 1629 期，被强迫进学习班的人数达到 28.3 万人次，占全县人口总数 1/2。一段时间灵璧县成了一座大监狱。在学习班里，使用的刑罚 50 余种。东风公社范柳大队党支部书记谢××，被诬为特务组织政委，被刑讯逼供 5 天 5 夜死亡，埋葬后，还不解恨，又把棺材挖出来，围棺批斗 3 天。民兵营长田×× 被诬为特务组织司令，被活活打死。东风公社胜利大队党支部书记朱×× 被残酷批斗，他为证明自己清白，用菜刀剃下左手中指，用血写下保证书，保证自己不是特务，专案组仍不放过，他只好自尽。有的人被逼无奈，只好乱供，东风公社西山大队农民崔×× 被逼无奈，一口气供出特务 140 多人，把他认识的能讲出名字的人全供出来，其中有几

岁孩子、几个月的婴儿。

如此荒唐的“特务网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还作为清队典型，于 1970 年初在合肥进行展览，让全省效仿。1978 年此案彻底平反。

1968 年 6 月 10 日，宿县地区石油公司一名副科级干部酒醉后卧床吸烟，引起火灾，被烧成重伤，抢救无效，次日死亡。当时结论是灾害事故。1970 年“一打三反”开始后，派到该单位的工作组认为石油公司“清理阶级队伍”不彻底，需要补课，说死者是被他人有意放火烧死的，是“大贪污集团杀人灭口行为。”石油公司 73% 的干部职工受到残酷的刑讯逼供审查。全公司 43 人，22 人被长期关押，3 人被活活打死。经过 2 年审查，没有查出一分钱的贪污事实，所谓贪污集团杀人灭口不攻自破。可专案组并不死心，强令石油公司从银行贷款中提出 2965.58 元，冒充赃款，说明贪污集团存在。1978 年该案得到彻底平反。

1969 年 11 月 13 日，马鞍山第 17 冶金公司礼堂因电器短路失火，当时正是“清队”高潮，市人保组（军管会）认为是阶级敌人纵火，对公司 6 名所谓嫌疑对象隔离审查。就在这时，该公司一职工出差上海，与一妇女通奸，被上海市公安局军管会抓住拘留。公司派人带回单位审查，他在强大压力下，交代伙同另一职工放火烧了礼堂。礼堂失火时他不在马鞍山，明显是编造，可专案组却相信，将他供出的那个人也关押审查。为了过关，这个人交代自己参加了“中华民族新生党马鞍山十七冶特别执行委员会”反革命集团。并编造出芜湖市、池州地区、马鞍山市、马鞍山钢铁公司一大批领导干部都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有地、市委书记，专员、市长，有公司经理，计划在马鞍山搞反革命暴动，已经从南京搞来 5 支冲锋枪、4.5 万发子弹。因暴动未成，所以纵火烧礼堂。以军队干部为主的专案组信以为真，组织几百人进行侦查，发动群众专政组织大力协助，将 712 名人员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其中地、市级干部 9 人，县、处级干部 17 人，科级干部 57 人，工人 630 人；关押 133 人，被刑讯逼供自杀人 8 人，病死 1 人。1979 年该案彻底平反。给全体受害者 8 万元生活补助，而没能追究冤案制造的责任，因为主要人员已调回部队工作。

在“清队”高潮中，安徽省和县水利局干部石

仁祥,于1968年12月26日,以《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回报”》为题,写了一份传单材料,刻印8份,公开署名,寄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6份,自留2份。1969年1月6日,南京空军保卫部派出2名军官到安徽,向省革委会和人保组传达吴法宪(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对石仁祥信的口头指示:“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组织专人立即侦破,及时查清,查清后必须依法惩办,并查清这封信的扩散面,肃清流毒,不准再扩散。”1月7日省人保组派人同南京军区保卫部前往和县办理。由于石仁祥是用真名真姓真地址,找到本人并不难。8日下午传唤他,并当场宣布拘留,后逮捕。

石仁祥1959年参加工作,1966年应征入伍,1968年4月退伍到水利局工作。他揭发林彪的问题,有的是他自己的想法,认为“林彪心术不正,投机取巧,总有一天会反毛主席”;也有一些是他道听途说林彪历史有问题。专案组查来查去没有查出他有政治背景,没有人指使他做这件事,没有牵连到其他人,信的内容没有扩散。可是,1970年3月18日,和县革委会讨论决定(法院已不存在——下同)判处石仁祥死刑,立即执行,巢湖地区人保组、省人保组(军管会)报省革委会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7月12日,和县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后将石仁祥枪决。安徽省革委会为此展开大规模宣传活动,声称这是“清理阶级队伍取得的一大胜利”。

仅仅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反映林彪问题的信,就被判处死刑,比封建专制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石仁祥案不是“文革”个案。张志新、林昭、遇罗克也不是个案。安徽在清队中被用棍棒活活打死的那1000多人,他们的遭遇比石仁祥还要惨。

在清队中,安徽还清出来一个全国最小的“反革命”,他只有9岁,是淮北市××小学二年级学生赵××,1968年12月5日因在作业本上写了“刘少奇万岁”而以反革命罪被拘留关押。因为他在拘留所哭闹,最后不得不在关了1个月零七天而释放,但是仍然定他为“反革命”。

1968年4月8日,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致死,最能说明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荒

谬性、残酷性,充分展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下,人性丑恶的大暴露。

“文革”开始不久,严凤英就以“三名三高”、“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成为批判对象,经过无数次“文批武斗”,受尽屈辱。在“红梅剧院”(为了突出革命性,“文革”开始后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改名为“红梅剧院”)军代表刘万泉的领导下,对她实行群众专政,大会批、小会斗,甚至把她在旧社会受到的种种人身迫害、侮辱,作为她的罪行,展示出来,进行批判,肆意进行侮辱。批斗的时候还要她的两个未成年孩子和丈夫到场,一同接受批判,以达到最大限度的人格和心灵摧残效果。根据省军管会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专案组捏造她反江青、抵制革命样板戏、潜伏特务三大罪名。她虽力辩自己清白,无奈有口难辩。在军代表、专案组的淫威下,她的老搭档、黄梅戏剧团主要演员王少舫(“天仙配”董永扮演者)为了自保,也贴出大字报诬陷她,使严凤英受到极大震动和伤害。4月7日晚,她服下大量安眠药,然后写遗嘱,准备彻底解脱。丈夫王冠亚发现后,报告军代表刘万泉,请求组织抢救。可刘万泉等人来到她家后,不是马上送医院抢救,而是在她的床头开批斗会,直到她神志不清、不能说话,才草草收场,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由于当时医院也在造反,秩序混乱,从安医门诊部折腾到安医住院部,没有救护车,全靠丈夫王冠亚从好心人那里借来的拉货板车拉来拉去,又耽误了些时间。到了医院,没有医生给予及时抢救,直到8日凌晨2时,严凤英带着满腔悲愤离开了人间。解放前,她因为忍受不了欺凌与压迫,曾经吞金、上吊自杀,都被即时发现抢救,幸免于难。可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却香销玉殒,永远离开了人间。全国人民心中那个美丽、善良的“七仙女”,死时还不到38岁,正是一个艺术家的黄金年龄。

人死了以后,军代表还不放过,率领造反派,赶到医院,要搜查严凤英的特务证据——发报机和照相机。胡说严凤英是接受特务机关指令而自杀的,发报机和照相机就藏在她的肚子里,要开肠破肚,搜出特务证据。尽管王冠亚强烈反对,也无济于事。刘万泉勒令医生扒光她的衣服,在他和4个群众组织头头的监督下,用医用斧头破开

她的胸膛,把内脏扒出来普遍翻了一遍,除找到尚未完全消化的100多粒安眠药外,所谓特务证据子虚乌有。完全失去人性的刘万泉还悻悻地对着被污辱、肢解的尸体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演的黄梅戏,也没看过你演的电影,但是,我今天看到了你的原形。”

从刘万泉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在

那疯狂、变态的社会,才能产生如此疯狂、变态的人。

我们应该谴责刘万泉,谴责那个疯狂、变态的社会,但是,我们更应该谴责制造如此疯狂、变态社会的政策和制度。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何方谈史忆人 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何 方	39.80	7.00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顾达寿口述 郑少锋执笔	28.00	6.00
望九琐忆——一位老者的20世纪	白永达	22.00	6.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国家记忆	章东磐	9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王光美私人相册	罗海岩编著	42.00	7.00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写	38.00	7.00
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丁三著	32.00	7.00
中山舰事件 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	张聿温著	32.80	8.00
大国悲剧 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48.00	8.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民	95.00	10.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徐 孔	29.80	6.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主编	148.00	12.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我与《第二次握手》	张 扬	32.00	7.00
张闻天在1935~1938	张培森主编	17.00	6.00
张闻天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张培森著	20.00	6.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抹不去的记忆 老三届新三级	张 琦主编	48.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22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三十年河东 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杨继绳	39.80	8.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	邓 鹏	97.00	10.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本书的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何方党史笔记的集结,梳理了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演变,客观地澄清了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段关键性的历史;第二部分是作者对师友纪念文章的汇集,建国后何方曾长期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及驻苏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文中首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是苏联资深外交官顾达寿的回忆录。他曾多次担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柯西金、米高扬等重大会晤的翻译。亲历建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风云,向读者展示了中苏高层会晤以及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内幕和轶闻轶事。

望九琐忆——一位老者的20世纪:出生在20世纪,旁观北伐,见识蒋介石,红色年代里也曾经受过锻炼和改造,作为历史的参加者和见证者,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作为“历史”的个案素材,供读者检视和剖析,同时也反思历史。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作者使用了国共双方大量可靠、翔实的历史档案和重要人物的日记、回忆录,全面系统论述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

底层的叩问 立足现实的批判,坚持文化的言说,本书以鲜明的立场、尖锐的目光、泼辣的语言和独特的视角,触及当下社会经济与精神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泥人也有土性,小草也会呻吟,来自底层的叩问,来自民间的立场,来自弱势群体的目光,触动读者的心弦,让正义、良知、悲悯、同情……许多美好的词汇,不仅仅成为漂亮的书面语。

古人曰,知屋漏者在宇下。今人说,得民意者得民心。肖复兴的这本书为百姓的民意作了很好的代言。

国家记忆 本书收录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影像,首次独家、清晰、生动地展示了中缅印战场上中国军人和盟军军人的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英雄们和历史真相。本书附赠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原始影像DVD光盘。

北京市内乘车路线:公交车13路、21路、32路、65路、68路在三里河东口站下车,西行50米路北,西华饭店院内。

联系电话:010-68532048,68539058

我看“中国模式”

杨继绳 / 文

“中国模式”这是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什么是“中国模式”？提出“中国模式”的目的何在？它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试着对这些问题作一探求。

什么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最早来自外国，来自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GDP 持续 30 年以 9.8% 的速度增长。中国从改革前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199 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人均突破 2000 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入门的门槛，排名由第 175 位上升到第 129 位。2010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估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和美国的经济差距也在逐年缩小。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商品十分匮乏的国家。而现在，中国的钢铁、汽车、造船、水泥、发电装机容量、原煤、化肥、棉布、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彩电等 210 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以上数字均引自国家统计局发布）。改革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员，现在货物进出口量世界排名第三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也是最受欢迎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令国外经济学家刮目相看。“中国模式”由此而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如此强劲的步调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具有启示性。在最近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反而得到了快速发展。因此，“中国模式”的说法传播更广。不过，在经济学家眼中，“模式”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案例。如最近风行“印度模式”，因为印度近十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为 7%~9%，今后几年可能要超过中国。“印度模式”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以加工业为主，是“世界工厂”，印度服务业对 GDP 的贡献超

过 50%，是“世界办公室”；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大，印度内需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政府主导，印度经济由市场主导（詹德雄：《印度经济增长和印度模式》，载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编《世界问题研究》，第 286 期）。我们很熟悉外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称赞。其实，称赞印度经济的评论也不少。

然而，到政治评论家那里，“中国模式”内涵发生了变化。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他的新著《中国 30 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对“中国模式”做出了解释。他认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不太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于是也就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收益。”

1980 年代以《大趋势》一书而闻名中国的奈斯比特，在他的新作《中国大趋势》中认为“中国模式”是“纵向民主”。即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 30 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

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的理念和对西方式民主理念的回避”。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狄忠蒲（Bruce Dickson）在一篇文章里也认为“为了保证这些增长政策的实施并限制对平等和社会福利的需求，威权统治是必要的。”

这些外国人不可能在短期内了解中国。读他

们的著作会发现，他们回避了中国的现实矛盾，只看到中国光鲜的表面，离中国现实有很大的距离。库恩是中国的上宾，官方为他的采访和写作创造了优越条件。他这本书的致谢名单有300多位，其中省部级官员100位以上。他访问的基本是中国政府开列的体制内人物。他没有到底层采访，从采访到写作，只用一年时间。我们不能期待从他这本匆忙写就的著作中了解真正的中国。在江泽民的提议下，奈斯比特选择“中国大趋势”这个题目。他为此组织了一个项目团队，这个团队由天津财经大学和南开大学的三位老师和20多名学生组成。学生负责资料收集。项目组搜集和摘编报纸的信息，译成英文提供给奈斯比特。项目组选择了100多个城市的报纸，大多是各地的日报。奈斯比特不要中央报纸，他认为地方报纸能够真实地反映民间情况。他认为有倾向性的《南方周末》一类的报刊没有选。他不知道，地方报纸也是官方报纸。我们当然不会期待，这种拼接、提炼官方报纸而成的《中国大趋势》能反映中国的未来趋势。

这里还不能不介绍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看法。福山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然而，2009年8月底新华网发表了一篇编译过来的文章，题为《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这篇文章强调，福山肯定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福山把中国模式归结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是西方难以企及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体制；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在这以后，一些研究者核对福山那篇文章的原文，发现那篇在网上流传的报道，对福山的某些言论做了脱离语境的“选择性”编译。比如，在那篇报道中有这么一段：“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印度‘民主’模式与中国‘权威’模式之间，更多国家钟情中国，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后者代表集中和高效。”而东京大学的王前翻译的福山相关的原话是：“看到这些国家和印度那样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决策过程，很多人赞赏中国的那种权威主义所具备的

比较迅速的决策能力。不过，那种权威主义的政体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为没有法治，也没有选举进行监督，所以其问责，只是面向上面即共产党和党中央，而非面向政府应该为之服务的人民。”（转引自舒泰峰《“捧杀”中国》电子版，第三篇第二节。）与福山本人有过接触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擎认为（同书，序言），福山重视中国30年来的发展经验，也发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传统及其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深远影响，认为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理念：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难以长期维系。

外国人热烈讨论中国模式，中国人自己不会落后。

2009年12月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出版。此书一问世就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作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著作。潘维也到中国设在国外的孔子学院和英国下院等地宣讲“中国模式”。潘维以《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一文为该书的总论。总论认为，“中国模式”由三个子模式构成——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潘维认为民本政治有四大支柱：一，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潘维认为，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就已成熟，到今天则体现为“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二，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承袭于古代文官制的中国官员遴选机制是一种“绩优选拔制”。这种制度就选官标准而言，较之擅长“得民意”的竞争型选举制有更广阔的与时俱进的弹性空间。三，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潘维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领导核心”，具备这三大特性。四，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潘维认为，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中国是分工而不分权。

“分工不分权”，在权力集中的情况下分权。那么怎样分工呢？潘维将分工体系列为十个方面：民本思想对执掌行政权力的软制衡；党政分工所形成的精致的“双行政”体系；中央与地方的

分工形成“条条”和“块块”之间的相互弹性约束；任期与年龄规定构成执政者定期交替的硬制衡；集体讨论、集体决策，但“班长”负主要责任，民主与集中相制衡；纪检、检察、法院、反贪体系等专业检察机关规范官员行为；干部异地交流和异地任职制度；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舆论监督；各政府官僚机构的不同利益视角导致均衡和决策谨慎。潘维着重谈到对司法独立的看法：“就中国的社会条件而言，党对司法的统一政治领导极为重要。无条件地讲司法独立，便有食洋不化之嫌。”

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学者比外国学者更有条件。潘维先生如果真诚地面对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凭他学贯中西的功力和建立“中国学派”的雄心，一定会取得相当高的成就。但是，细看他们的主张，不仅和库恩、奈斯比特一样，对中国现行体制全盘肯定和歌颂，还全面肯定了改革以前的30年。他说：“模式是对‘成功’之路的‘归纳’。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他的有些看法不无道理，但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着悖中国历史和现实。他说“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价没有剥夺农民，反而比市场价更有利于农民。”中国农民同意这个结论吗？他为前30年的多次大规模的镇压辩解，说：“共产党虽然强调‘阶级斗争’。但与西方社会不同，斗争对象并非中国社会的某个实体‘阶级’，而是局限于某类‘思想’和极少数代表这种思想的‘分子’，目的是统一思想，稳固政权，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数以千万计的受害者能接受这个看法吗？他强调，“权利和责任两分。西方强调权利，中国强调责任。‘责任本位’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思想基础。”请问：一个没有权利的主体怎能承担责任？他批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说”是拿西方教条来判断中国的结论。请问：邓小平在1980年代就提出政治改革滞后，也是西方教条吗？（这里引用的潘维的看法来自潘维的《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电子版。）

潘维否定“民主与专制两分”，把皇权专制条件下的一些概念，不顾语境地搬过来，作为抵制今天民主潮流的武器。作为学者的潘维应当知道，民主和专制的对立，中外学界用汗牛充栋的

著作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潘维先生怎么能不加论证，轻轻的一句话就给否定了？如果否定了“民主与专制两分”，也就否定了中外一切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潘维否定“计划和市场两分”，30年的改革不就是把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吗？按潘维的说法，这场改革也就没有必要了。

综上所述，一些中外学者近年宣扬的“中国模式”包括几个要点：一，肯定和赞扬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二，肯定和赞扬改革前的30年；三，主张中央集权和“大政府”，肯定“威权体制”；四，排斥现代民主制度，否定普世价值；五，否定“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皇权专制的批判，掀起了新一轮尊孔读经高潮。

既然肯定和赞扬现行的政治体制，就没有必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然肯定和赞扬改革前的30年，30年的改革也就多此一举。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传统的否定，在某些个别问题上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但“五四运动”对皇权专制的批判是真正的、必不可少的启蒙。否定“五四运动”以来的启蒙是历史的倒退。“中国模式”论者把中国近30年的经济成就归功于权威政府，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政府更有权威，为什么经济没有出现奇迹？而近30年经济奇迹恰恰是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多年被压抑的社会活力得到了空前的迸发。“中国模式”论者主张集权政治。集权政治的成败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远见和品德。柏拉图“理想国”的国王是全智的哲学家，但人性的弱点不可能保证每一位执政者都是“哲王”。所以，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国家具有不确定性。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否定了他老师的意见。柏拉图晚年也走出了“理想国”。在亚里士多德以后，在某些国度曾多次出现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但随着时代的演进，这样的政治制度逐渐式微，选择民主制度的国家越来越多，选择专制的国家越来越少。现代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虽然它有不少缺点，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中国模式”完全否定了现代民主制度，而拿出的替代品却是集权政治制度，显然是不高明的。

从今天对“中国模式”的歌颂，我想起了上世纪30年代一些西方著名学者对前苏联的歌颂。

那时的背景是西方面临经济危机，而前苏联却“一枝独秀”。今天，西方又面临经济危机，中国又是“一枝独秀”。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歌颂前苏联的那些学者犯了历史短视症，但愿今天的学者，不要步他们的后尘。

权力市场经济不可持续

改革 30 年来，不仅经济飞速发展，政治上也有明显的进步。政治进步表现在以下方面：1，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3，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4，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数”到集体负责制；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6，抛弃了、搁置了乌托邦式的理想，追求现实利益；7，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8，对世界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变化，用“和平发展的时代”取代“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过去紧张的国际关系也大有改善。

但是，中国的现状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民众对国事的参与程度很低；民意表达渠道很不通畅；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力量微弱；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司法不能独立；新闻没有自由。中国目前还是威权政治体制。

“中国模式”全面肯定了中国的现状。而中国的现状就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这种模式已经蜕变为“权力市场经济”。

在“权力市场经济”模式里，国家行政权力控制市场运行、参与市场交易。权力可以变成商品，进而变成资本，资本也可以收买公共权力为其谋利。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和霸占重要社会资源。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很难通过勤劳和智慧来获得财富和提高社会地位。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一切罪恶的渊藪。今日中国公共权力的腐败已经超过社会能够忍受的限度，成为全民感到剧痛的社会癌症。

有人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概括上述社会现

象。我认为这个说法不确切。第一，“资本主义”这个说法早期在学界对它没有定论，直到 20 世纪之初才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也没有定论。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权贵资本主义”回避了公共权力的责任。而造成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公共权力参与市场和控制市场。所以，我认为用“权力市场经济”比较贴切。

权力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寻租”(rent seeking)。“寻租”就是寻求“租金”的活动。什么是“租金”？现代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租金”是指由于缺乏供给弹性的差价收入。供给弹性的缺乏是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抑制了竞争，从而扩大了供求差额。通俗地说，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增加官员的干预权力，使得接近权力的人能够得到或占有“租金”的特权。经营者为了寻求租金，向官员行贿；从租金中得到利益的官员，又力求保持原有租金制度和设立新的租金制度。这样由“寻租”到“设租”，就产生了一个贪污腐败蔓延、因果相关的恶性循环。

垄断是权力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垄断不仅扭曲了市场，也产生特权。当今的垄断主体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中央直属国有大型企业代替原有的政府工业部门进行垄断。它们获得优质资源的垄断权，如石油、电信、烟草、煤炭、航空、铁路、电力、金融、保险等。它们利用廉价的资源、资金和政府优惠政策，取得垄断利润，可以决定企业的利润分配和员工工资。他们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个高利润领域。而对民营企业却是排斥、控制和吞并。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企业出于自身利益，通过种种形式迫使国家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国有企业的高管和政府官员是可以互换的，今天是政府的部长，明天可能是某大企业的董事长。而这些可以互换的高管，相当一部分是高干子弟或者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所以，今日的国有企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权贵阶层的俱乐部，是权贵者的分利集团。

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公平交易。在这种制度下，权力至上，权力崇拜，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权力等级上。权力中心就像黑洞一样吸收社会财富。在不同权力等级上的人，不可能平等交易。有权的人和没权的人交易，权大的和

权小的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甚至前者任意宰割后者。

寻租,垄断,不公平交易,必然扩大贫富差距。一边是拥有数亿、数十亿甚至上百亿财产的超级富豪,一边是大量的贫困人口。2009年中国政府将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合二为一,贫困线定为年收入1067元,约为150美元,2009年,提高到每人每年1196元,约170美元,平均每天0.46美元。按这个标准,2009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597.1万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2010年9月26日)。按联合国每人每日1.25美元(38美元每个月)贫困标准计算有多少贫困人口呢?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温家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2010年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讲话)。专家们计算的结果高于温家宝总理的这个数字。因为联合国这1.25美元指的是每天的食品消费量,而中国的贫困线是日收入。

权力市场经济使社会不公正。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基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权力市场经济使阶层固化。社会流动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上升的希望,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社会固化,底层没有希望,社会矛盾就会尖锐。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国社会流动很快,其中,后致性因素(主要是个人努力)的作用大于先致性因素(家庭的社会地位)。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后致性因素的作用减弱,社会阶层开始固化。过去通过上学来改变社会地位,现在没有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阶层固化不仅仅是上等阶层的阻止,还形成了一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干部子弟,让干部子弟升官发财→让干部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接近权力中心的干部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在地坐在家,也会有人把“乌纱帽”送到手上。这种利益机制造成了社会地位的世袭。

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势群体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从而使社会更不公平。那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出台就相当快。最典型的是住房改革和公车改革。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在这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和中央部委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低收入家庭才有资格买)的价格卖给公务员。这种变相福利分房的情况在全国有些地方比北京更为严重(杨继绳:《住房改革的由来和现状》《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1990年代后期有350万辆公务用车,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科研、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1998年国家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十多年没有丝毫进展。2007年全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221755辆,一辆公务用车一年费用需要20万元(购置费折旧、维修费、油费、司机工资福利等),全国为此消耗超万亿元,全国13亿人,每人平均承担公车费用798.7元(卞保武:《昂贵的官轿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编《改革要情参阅》第6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2页)。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权力市场经济制造成的现状是: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当今中国面临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被驾驭的资本。“仇官”和“仇富”的社会心理也由此而生。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1990年代中期以来,群体事件逐年增多。1993年8700起,1999年3.2万起,2000年5万起,2003年5.8万起,2004年骤升到7.4万起,2005年8.6万起,2006年达到9万起,2008年超过10万起。最近两年没有公布统计数据,但贵州瓮安事件、陕西陇南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安徽马鞍山事件等规模大影响广的事件都是最近两年发生的。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事件约占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社会出现

了不稳定,政府就致力于“维稳”。2009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总金额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超过国防开支,相当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的2.6倍,和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相接近(海涛:《政府维稳陷“越维越不稳”怪圈》,2010年4月19日《中国青年报》)。政府花这么多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和打击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控制上访是中央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项指标,“截访”就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地方政府没有这么大的精力,私人办的“保安公司”就应运而生。北京的安元鼎保安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安元鼎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他们对访民施以暴力,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恶名昭著安元鼎,却得到了官方的高度认可。2007年,他们获得了由12家单位联合授予的中国保安服务“十大影响力品牌”,2008年又被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评选为“A级安保企业”。

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被国家吞噬。权力市场经济,继续扩大政府的权威,社会继续被压缩在政府权力之下。一个没有“社会”只有政府的国度,政府直接面对百姓,是一个刚性而脆弱的国度,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度。不进行政治改革,用政府的力量来“维稳”是舍本逐末之举,其效果当然适得其反。

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持续。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直接原因一是劳动者的权利得不到保证,因而劳动力价格低下;二是政府控制下的资源价格过低;三是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四是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

由于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太低,(白重恩、钱震杰:《我国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下滑》,人民网2010-1-2。)低劳动力价格不可持续。由于资源过度开采,资源低价格也不可持续。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指出,全世界空气最污浊的20个城市,中国占16个;中国河流的污染已到了可怕的程度,有70%以上的江河湖泊和90%以上的城市地下水遭到污染。中国九大湖泊有七个严重污染(世界银行报告——《中国污染代价》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中文被删节)。环境问题已经成为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刚性约束。对国际市场的高度

依赖不可持续。目前人民币币值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结果是出口企业利润下降,对内贬值的后果是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里外夹攻,出口企业无法生存。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变增长方式是很难的。增长方式不变,增长速度就要下降。一旦增长速度下降,失业率就会提高,企业亏损面就会扩大。目前又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通货膨胀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货币太多,二是工资上涨。1992年后,中国每年以超过23%的增长速度印刷货币。2008—2009年,全球五大货币M2同比增长了8.38%,而人民币M2增幅却高达27.59%。2009年放出了9.6万亿的天量贷款,同比几乎增长一倍(金岩石:《通胀“功不可没”》,载《改革内参》2010年第23期)。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的趋势难以避免。

与“土地财政”相关的房地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一次又一次反抗“暴力拆迁”的弱者自焚表明,权力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少数人靠权力致富和多数无权者被剥夺的基础上的,已经把老百姓逼到以死相抗的地步。再持续下去是很危险的。

与“中国模式”对现状的全面肯定相反,我在这里揭示了当前的种种危机。这些危机说明,所谓“中国模式”(即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称为权力市场经济)已经走入了困境。合乎逻辑的出路就是建立“宪政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是中国的仁人志士百余年的追求,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能够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由于当今的资本是附庸权力的,在驾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

新一轮反“西化”之争

“中国模式”是最新一轮的对“西化”的批判抵制。潘维反对“迷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拆掉故宫建白宫”。其实,对“西化”的批判由来已久。

为了挽救晚清危局,一些有眼光的人提出向西方学习,并且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为了防止西方文化解构晚清的

专制制度,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坚持“体”(即专制政治制度)的不变,是当时的一项基本政治原则。“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更加激烈地批判中国皇权专制的政治传统,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同时也出现了以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名义反对“西化”的力量。此后,学习西方和反对“西化”的争论持续不断。反对“西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其共同点都是为了维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从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在体制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坚持中国的传统。这对于全面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来说是个进步。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这条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和“中体西用”相对立的是“西化”(包括“欧化”、“新化”的提法),他们批评洋务派仅仅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主张在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上也学习西方。长期以来,“西化”和反对“西化”各执一端的争论不休。到上世纪30年代,又出现了“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之争。“中国本位论”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授意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写的一篇文章中提的。其本意是维护蒋介石政权及其思想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保住清朝的“体”,“中国本位论”也没有保住蒋介石的“本位”。为什么在“西化”和反对“西化”的一轮又一轮的争论中,保守的一方总是失败呢?这是因为,反对“西化”的种种理论常常被执政当局作为维护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工具,特别是用来反对民主、维护专政的理论工具。著名哲学家艾思奇1940年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一个特殊传统。它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杀人类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走自己的路。”(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载1940年2月延安《中国文化》。)

从清末到“五四”,反对“西化”的一方实际是要坚持“孔化”。那时的争论是“西化”和“孔化”之争。西方文化早就分裂出马克思主义,并且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苏联政治体制。所以,“西化”有“苏联式西化”和“欧美式西化”,“孔化”近代也分裂为传统儒学和现代儒学等多种派别。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西化”在中国占了统

治地位。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一种西方文化(马列主义)打倒了,另一种西方文化(欧美式)被推到了对立面。在“苏联式西化”的过程中,倒真有一点“全盘西化”的味道。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当成封建糟粕,不停地批判孔孟之道,批判“道德继承论”,提倡“厚今薄古”(即厚马列主义之今,薄中国传统文化之古),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苏联的教材搬进了中国的学校,连苏联的一些名词也不加翻译地拿过来了,“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等等。在大陆真正搞“全盘苏化”的时候,台湾反其道而行之,大力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直到今天,台湾比大陆更有“中国特色”。

邓小平曾经对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苏联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邓小平《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9日,载《建设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二版,第144~145页。)1980年代中期,出现了新一轮“西化”和反对“西化”之争。这时反对“西化”的一方实际是坚持“苏联式西化”。在跨世纪年代,不是用西方文明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用现代民主制度代替“苏联式西化”的问题。改革3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上已经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体制还坚持苏联模式,从而使中国陷入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俄国已经抛弃了苏联模式,“中国模式”论者,还珍惜人家已经抛弃的“弊帚”,再一次弹起反“西化”的高调,极力维护现存的政治体制,真是有点荒唐。今天的“中国模式”论既保卫“苏联式西化”,又保卫历次反“西化”论者坚持“孔化”。“中国模式”论者所掀起的反“西化”,只不过是近百年来反“西化”的一波新浪花。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强烈呼唤政治改革的时候,在中国人十分渴望民主的时候,这一朵小浪花,能够阻挡中国民主化的巨浪吗?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论表达权与言论自由

郭道晖 / 文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近年来，这四权一直为高层领导人在各种重要文件和讲话中反复申述和强调。这四权、特别是表达权（它是其他三权的前提）如果能真正化为实践，那将是我国公民的一大福音，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进步。

什么是表达权？它包含哪些要义与内容？怎样才能不只是停留在字面上而能落实为公民实际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这些都有待细加研讨和阐明。

什么是表达自由

表达权，亦即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主要是指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但它比“言论”的自由涵盖面更广：

一是其表达形式的多样性。不限于由语言、文字形成的言论，还包括象征性语言（symbolic speech），如形体动作、图像、绘画、雕像、音乐等艺术形象，企业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的标志、礼仪（如献花、悼念、宗教仪式、团体聚会）以及其他某些表达内心意愿的行为等等，都属于表达自由。如上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反对入侵越南的战争而撕毁征兵登记卡；美国学生抗议越南战争而佩带黑色肩章上学；因宗教信仰自由而拒绝向国旗敬礼（理由是非其教义所规定崇拜的偶像）；因不同政见而撕毁国旗，甚至穿着表现政治倾向的服装、携带纳粹的旗帜，都被联邦最高法院在其判例中援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判决为公民的表达自由而不受惩罚。这类的表达自由常常都归入言论自由范畴。2010年上海高楼大火，造成重大伤亡，事后10~20万人前往献花悼念并问责，也是属于公民的表达权，政府应当予以

尊重和保障。

二是体现于宪法中确认的某些公民基本权利，它涵盖各项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等），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信息传播自由，等等。

1948年的《联合国人权宣言》第一次把表达自由宣布为国际法规范。宣言的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表达自由的权利扩展到适用所有的媒体：“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要求签约国保证“传播科学和文化”，并且“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要求跨越国与国之间的表达自由必须考虑和重视全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首次确认了通过互联网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之间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流，各国不应当对互联网上的表达自由进行过多的限制。

我国政府已签署了上述三条约，除政治权利公约外，全国人大也已批准了其他两个公约。我国宪法所列公民的基本权利中，也有属于表达自由的项目，如第35条的各项政治自由，第40条的通讯自由，第41条对国家机关及其人员的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的权利，第47条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等等。但同上述国际条约的规定尚有相当差距，有待充实；更重要的是这些自由缺乏立法保障，往往只是宪法上

徒具琳琅满目的言辞,而无实际的效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党政干部对宪法上述规定的漠视甚至蔑视,而习惯性地违反;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我国宪法不像民主国家宪法那样是“可诉性的”,我们对违宪侵权行为不能通过宪法诉讼解决,而又没有相应立法为凭借,去进行维权的司法诉讼。相反,倒是无权立法的某些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违反《立法法》的规定,擅自制定一些限制、压制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表达自由的法规、规章乃至“红头文件”和不留痕迹的“口头指令”。恰如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宪法“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表达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

表达权是公民和社会组织享有和行使其政治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前提。

表达权作为人权,主要是基于人类本性及其需要所决定的。人是自然界中唯一有思想、意志和能运用语言文字等进行自由表达和在人际间自由交流的动物。这是体现人的存在和人格的标志。“我思故我在”。但有“思”而不能向人表达交流,“思”就毫无意义,思想也不可能得到萌生和发展。长期被关在与世隔绝的单人牢房里的囚犯,失去了与他人对话的表达自由,往往成为痴呆或疯子。因此,表达自由、言论自由是人性的自我实现,人格的自我表现,人的本能的自我发展与完善,乃至人之所以能作为人而存在的必要条件。表达自由能使人感受到作一个独立自主的自由人的资格,赋予一个人作为人的尊严。个人的表达自由受到压抑或剥夺,也就是对他的人格与个性的摧残。奴隶尚且是“会说话的动物”,如果自由人而没有说话、对话的自由,那么,他虽有人身自由,也同一般动物、禽兽没有多大区别了。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的关系只有通过彼此意思的表达,才能形成。人类的智慧与意志也只有通过表达,才能集思广益,成为社会共同的财富,也才能推进社会的进步。所以,表达自由更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虽然不是充分条件)。遏制、剥夺人们的表达自由,也就阻滞、扼杀了人类社会的

发展。所以,表达自由不仅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体现,也是人类的社会性人格的体现,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动力。所以,表达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私权利),也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的公权利,是行使其他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力的前提条件。

表达自由有三种基本形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会游行示威等等。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核心——言论自由略加阐述。

言论自由——表达权的核心

言论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主要形式和基础,是所有其他形式的表达自由不可分离的核心和母体。没有言论自由,集会、结社、新闻、出版、游行示威、批评检举、控诉等等自由和权利就无法实现,也不能行使通讯自由、选举的意志自由和通过言论等方式以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自由也会成为泡影。

言论自由作为人权,作为人自身的目的,其对个人的重要性,已如前述。从公民的政治权利视角而言,言论自由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基本条件,是推进社会科学文化和人类精神自由发展的凭借。

1. 言论自由是公民参与政治、监督国家、实现当家做主的必由之路。

民主政治或多数统治的基本原则是,其统治必须建立在多数公民的同意上,其决策必须是民主的、公开的,其权力必须受公众的监督。要实现这些要求,就有赖于开放言论自由,使公民得以通过自由地表达其意志和意愿,来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作为对应于国家公权力的公民言论自由这项公权利,是公民实现对国家的参与权、监督权、抵抗权的主要手段。

公民通过各种渠道,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进言献策,对话争鸣,使民意集中,民情上达,使国家权力渗入社会性的营养,使执政者的决策建立在人民共同意志之上,得到公众的认同、信任与支持,拥有公信力和群众基础。此即所谓“政通人和”。

公民通过知情权和信息自由,了解政府行为的得失利弊,然后运用媒体等手段,自由发表言论,形成舆论,就可以对执政者进行警戒。

在政府无能,官僚腐败,权力失控,民不聊生之时,如果公民和社会组织还有适度的言论自由,则可借自由的言论进行舆论抵抗,对专横的政治也可以遏制其发展,保护人民的权利。“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无道,则“群起而攻之”。再则,言论自由也可成为出气口,泄洪道,使民怨得以宣泄,不致积累矛盾,酿成总爆发的危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广开言路,有利于社会稳定。

2. 言论自由也是推进先进思想文化和提高人类精神境界的动力。

百家争鸣,才有利于发现科学真理,有利于文化上的百花齐放。历史上大凡体现新思想的科学理论和文化样式,在初生时总被视为异端。如果社会容许有讨论的自由,就可以使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脱颖而出,使科学文化繁荣昌盛。

言论自由还是现代社会政治与精神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尺。作为言论自由的组成部分,讨论自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重要方式。通过彼此切磋问难,自由辩驳争论,人们尽情抒发个人的才智,使良知得到尊重,真理得以彰显,对个人也产生成就感和自我表现的满足。所以,密尔把它称之为“人类的精神福利”。(密尔《论自由》,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3.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言论自由的价值也可从反面来衡量。没有言论自由,搞所谓“舆论一律”,“定于一尊”,只许发钦定的议论,或者进而强制“统一思想”,按领导人规定的“舆论导向”表态,不准自由讨论,不准提相反的见解,只会造成思想僵化和停滞,错误言论将永远错下去,钦定的正确言论也将逐渐变成僵死的教条。

剥夺人民的沉默权(这是反向的言论自由,即不言论的自由),则将鼓励说假话,助长思想霸权和文化专制主义逞威。更有甚者,像古代封建帝王大兴文字狱那样,搞“大批判”,“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却不容许被批判者有任何辩护的权利,那就势必扼杀真理,颠倒是非,知识精英夭折,国家元气大伤,文明倒退,并造成数以十万、百万乃至千万人的冤狱。我国从反胡风、反右、反右倾、大跃进,直到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无不是从压制、扼杀言论自由开始。所

以,邓小平才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言论自由的要义

1. 言论自由首先是有发表不同意见或说“错误”言论的自由,即不在于有说正确言论的自由(因为被公认为、特别是被权力者指定是“正确”的言论,是不会受到压制的),而在于有说被认为是“错误”言论和违反主流言论乃至与现行宪法法律不一致的言论的自由(只要不见之于行动上破坏宪法和法律),否则就不叫言论自由。不允许有与现行宪法和主流观点不一致的言论的自由,也不可能出现对宪法和法律的修改和对国是的新的主张。

譬如有人提出对现行政治体制或国家结构体制不同的主张,作为一种政见,即使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只要他没有采取或煽动采取暴力手段并予以实施,来改变现行宪制,就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应当允许发表和讨论。即使执政者依法可以动用行政手段来限制这种言论的“自由扩散”,也不能借此对他定罪。

对事关“危害国家安全”这类重大罪名,在适用时更不宜作扩大解释。记得1979年我刚调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时,曾亲历我国第一部刑法草案的研讨和审议。在其第90条界定“反革命罪”时,原稿中有多种提法,如“反对”或“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之类,都是一些外延和弹性很大的广义词,对社会主义社会某些现象不满,都可以上纲为“反对”“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不同看法,也可以扣上“反对”的帽子,判处“反革命”罪名,这在文革中是习以为常的。为吸取这个教训,在彭真同志反复斟酌下,乃改为“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这样加上“推翻”“政权”和“制度”的“目的”与“行为”等限制词,其归罪面就小得多,不至于将那些只是在思想言论上“反对”“破坏”某种理论或主义的人,都入罪为“反革命”。当然,“反革命罪”的罪名本身也是不确定的模糊的,而且是一项政治罪,容易导致扩大打击面。所以,后来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就废弃了“反革命罪”的提法,改为“危害

国家安全罪”。今天,我们更应当秉承这种立法精神,对这类罪名的认定,作更严格的狭义解释,不宜扩大化,以避免陷入“以言治罪”的错失。

2. 有沉默的自由,即有不言论、不表态的自由。那种强迫人们作违心之言,或表忠心,或坦白隐私,是一种精神迫害,只会使假话盛行,真言敛迹。至于通过残酷的刑讯逼供以获取口供,不仅是侵犯人身安全和自由,而且也是侵犯了公民的沉默权——拒绝言论的自由,现在已有法规规定,非法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刑事审判的证据,施行刑讯逼供者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3. 言论自由不只是保障多数人的自由,更在于保护少数人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真理有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当多数欲通过民主程序压制少数人的权益时,少数人可以借自由的辩论发表反对意见加以抵制,从而避免民主从多数统治走向多数暴政。

4. 有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和公民传播信息的自由,否则言论自由就缺少情报来源和事实根据,流为无的放矢,难以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其言论不能传播就不能起社会作用。

5. 对违法或有害的言论,除事关国家安全和军事秘密者外,应实行事后追惩制,不作事先的审批和禁止。否则未经实践和公众检验,言论正确、合法与否,全凭少数几个权力者的专断、暗箱操作,无法公开让公众辩论、监督,从而为压制言论自由的权力滥用,开方便之门。

对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

言论自由虽然具有崇高的价值地位,但它与思想、信仰的绝对自由不同,不能是无限制的,其自由是相对的。由于它关涉他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安全秩序,所以要受到法律的一定限制。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第2款对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限制作出如下规定:“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的时候,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这里规定的对自由的限制,只限于要保障他人和公共道德秩序和福利的需要,而不

是限制对政府的批评、维护执政者的地位与威信的需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除在第19条第3款规定了上述言论自由限制外,还要求限制的范围不能过于宽泛、过于武断。政府还有义务对其所加于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制是否符合上述目的和正当需要,承担举证责任。

对言论自由或表达自由规定得较明晰的是《欧洲人权公约》的第10条,其两款既确认对表达自由的保护,也规定了必要的限制:

(1)人皆有表达自由权。此权利应当包括持有意见的自由、接受和输出信息和观念的自由,不受公权干涉,不受疆界影响。该条不应当妨碍国家要求广播、电视或影视实业获得许可证。

(2)行使这些自由伴随一定的义务和责任,故应当受制于一定的形式、条件、限制或刑罚。此类制约应该为法律所规定,为民主社会所必需,并且有利于国家安定、领土完整或公共安全,服务于防止秩序混乱或犯罪、维护健康或道德、保障其他人的名誉或权利、防止披露保密资料或者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

上述国际公约所规定的限制,主要是规定政府对言论自由所施限制的“唯一目的”,且这些限制确是民主社会所“必需”,否则政府就无权限制言论自由。不容许政府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滥施官僚主义的不合理的限制,不能借口自由要有法律限制而压制、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正如约翰·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所强调的:“限制自由的理由来自自由原则本身。”“自由的优先性意味着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

当然,上述条约也适用于公民。至于限制什么,如何限制,则是随国内政治局势不同,宽松严紧的程度也有所区别。如美国历史上曾经先后实行过“明显而现实危险”原则和“危险倾向”原则。

1919年,美国社会党领导人沈克号召抵制征兵,抵制帝国主义战争,被控有罪。沈克上诉,援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来辩护。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沈克言论是“危险的”,裁定有罪。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认为,一项言论如果对国家、社会有“明显而立时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就不受宪法保护。譬如在戏院演出时造谣诋呼“起火了!”就有

导致全场大乱、甚至引起踩踏人命的“明显而立时的危险”，这种“言论”就绝不许有自由，而要立即予以取缔惩处。

1925年，美国社会党领导人季特诺(Gitlow)发布《社会主义者宣言书》鼓吹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纽约法院判他有罪。季特诺上诉辩护说他们只是一种理论宣传，不具有“明显而立时的危险”。而联邦最高法院却提出了另一原则，即“危险倾向”(dangerous tendency)原则，意思是不需有现实危险，只要有危险倾向就可定罪，结果据此原则判季特诺有罪。这一原则是对言论自由的苛严控制，反映了当时美国政府和执政党对共产党人的排斥打压。

1950年代审讯加州共产党领导人时，最高法院又撇开了“危险倾向”原则，而适用“明显而立时的危险”原则，认为被告虽提倡用武力及暴力推翻政府，但仅是抽象的理论或学说，并未唆使他人进行不法行为，而且当时环境下也不用耽心有人会因而引起行动，因此裁定为无罪。

自上世纪60年代初到现在，这两项原则未见再有适用。可见对于言论自由限制的苛严或宽松，是随国内政局而变动，而与统治者的利害得失密切相关。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既然我们一再申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且有的论者还喜欢援引列宁的话：“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高出百万倍”，其逻辑结论应当是要求我们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也要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出百万倍。但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却令人失望。

在事关表达权或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和公民权问题上，我们解释和适用法律、特别是刑法条文，应当特别审慎，切忌扩大化。殷鉴不远，不要重蹈“以言治罪”的覆辙了。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作者更正

本刊2010年第12期《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一文第26页左栏第1行：“天赋权力”系“天赋权利”之误。同页同栏倒数第11行：“他们去了台湾，”后面应增加11个字：“张君勱转而定居美国。他们”。

许良英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合药厂械(港)字2009第2460324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合药厂械(港)字2009第2460325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及在医生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合药厂(港)字2010040048号

错案探究：公权无界与私权无助

魏兴荣 / 文

在探讨宪政时，绕不开两个关键词：“公权”与“私权”。公权，原本是授予之权、委托之权，是为保护私权而存在、而具有合法性的；私权，则是“本权”，即天赋之权，如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自由权、财产权等，它们中的许多权利与生俱来，或通过后天努力所得，它们理应得到公权保护。公权虽是授予之权，但它因为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做后盾，从来就是一种强势之权，且有自然膨胀的属性。而私权是弱权，它被侵害的可能性时时存在。因此公权需要限制、抑制，私权需要保障，被侵害后需要救济。尽管公权与私权相互依存却又是一对矛盾体，但在宪政的框架内，在公正的社会里，公权和私权应获得一种平衡状态。然而，当公权与私权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甚至处于对峙状态，当公权无界，甚至当私权的萎缩、受限制和被践踏的根源竟是公权的扩张、延伸和滥用时，我们就不得不质疑某种公权的正当性并思考公权异化的程度和根源了。

近年来接连发生的一些众所周知的案例颇能昭示公权、私权的现状，并从这些近乎畸形的社会现象折射出社会危机的程度。

一、“亡者归来”之悲

1.关于余祥林案。余祥林，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人。1994年1月2日，余妻张在玉因患精神病走失失踪，张的家人怀疑张在玉被丈夫杀害。同年4月28日，余祥林因涉嫌杀人被批捕。自1994年4月11日至4月22日11天的审讯之中，余祥林供出了四种杀害妻子的作案方式。余被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因行政区划变更，余祥林一案移送京山县公安局，经京山县人民法院和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1998年9月22日，余祥林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05年3月28日，余妻张在玉突然从山东回到京山。4月13日，京山

县人民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已服刑11年的余祥林无罪。2005年9月2日余祥林领取70余万元国家赔偿。

2.关于赵作海案。1998年2月15日，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振响的侄子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其叔父赵振响于1997年10月30日离家后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1999年5月8日，赵楼村在挖井时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头、膝关节以下缺失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1999年5月10日至6月18日，赵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做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省法院经复核，核准商丘中院上述判决。2010年5月9日，在监狱已服刑11年的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响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2010年5月17日，赵作海领到国家赔偿金和困难补助费65万元。

前有余祥林，后有赵作海，两案皆因“亡者归来”而洗冤，一再印证中国司法存在昏暗现象。赵作海案披露后，网上迅速流传了一个根据《爱情买卖》的曲调制作的歪唱版的视频，题为“赵作海之歌”《亡者归来》。歌词调侃中透着悲凉：比窦娥悲哀，数我赵作海 /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 比余祥林哀，谁背了良心债 / 就算赔我再多金钱也再买不回来 / 当初我没把人害，没害就没害 / 你们非要用枷锁把我关起来 / 罪名不是我想甩，想甩就能甩 / 让我坦白、让我交代、把黑说成白 / 牢狱十一载、头发也变白 / 妻离子散家园破败悲从心头来 / ……折磨不是我想甩、想甩就能甩 / 死人复活、亡者归来、洗刷我清白 / 狠心把我来伤害、你们很自在 / 无凭无据把我踩、大牢让我待……

“亡者归来”悲在何处？一悲“亡者”未亡且完好，竟有杀人犯；二悲完全无辜却能多次自供可

能承担极刑的杀人罪，可见刑讯之凶而无忌；三悲“犯罪嫌疑人”曾供出四种杀人方式，竟可使案件顺利过关；四悲公检法各司其职政法委督办指导四家联手铸错案；五悲蒙冤人四处上访（余祥林家人坚信余祥林不会干出杀妻之事，余弟余锁林不断寻找各方面的证据材料到有关部门上访却因上访于1995年5月4日被京山县公安局关了41天，被放出时还被警告：出去后再上访再把你逮进来，余母杨五香因四处张贴寻“死者”张在玉的启事和上访，1995年5月6日也被抓，并在京山县公安局看守所被关了9个半月，后因时近年关被交保800元赎人，出来后3月即去世）无诉处，非得“亡者”复活案方翻；六悲不管“亡者归来”还是真凶浮现，有众多冤案昭雪无一不依赖于司法制度以外的偶然因素；七悲冤狱赔偿由纳税人买单，各级责任方无一站出来向公众道歉……

二、冤案知多少

如果泱泱大国里只有一个余祥林一个赵作海蒙冤也勉强还可以说是个案，但事实上冤案之发生绝非偶然。让我们看看这支蒙冤群体里究竟有多少冤民无辜受难：湖南滕兴善“杀人碎尸”枪决16年后被宣告无罪；湖北黄爱斌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羁押4年后获释；吉林孙邵华“杀死3人后点火焚尸”服刑11年后无罪释放；河北徐计彬“强奸”蒙冤15年后被宣判无罪；河南郝金安“抢劫杀人”被判死缓10年后被宣判无罪；海南黄亚全、黄圣育因“抢劫罪”蒙冤10年被宣判无罪；黑龙江史延生因“抢劫杀人”一家7口蒙冤5年后被宣判无罪；山东陈世江“故意杀人”蒙冤8年后被宣告无罪；广西覃俊虎、兰永奎因“抢劫杀人”被羁押4年后被无罪释放；重庆童立民因“奸杀小保姆后碎尸”被判死缓4年后被无罪释放；陕西高进发因“奸杀幼女”被判死缓3年后被无罪释放；四川李杰等4人因“故意杀人”蒙冤8年后被宣判无罪；黑龙江杨云忠“故意杀人”蒙冤7年被宣判无罪；云南孙万刚“奸杀分尸”被判死缓8年后被宣判无罪……

以上错案中绝大多数都是定为“杀人案”中的滥判无辜！

此外，更有法律界高层人士编选了一本《20

世纪末平反冤假错案案例纪实》。作者刘斌从300余宗经过司法审判程序造成的各类冤假错案中选取60余宗予以剖析，案中主人公都是平民百姓。该书完全纪实，忠实地记录了一个个草民为了生命尊严不被践踏，为了获得生存的权利所进行的抗争、所经历的苦难和无辜承受的冤狱之灾，令人读罢唏嘘不已、感慨万千。该书编者刘斌引用培根的一句名言说：“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他说的还只是‘不公正的判决’，那么一起纯粹的冤假错案其社会恶果就更是不言而喻了。”其实培根还说过一句话：十次犯罪只是污染了一段水流，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却污染了河水的源头。且看现实，不公正的判决已经远不是一次两次了。河水的源头早已被污染，且不断有冤假错案出现刷新着冤案记录，河水亦愈加浑浊。

更值得深思的是，见诸媒体的冤假错案不管错得何其离奇，蒙冤者承受了多少磨难，不幸中万幸的是被冤者终究讨回了清白（当然，也有蒙冤者虽幸被洗冤，但早已成冤魂苦鬼，无缘获知一丝安慰了），而仍在洗冤艰途中煎熬、奔波的蒙冤者究竟有多少呢，恐怕谁也说不清。因为不是每一个“亡者”都能归来，更不是每一宗错案都能得到昭雪的。

比如广西的王子发9年前身陷一桩命案，如今真凶覃汉宝已自首三年，被错判“杀人犯”的他至今却仍在蹲大牢。王子发与杀人案中的被杀者吴宗谋原本都是被害人，王子发也被捅了数十刀，他只是幸运地未被捅到要害而幸存。但当他夺过杀人者的凶器并报案时，则被疑为杀人犯且终而被判死缓。覃汉宝自从犯下杀人罪并让另一受害者承担罪名后，寝食难安，新出生的儿子仅存活6天就夭折也被其认为遭到了老天报应，心理负担愈重，于是在后来又犯抢劫罪服刑期间良心发现，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尽管覃汉宝的交代把王子发的犯罪证据全部推翻，但因覃汉宝杀人案要经过一系列程序，真凶未判前，替罪羊王子发就只能先替着，致使真凶浮现3年至今仍无结果。

正可谓错判容易纠正难。真凶浮现纠错尚且如此之难，那些真凶隐藏着或其他蒙冤者的冤案呢？纠错难度可想而知。

三、错案频仍的前辙后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从有文字记载的夏朝算起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但从1949年共产党执政之后的中国则称为“新中国”,新中国之“新”应该有更多更新改善之处,应该有更多公正、更多祥和、更少丑恶。然而,60年的历史里,前30年是人治造成的成批量的冤假错案:包括1955年震惊全国的涉及2100多人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包括1957年用“阳谋”引出的55万余“右派”案;包括1959年对彭德怀“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包括“文革”中对刘少奇、贺龙、陶铸、罗瑞卿等一大批国家及省市各级领导人的批判与迫害(据统计,“文革”前全国共有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1253人,“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有1011人,占81%);包括对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一大批敢于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志士仁人的迫害与杀戮。从1978年至1982年底,在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中,据不完全统计,此间,经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因这些冤案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更是数以千万计。

改革开放后的30年,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平反了冤假错案,国家重心从斗争、破坏转变为建设,国家治理方略也从人治向法治渐变。但在此艰难的嬗变过程中,由执法过程产生的错案仍层出不穷,且有些案件触目惊心,给年轻的共和国仍持续不断地抹黑,使国民对法制的信心不断流失。

四、错案不绝之启示

探析60年来两类错案发生的根源,盖因公权过于强悍,私权过于弱小。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始即未夯实搭建起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根基,公民权利的保障从未作为一国之要务予以确立,公权高于私权,公产高于私产,个体生命不敌公共财产,这种扭曲的理念不断被灌输的结果便是,公权不断膨胀,私权不断被矮化,公权对私权的侵袭前30年随时发生,后30年时有发生。而权利观念的觉醒和被关注只是近年的事。

一切都积习太久。当公权过于庞大时,握有公权者则易于无忌,在此政治生态中,小民处于孤立无援的弱势状态。比如余祥林,仅因有精神障碍的妻子走失,并在有人作证曾见过其走失后的妻子的情况下,就被公检法机关执著地将其以杀妻罪投入大牢,可见执法环境是怎样的一种堪忧状况。此类冤案屡屡出现,公民权利何以保障?

而公权何以能无限膨胀?过去,一个最高领导可以把国家玩于股掌之中,斗争所指,所向披靡,完全无法度可言。现在已建立了法制,宣示依法治国,可一些执法者却时而把法度歪曲,以公权之名侵犯私权,使私权无存,公权蒙羞。发生这些悲剧的终极原因是我们未建立权力监督制衡机制,未建立完善的遏错纠错机制。我们没有这种制度基础,而后来的改革也未能真正触及制度层面,未从制度层面把公权、私权的体位落差矫正过来。我们始终有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力,这个权力高高在上,在它的旁边没有一支平行的独立力量对其形成有效监督。在这种至上权力的荫庇下,有些人以公权之名,侵害无辜,危及公民社会安全。任何社会,如果有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不可能不被滥用的,这是一项铁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各种滥权行为、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发生了也拒不纠正,只待“亡者归来”被迫纠正,被迫赔偿。且纠错的程序非常简单:平反—赔偿—追究刑讯逼供者或其他参与铸错的个人。

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关乎社会公正、公民安全的严峻问题呢?怎样才能使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神圣起来,使公民活得真正有尊严呢?怎样才能使公权驯服、使平民百姓的腰杆直立起来呢?除了建立真正意义的对公权的监督制衡机制外,还需建立错案追究问责制。一桩错案的铸成,绝不是仅凭一两个刑讯逼供者就能完成的,其他相关人员、相关部门、相关领导承担何种责任?均需有法律规范。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而这种愿景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权力本身并不情愿在阳光下运行,需有一支力量迫使它在阳光下运行,即有监督者监督它的运行过程,让其运行透明,防止公权私用和滥用。公权得到有效限制了,私权始有制度保障。

逃港潮与相关政策变迁

王硕 / 文

深圳(原广东省宝安县)香港边境大规模的偷渡外流潮,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80年代,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无法有效阻止。对如今已成为国内发展前沿的深圳特区而言,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这一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历史底蕴,也对加深理解日趋一体化的深圳香港之间人员群体性流动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群体性外流事件发端

一开始,香港对大陆居民经济上的吸引力并不强。随着国共内战平息,大陆社会秩序逐渐稳定。1951年,香港大批人口返回内地,导致该年度香港人口迁移增长为-123%。(李若建:《中国大陆迁入香港的人口研究》,《人口与经济》1997年第2期。)朝鲜战争期间,西方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长期以转口贸易为根基的香港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前途一片黯淡。香港经济开始向转型找出路。

1955年3月,港英认为出入境差额大,开始单方面宣布实行“出入境平衡”法,规定离开和进入香港的人数要相等。1956年9月,港英又进一步限定持大陆通行证的每天50人入境。比之内地,香港经济已恢复一些活力。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英关系改善前,港英出入境政策没有大的变化。

1956年前后,深圳地区已基本建立起完备的边防管理体系,大致包括军事警卫制度、清理并迁离边境地区危险分子、划设边防区、实施边防区居民证和通行证制度等内容。深圳境内一度每天只准出入境2人,给边境居民社会生活造成很大困难。据有关统计,1957年前后,宝安县有直系亲属在港居住或是华侨的,占总户数1/4,如果加上有亲朋好友关系的,则至少占总户数

70%。(中共惠阳地委政法边防部:《关于人民群众往来香港的问题》,1957年5月10日,惠州市档案馆。)这种社会经济联系非行政手段所能隔断。由于自然灾害影响,农业歉收,偷渡外流渐成趋势。虽然数据轻微,但一开始问题就比较严重,因为大多数偷渡者在政治成分上属于基本群众,“这些人都是为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而跑去香港找出路,这是偷渡情况的主要方面。”(中共宝安县委员会、公安三〇团党委:《宝安县一年来的边防工作总结报告》,1956年9月5日,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

深港边境在1957年和1962年爆发了两次群体性外流事件。这两次事件中,以陶铸为首的广东省委的指导思想大略相同,即打破港英“出入境平衡”限制,帮助解决边沿地区部分群众正常的赴港探亲等生活问题,并单方面希望以香港社会黑暗的事实教育群众不要盲目偷渡外流。广东省委的底线是保证劳动力不大量外流影响生产。两次事件的规模有较大差别,1957年更像是1962年的预演。

1957年春节假期,边境地区成千上万港澳同胞“衣锦还乡”,对内地受灾群众刺激很大。同年6月,广东省委、省人委大胆制定放宽群众出境赴港的政策。其政策依据如一份报告所说,“我们与香港殖民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可以说是在政治上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本来香港殖民者限制入境是人民与香港殖民者的矛盾(由于内地严格管制)反而造成我们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尖锐化。”“经济上我们既然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现象,又不能一下子改变这部分人历来靠吃香港饭的情况,那么去一部分人谋生就业也没有什么不好”。去香港人多了,找工作不容易,叫想去的人都尝试一下,吃苦头,“这样我们则好教育农民安心农业生产,政治上则主动。”“对群众去香港问题必须改变现行做法,总的方面应当是放

宽,但仍需要有领导有控制的进行。”(中共惠阳地委政法边防部:《关于人民群众往来香港的问题》,1957年5月10日,惠州市档案馆。)

由于保密措施不严,东莞县提前透露了这一消息,并迅速蔓延至宝安县、惠阳县等边境地区,掀起了自解放以来群众偷渡外流的第一个高潮。两个多月时间,内地外流劳动力6千余人。同年8月30日,广东省委收缩政策,事态很快平息。

这时候,各方面还没有把外流事件与阶级斗争相联系。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内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迅速向“左”转,对国计民生造成极大创伤。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饥荒中,广东省企图偷渡的人数激增。虽然宝安县1959年粮食丰收,并无饥荒之虞,但是全县副食品供应不足,与香港居民生活差距较大,许多群众也积极参与偷渡。

自1960年9月到1962年下半年,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1年5~6月间,陶铸两次到宝安县视察,他认为适当放宽边防,对搞活地方经济有好处。又认为,“帝国主义非常狡猾,一面用人口平衡来限制我方群众正常来往,一面在那里修学校,假办福利事业来引诱群众。香港是个弹丸之地,出去几万人就把帝国主义搞垮了。”(李富林:《关于在宝安县工作的错误问题》,1966年9月6日,惠州市档案馆,2-A12.11-185。)1962年3月,广东省委边防工作会议制定进一步放而不是收的边防政策。

一轮大规模的偷渡潮骤然而至。宝安县委于1962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叙述,“这次大批的群众外流是从4月27日开始,5月中旬达到高潮,5月22日采取‘堵截’等措施后,至月底基本平息。由于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不仅惠阳、东莞、宝安三县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12个省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往边境的公路上,外流的群众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一时铁路、公路客运顿然紧张。从4月27日以来,外流人数不下十万人次。”(宝安县委处理自由流动人口办公室:《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报告》,1962年7月12日,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5-A10-1962-1。)

由于劳动力大批外流,农业生产瘫痪,各县纷纷向广东省委告急。短期内大批人口涌入香

港,港英也难以承受。英国驻华代办处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合作”阻止事态继续发展。在周恩来督促下,广东省委及时更改了政策措施。(舒顺龙:《从大逃港到大开放》,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解密档案》栏目编:《解密档案——广东30年闯关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大外流的外因,是香港经过近十年经济转型,于上世纪60年代初已开始演变为现代化城市,劳动力需求旺盛。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广东省领导人对此认识不足。1962年外流事件中,港英虽怀疑广东省有意转嫁困难,但没有公开发表过攻击性谈话,对大陆偷渡者始终称为“非法入境者”,没有称为“难民”或“饥民”。港英一面加强边境警戒,被捕获者一般是在第二天由罗湖桥上列队送回;另一面,对那些进入市区的偷渡者,立即办理身份证登记,转为香港居民。此后一直到1980年10月,港英一直是配套执行这两种政策,视香港劳动力需要情况,来采取或宽或紧的办法。(鲁言:《边境宵禁及非法移民政策的回顾》,《广角镜》1980年11月16日,第98期。)

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一书,1962年4月,新疆塔城、裕民、霍城三县6万余居民逃往前苏联,引起中央高度关注。同年5月1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新疆事件处理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02~1705页。)同一时期,深港边境更大规模的偷渡事件,在《邓小平年谱》上则不着一字。为何两次同类事件在中央引起的反应不同?笔者以为,大体上是新疆事件是前苏联策动的结果,不可控;而深港边境事件,主动权在广东省委,可控。

政治边防

从1963年搞“四清”运动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前,偷渡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跟“阶级斗争论”挂钩。比如,1965年4月,宝安、惠阳、东莞三个县的公社书记座谈会上强调,“对偷渡问题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偷渡是什么性质?大家认为,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偷渡是叛国投敌行为,是脱离国家、脱离革命的违法分

子。”(《地委召开边防公社书记座谈会纪要》,1965年4月24日,惠州市档案馆。)

在被迫承认香港经济优于内地的同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性被片面强调和夸大。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就曾指示,“解决‘香港风’的根本办法是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不能只在经济账里打圈子。”(《印发寇庆延同志关于清除“香港风”的报告》,1965年11月17日,广东省档案馆,212-1-565。)广东省委在一份关于加快深圳地区边防建设的文件中强调,“我们同香港的斗争,不能比物质,而只能比政治。”(广东省委办公厅关于《巩固四清运动成果,加速边防建设的意见》的批复意见,1965年12月30日,广东省档案馆,212-1-605。)

1966年5月,广东省委公布反偷渡八大基本政策,政策进一步趋向严厉,对偷渡进行政策划线的年份确定为1957年1月1日。换言之,凡1957年之前偷渡出去的,只要拥有港澳身份证,就属于港澳同胞,返乡时能得到诸多优待。之后偷渡出去再返回的,不仅没有优待,而且禁止再出境。

1967年,林彪提出建设“政治边防”后,广东省先后召开这样几次会议:1968年,在深圳召开中南五省政治边防现场会议;1970年5月,广东省革委会、广东省军区召开“广东省政治边防海丰现场会议”;1970年6月,惠阳地区革委会、惠阳军分区在宝安县召开政治边防现场会议;1971年8月,惠阳地区革委会、惠阳军分区会同佛山地区革委会、军分区,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召开政治边防会议。反偷渡贯穿“政治边防”始终。值得注意的是,1969年12月,中央召开了港澳工作会议,为传达贯彻北京会议精神,1970年4月,港澳工委召开广州会议,两次会议对之前“左”的香港政策进行了初步修正。笔者以为,随后召开的海丰会议与此应有关联,所以,一边是宣传高压和管制强化,一边却在个别政策上出现松动,比如规定1967年后外逃的回归人员一律不准回港,取消以1957年为限的规定。(参见《省政治边防海丰现场会议纪要》,1970年5月27日,广东省档案馆,229-1-178;《港澳工委关于广州工作会议的报告》,广东省档案馆,229-1-177。)

在内地边境管制最严厉这一期间,偷渡者仍

不绝于途。以“思乡曲”享誉于世的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因不堪迫害,也于1967年1月乘船经深圳水域冒险偷渡香港,并辗转赴美国定居。随着“文革”深入发展,1967年深港边境“反英抗暴斗争”平息后,港英对偷渡人员一反过去部分收容部分遣返的办法,基本采取全部收容,并一般在半年后发给偷渡者身份证。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思想发生变化。1972年,随着中英关系改善,深港边境形势缓和,大规模的偷渡潮再次掀起。这一情况很快被周恩来知悉。1972年8月,广东省委向中央、国务院报送《广东省偷渡外逃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报告》。周恩来在文件中批示,“不要什么问题都提到路线斗争上来。”还强调对偷渡者“示之以威,还要动之以理,而且这后者是主要的,前者不到不得已时,不要滥用。”(广东省革委会保卫组整理:《周总理、叶剑英副主席对我省关于偷渡外逃情况报告的批示》,1972年9月9日,广东省档案馆。)1973年3月,周恩来所阅一份文件提到港英用盖漂亮房子、建机械化鱼塘、提高工资等勾引内地群众,他批示:“防勾引!一方我大力搞好,另一方也要向英提警告。”(《周总理、李副总理对我省工作的两个批示》,1973年3月4日,广东省档案馆,229-1-553。)周恩来的这两次专门指示,成为中央和广东省处理偷渡问题的指针。1973年12月,广东省委颁布新的政策规定,重申1970年海丰会议部分精神,同时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974年末,偷渡潮一度受阻,原因一方面是广东省委召开边防工作座谈会,把反偷渡纳入“批林批孔”和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强化意识形态斗争。政策上也不乏个别松动,比如,“外逃出去已加入外国籍的人,回国探亲者,如无其他政治问题的,一律不予扣证。”(《广东省边防工作座谈会摘要》,深圳市档案馆编:《建国30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2395页。)1974年港英与广东省就偷渡和遣返问题在边境举行三轮谈判后达成了口头协议,最重要的一条,即“对于未经中国有关机关批准并发给有效证件而非法前往香港的中国居民,港英当局原则上将不准入境、居留,并且迅速把他们送回。”(广东省深圳外事处:《关于就交还我逃港人员问题与港英当局进行第三次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情况报告》,1974年11月18日,深圳

市档案馆编《建国30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2484~2487页。)港英内部表述为“抵垒政策”。如前文所述，1962年外流事件中，港英已初步形成这一规定，之后中断数年，1974年的协议不过是港英重新明确而已。

1975年春节，大批返乡港澳同胞把最新信息带回内地后，新的偷渡潮潜滋暗涌。此时总人口约30万人的宝安县，与香港和海外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有14万人，每年回县探亲的华侨和港澳同胞有2万多人，还有经常来往两地、持有香港和宝安县双重户籍的流动渔民2万多人。与1957年相比，边境地区的偷渡潮明显有进一步发展。

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宝安县委在政治上对偷渡问题作出了激烈反应。比如，在1974年底“批林批孔”和“农业学大寨”高潮期间，县委强调说，“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以及我县党内的右倾思想，是近年来偷渡外逃下不来的主要原因。”(《深入批林批孔，认真汲取教训纠正不正之风，加快我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步伐》，1974年11月13日，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县委强调说，“每发生一次党内外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边防地区就会出现一次大的偷渡外逃活动，这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阴谋活动在边防地区的一个突出表现。”(广东省委《转发惠阳地委〈关于我区反偷渡外逃现场会的情况报告〉》，1976年7月19日，广东省档案馆230-1-267。)

最后的高潮

1977年11月，政治上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广东视察时指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邓小平副主席在听取广东省委工作汇报时作的重要指示》，1977年11月17日下午，广东省档案馆230-1-503。)以宝安县为例，1950至1965年，全县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5.1%，1967至1978年，平均每年只增长1.4%，全县有447个生产队口粮压到最低标准。1966年，全县社员集体分配人均108元，1978年为134元。香港新界边沿一线农民，1966年前人均收入1400元港币左右

(折人民币448元)，到1978年，人均收入13600港币左右(折人民币4300多元)。(深圳市委《关于充分发挥我市优势为国家争取更多外汇的意见》，1979年5月5日，深圳市档案馆编《建国30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2779页。)

“文革”结束后，随着政策再次松动，1977年夏至1978年春节前后，边境地区偷渡潮持续升温，揭开了1978至1980年前所未有的偷渡潮的序幕。

1978年8月开始，偷渡骤然加剧。原因大致有三：第一是广东省委新出台的侨汇商品供应政策没有把华侨与偷渡人员区别开来。不管是华侨还是外逃人员，只要汇回外汇，就可以拿到侨汇券，凭券可以买到人民币买不到的紧缺商品。第二是广东省委关于偷渡年份划线问题再次出现松动，造成思想混乱。省委在一份政策说明中指出，“规定一般外逃人员十年或五年后，可回来探亲，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教育大多数外逃人员及其亲属的工作，是有利的。”(宝安县委《关于处理偷渡外逃问题的几项规定〈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1978年8月22日，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110-A12-13。)宝安县委一度强烈反对这一宽松规定。第三是边防管理放松，边防部队警戒点减少，边防公社卡哨改为民兵看守，大多不落实。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港督麦理浩。在回答大陆居民去港人数太多问题时指出：现在应该采取两个途径解决：一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减少一些人进入香港，减轻香港的压力；另一方面，香港要鼓励私人资金来广东进行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长远来说，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能够逐步得到解决。邓小平的认识很准确。

1979年5月6日，刚由宝安县改建的深圳市面临前所未有的偷渡高潮。这一天有偷渡行动的近2万人。同年6月13日，国务院李先念、余秋里、王震、纪登奎、方毅、陈永贵、谷牧、陈慕华等八位副总理开会听取广东省汇报反偷渡工作。6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这是历年来级别最高的一份反偷渡文件。同年6月20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反偷渡会议上强调说，“只要有港澳这种特殊地区存在，而我国‘四

化’又未实现,就会有外逃问题。”(广东省委办公厅《仲勋同志在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79年8月2日,深圳市档案馆编《建国30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2509页。)

突击行动之后,形势有所缓解。同年8月,广东省委颁布处理偷渡问题的新规定,“1976年年底以前外逃的,可发给侨汇物资供应证;1977年1月1日以后外逃的,一律不发。”(广东省委办公厅《关于处理偷渡外逃问题的若干规定》,1979年8月28日,深圳市档案馆编《建国30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2522页。)继1966年、1973年之后,广东省委第三次对政策划线,继续后退。大规模的偷渡潮很快复燃,堵截人数和实际逃出人数都很惊人。1978年至1980年,偷渡出境的超过20万人。即便是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的1980年8月,深港边境偷渡潮仍处于上升趋势。1980年8至9月,“估计每月有2.3万名非法入境者来港,其中约有半数避过缉捕而与亲友会合。”(《香港一九八一年》,中文本,第128页。)

这一时期,香港经济再次面临转型,大量人口骤然涌入,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压力。1980年10月,麦理浩与广东省领导人达成协议并提出三条新措施:凡非法从内地进入香港的人,不论何时何地拘捕,一律遣返;对非法移民一律不发身份证;在法律上禁止雇佣没有身份证的人。(广东省委《关于与香港总督会谈情况和进一步加强外逃工作的通报》,1980年10月27日,深圳市档案馆编《建国30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2558~2559页。)这是一个带有终结意义的规定。

改头换面的结局

深港边境的偷渡潮没有戛然而止。偷渡者的目的,从求得领取港澳身份证定居,转而只希望做几个月工赚些钱。据不完全统计,1983年港澳遣返12581人。1984年港澳遣返17362人。1985年港澳遣返25079人。1986年港澳遣返34949人。(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反偷渡外流工作的通知》,1987年6月30日,惠州市档案馆,2-38-73。)1987年后,随着深圳加工出口工业迅猛扩张,劳动力需求旺盛,各地人口开始越来越

多地流到这里。边境大规模的偷渡潮结束,原来想外逃香港的人被深圳吸纳。1979年深圳建市之初人口约30万人。1990年,深圳总人口达到200万人。2010年5月,深圳市总人口已膨胀并稳定在1500万人口左右。

内地偷渡进入香港并取得身份证的到底有多少人?要得出一个精确数字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根据内地和香港两方面的记载,作一个粗略估算。上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保守估计移民到香港的总数约110万人,“这肯定是一项过低的估计,因为这30年来,人口增长总数实际上已包括移民本身的人口自然增长,只不过有关数字难以独立计算而已。”(《香港一九八二年》,年报,第16~17页。)这中间又以来自广东省的偷渡者居相当比重。综合各方面数据,笔者估算实际偷渡到香港的约有60万人,其中宝安县(深圳市)约11万人(参考《宝安县历年偷渡外流情况表》以及“内地偷渡外流香港情况表”)。

宝安县历年偷渡外流情况表^注

年份	行动数(人)	逃出(人)	年份	行动数(人)	逃出(人)
1952	132	66	1967	659	382
1953	101	77	1968	895	551
1954	126	73	1969	641	480
1955	152	67	1970	787	610
1956	296	286	1971	1297	816
1957	6037	4915	1972	3657	2130
1958	888	604	1973	4311	2702
1959	2268	1368	1974	5083	2728
1960	3429	1634	1975	1767	905
1961	5810	3326	1976	1933	1114
1962	34256	31567	1977	2525	1273
1963	1303	713	1978	15298	7513
1964	928	545	1979	84965	31969
1965	1244	813	累计	181094	99414
1966	306	187			

注:《深圳史志》2008年第20期刊载《宝安反外逃情况回忆》一文,列举了1952至1979年历年外逃情况,各年数据与本表数据近乎一致。本表参详了其它有关文献的数据,综合而成。另,1980年,深圳市实际偷渡出去的应不少于1万人,总计约11万人。

接下页

池东明炮打张春桥

卞权 / 文

1967年1月28日，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市、全国，惊动毛泽东的“1·28”首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斗转星移，至今已43年过去。当年参与这一事件的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的学生们，现在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

历史潮流将他涌上涛头

池东明因参与组织“1·28”炮打事件，并策动

2月2日凌晨震动上海的声势浩大的炮轰张春桥示威游行，被迫害致死已40载了。他的遗书我保存至今（绝笔于1970年6月26日），依然不忍卒读……

池东明，上海师院（今师大）中文系63级1班学生，是我同班、同桌同学，院学生会秘书长。“文革”中，系师院“红革会”第一召集人，“风华正茂”战斗队战鹰飞将军兵团负责人，人称“战鹰”。

1941年，他出生在福建历史文化古城泉州，从小

上接 55 页

内地偷渡外流香港情况表

时 间	逃出数(万人)	备 注
1956	6	广东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办：《关于历年来港英限制我人民入境的情况》（1973年11月10日），广东省档案馆 229-1-592。1956年9月，港英当局称过去半年内地赴港者约6万人滞留不走。
1957至1958	0.8	《黄彬同志在专区政治边防宝安现场会议上总结》，惠州市档案馆 2-A12.16-34，（1970年6月）。1957年偷渡6382人，1958年偷渡1417人。又据《高毅如同志在地委边防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5月6日），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
1959至1961	1.6	《中国共产党惠阳地区历史大事记》（1919-1988）第339页，1961年东莞县偷渡外逃1.1万人。宝安县委：《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1961年8月27日），根据推算，1959至1961年，宝安县偷渡0.53万人。
1962	14	（香港）《七十年代》，1979年6月号，吴默然：《啊，香港这条船——大陆来港人潮问题探索》，1962年移居香港人数为14万人，几乎都是来自内地的“非法入境者”。
1963至1966	约2	据广东省革委会办事组外事办：《关于港英当局对我外逃分子政策的调查》（1973年9月18日），广东省档案馆 229-1-593，1963年到1971年期间，除1966、1969、1970年外，广东省每年行动外逃都在1.1至1.5万人之间。又据（香港）《七十年代》，1979年6月号，吴默然：《啊，香港这条船——大陆来港人潮问题探索》一文，1965至1971年期间，除1967年偷渡到港人数1.1万，1968年为1.4万人外，其余年份相对萎缩。
1967至1968	2.5	
1969	约0.5	
1970至1974	7.9	转引李若建：《中国大陆迁入香港的人口研究》一文资料。1970至1974年数据来自《华侨日报》，1986年11月2日。1975至1980年数据来自《香港皇家警察年报》、《香港年报》（有关年份）。1975至1976年因数据较小，略。
1977	0.7	
1978	2.8	
1979	10.8	
1980	11	
累计	60.6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家境贫寒,要过饭、做过小工。父母年轻时,逃奔上海糊口,一家人挤在南市狭小的棚户里。其父为人挑担做脚夫,其母为人家洗衣裳、做针线活儿当佣人。父亲劳累患上重病后,穷困无奈只得把东明的妹妹送人。池东明初中没念满,就进厂当了工人,业余喜览群书。1960年报名参军,入伍东海舰队安业民炮班。安业民牺牲后,他接替烈士当了炮班班长,成为福建前线海岸炮的炮手。(真没料到几年后他又成为一名炮打张春桥的神炮手!)1963年,考入上海师院中文系。他的散文写得清丽不俗,我曾拜读他发表在《解放军报》、《海军报》上的华章。由于都痴迷文学写作,我们很是投缘。东明原本是要调到《海军报》工作的,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部队推荐考大学。他平时节衣缩食但买起书来从不吝惜,一次听我说徐家汇书店只剩下最后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了,他放弃午休,顶着酷暑烈日,从漕河泾骑车买了回来,满脸欢笑如获至宝。

1966年6月30日,我们从松江社教前线奉调回校投入运动。“文革”初期,上海高校系统正在巡回公演《大学风云》,这是一部反映1957年在学生中抓右派的大型话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原是1957年的“反右”英雄。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发出警告:“凡是运动中,大字报写得越多的学生,后来个个划为右派!”他凭老经验误认为“文革”是“反右”的重复,将火“往下烧”。布置党支部成员和政治辅导员日夜盯梢学生行踪,记黑日志,排“左、中、右”黑名单,准备运动后期抓右派、封“左”派。

不料,在我们63级1班发生了一起震怒人心的事件:一位家在奉贤农村的同学,周末回家返校,发现床下的箱子被人撬开过。经过全班排查摸访,竟是班团支部一个委员,趁周末宿舍无人,用螺丝刀旋开箱子,偷抄这个农村同学的日记,向系总支打小报告。这无异于特务行径,激怒了大多数同学!东明和我及程卫军,联络发动全班共青团员,在东部草地上讨论了三晚上,决定罢免原支部成员。当时系里非常紧张,每晚派政治辅导员和运动联络员旁听,由于《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提出学生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以系党总支束手无策。结果我们把罢免旧支委,成立新支委的大红布告,贴在了西部大食堂

的大门口,一时轰动全院。当党委抛出马茂元教授等一批学术权威,掀起一股“斗鬼风”时,池东明对照中央文件,对兵团战士们说:“这是党委转移运动目标。再说,要我们学生斗老师,我不干!”池东明思维敏捷,语言幽默干练,是位辩才。一次大辩论中,他登台为观点相反的某同学“辩护”说:“首先,我认为某某的发言,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真理,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人们傻眼了。他故意停了一下,然后一字一顿地说:“因为——那百分之五十,他全部引用了马克思的话!”顿时,“哗”地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1966年10月,随着串联各地的红卫兵陆续返校,经过运动的几番分合,师院红卫兵联合大队,集体加入市红革会,池东明当选师院红革会勤务组第一召集人。

张春桥不倒我的事不了

“文革”中的上海师院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上海党羽密切注视的院校之一,盖缘以下原因:

其一、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三人,自“一月夺权”后红极一时,被上海人称为张老大、姚老二、徐老三,其中两人的父亲在师院供职,姚之父姚蓬子为中文系教师,徐之父徐宗骏为化学系教师,两人都是1934年前后,于国民党《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公开登报脱党自首的变节者或叛徒。尤其是姚蓬子,直到蒋政府退守武汉后,仍是每月享受100元大洋津贴的中统特务。池东明等红卫兵负责人,毫不畏惧他儿子姚文元是当时中央文革大员,成立“姚蓬子专案组”,追查他的叛徒、特务历史问题。惹得钓鱼台的江青大怒,责令公安部长谢富治追查问罪此事。

其二、市红革会总部两名常委出在师院。在全院约3900名学生中,红革会战士计约3000人,在全市大专院校中人数居于前列,故师院被称为红革会的四大“解放区”之一。

其三、红革会市总部在炮打前,就于1月25日派池东明赴京调查张春桥的历史嫌疑问题。他率助手郁×,先从北京高校获得信息急赴西安,在西安交大的“牛棚”里讯问了停职的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霍亲口对他说:“我用脑袋担保,张春桥是叛徒!”这在当时确为重大政治嫌疑的重

磅炮弹。(附按 这和“4·12”第二次炮打时《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艾玲,发回上海的结论一致,区别仅在“脑袋”与“党籍”的担保。)

其四、1月29日,中央文革保张的特急电报发到上海,1月31日早晨,红革会总部从上海第一医学院转移到师院。红革会设在人民广场、南京路、外滩的有线广播台中,播音员依然在高音喇叭中持续炮轰张春桥:“张春桥欺骗毛主席,绝没有好下场!”

红革会的文艺宣传小分队,也在外滩等处进行街头演出,高诵“张春桥欺骗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绝没有好下场!”

2月1日午后,刚从北京回沪的池东明,听说张春桥派兵镇压复旦学生,又听说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偏袒张春桥,非常气愤。他对市总部主要负责人说:“老马,我豁出去了!炮打张春桥,不怕坐监牢,打倒张春桥,宁愿去坐牢,砸烂张春桥,坐牢就坐牢!”当晚,继复旦誓师大会之后,池东明率领勤务组负责人,在师院东部礼堂召开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他第一个登台怒斥张春桥:“张春桥逆历史潮流而动,出兵镇压复旦大学学生,创‘文革’以来全国第一例,他狗胆包天——这是北洋军阀的行为!他要抓一小撮,我看是一大群。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不管是真是假,我认为都是张春桥谎报下情,对毛主席的欺骗!我明天第一个把大字报贴到南京路去!我建议张春桥把人民广场改成集中营,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准备把牢底坐穿!”顿时,台下红革会战士声泪俱下,齐声呼喊“炮打张春桥,不怕坐监牢!”2月2日凌晨,师院红革会1000多名红卫兵,在池东明、金某(今《咬文嚼字》专家编委)等勤务组成员及总部联络员的率领下,由学校向市区进发,一路上,“舍得一身剐,敢把张春桥拉下马”、“炮轰张春桥,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声,如山呼海啸。继而,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机械学院、上海中医学院等红革会战士,也纷纷涌向街头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市高校“炮打”的最高潮。

东明素爱沉静思考,一旦思考成熟,他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质疑说:“张春桥是市委主管文艺宣传的书记,上海也出了《海瑞上疏》,他脱得了干系吗?为何只批北京的海瑞,不批上海的海瑞呢?张春桥肯定心中有鬼!”“张春

桥利用上海200万产业工人的力量,窃夺上海大权,是拉大旗瞒天过海的阴谋。这和当年蒋介石利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窃取上海大权,在权术手腕上几乎是异曲同工!”他认定张春桥是混入党内的巨奸大佞,因此不灰心,不气馁,做好了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毕业分配前,在徐老三操控的“反逆流”大批判中,他又遭到反复批斗,后在同学杨某的帮助下逃离师院,躲在长兴岛,直到父亲病故,才悄悄回家探望老母。当时他身无分文,从同学杨某处借得20元钱,交其母办理丧葬事宜。为防止被抓,他只得匆匆告别老母,连夜返回。1968年毕业分配后,他曾私下感慨地说:“现在我是待罪之身,最欣慰的是学生很喜欢听我的课,不误人子弟,心愿足矣。”1969年8月18日,师院红革会45名同学,在人民广场合影留念,岂料这一活动,被张春桥安插在师院的坐探获悉密报,徐老三立即下令密切注视师院红革会的动向……池东明预感形势严峻,心里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一次,我约他去老西门长辈家吃晚饭。饭后在弄堂口分手时,他很清醒地贴耳对我说:“张春桥不倒,我的事不了……”岂料,这次会面竟成了永诀。

秋后算账

张春桥是一只阴阳两面的笑面虎。他曾多次公开宣称:“小将犯错误,改了就好嘛!”直到1970年1月11日下午,张春桥还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言之凿凿:“红革会的事,今后不提了,我决不以拥护我还是反对我来划分革命还是反革命的界线!”

其实,1968年春末,毛主席已当着张春桥的面指示说“炮打‘无事’”,毛主席说:“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引自徐景贤《十年一梦》:《毛泽东说“无事”》第128页。)张春桥,封锁毛主席关于炮打“无事”的谈话。欺上瞒下、另搞一套。

张春桥及其上海党羽,把“1·28”炮打张春桥事件和19天后发生的陈毅、叶剑英等老师“2·16”大闹怀仁堂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挂起钩来。1967年2月4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全市批斗大会上,把市红革会总部常委反绑双臂押上台,马

立新、劳元一、李功佐三人,作为炮打祸首,被押站在前排接受批斗,然后,又分期押往全市高校游斗,并关进隔离室。与此同时,他们派人四处搜寻,守在池东明家门口,终于嗅出踪迹。2月10日,池东明被五花大绑,押上师院东部礼堂的批斗会场。他的头被强按下去,又昂然挺起,一次又一次,最后被几个莽汉硬生生地摁跪在台口。批斗过程中,突然,一人跳上台来,一把揪起池东明的头发,恶狠狠啐了一句:“池东明,你也有今天!”接着,一脚踢向池的胸部,池东明当场昏倒在地。全场大哗,台下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2月24日,中文系631班“左联公社”红卫兵团贴出《历史地看待池东明》的大字报,为池东明辩护。

1968年秋末,张春桥及其党羽,派出1000余名工宣队员进驻师院,市委副书记王秀珍9月4日亲临师院,指挥工宣队强行进占留办三楼(师院红革会机要核心所在地)进行搜查,当晚分组突进学生宿舍,责令学生开箱倒柜,挨个抄查“炮打黑材料”,同时,在校门口设岗“抄靶子”,对学生带出门的箱包进行检查。声称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挖出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第二天,王秀珍又率队亲赴复旦大学,进行全校“九五”大搜查。

进入1970年代的上海滩,已成为张春桥“一言堂”的专政领地。一次,他在市委扩大会上,咬牙切齿地对工军宣队的头头们说:“上海是个海,无风三尺浪!上海高校是藏龙卧虎之地,哪一次炮打妖风不是从高校刮起来的?不要怕难,针插不进,就用锥子,锥子不行,就用刀子,我今天不是用刀了吗?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这次还得动刀子!”(引自《马洪林文集》第742~745页,文化教育出版社)

1970年春节刚过,张春桥的党羽在全市“一打三反”动员大会上叫嚣:“‘一打三反’运动,就是要查炮打,炮打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但里面一定有反革命!”师院召开“工、军、革”联席会议,决定首先向“风华正茂”战斗队开刀。乍暖还寒的四月天,先把池东明从凌云中学押回师院隔离,将他打成煽动炮打游行的反革命黑头头,轮番逼、供、信,不让他睡觉。继又分头抓了历史系青年教师王某、中文系学生陶某、谢某、左某、冯

某、毛某等三十多人,将他们打成“王、冯、池”反革命小集团,把院团委书记杜守华,以及张德永两位教师打成黑参谋。是年夏,又据张春桥、王洪文授意,市革委会直接指挥,将李某、贺某分别从广西、北京抓回师院隔离。在残酷的逼、供、信的攻势下,层层剥笋,各个击破。有的人竟然胡诌什么“池东明的名字,‘东明’就是‘东方明’,有‘东方红’的寓意,包藏野心,想当司令。到四川设据点,上四明山打游击,找张春桥报仇,十年不晚……”等等。长期的煎熬,使池东明身心俱毁,最终被逼自杀。

他在遗书中写道:“(工宣团)政委、(军宣团)团长:首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确实写不出一份完整的小集团阴谋计划的交代了。我母亲是劳动妇女,我自杀的医药费,我的火葬费是不能报销的。但我母亲肯定拿不出,请求你们照顾她是个孤老婆子,旧社会(她)吃过很多苦,这笔费用望照顾她一下,我是罪犯,我的母亲是好的,否则,她活不下去的……袁××(女友)是没有什么罪行的,她年轻无知,被我害了……相信党会正确对待(她)的。我与她没有办过结婚手续,因此,她不能称作我的妻子,她是被我损害的。毛主席万岁!池东明绝笔 1970年6月26日”。对于所谓“小集团阴谋计划”,他宁可一死,也三缄其口决不写违心的假交代。

据有关部门不完整的统计:上海市因炮打张春桥事件受到打击迫害的竟多达2500余人,其中被隔离审查的有200多人,进学习班审查的440多人,被逼致死5人、被逼发疯的6人。然而,实际遭殃受害的人数,远不止以上数据。仅复旦、师院两所院校,因炮打罪名就有9位师生被逼致死:如复旦历史系程显道(留校年轻教师,原校红革会勤务组成员),哲学系学生施伯鑫(党员调干生,原校红革会主要负责人),新闻系学生谭建滔(原系红革会负责人)等四位学生,先后在清查运动中,被逼含冤惨死。师院被逼致死的5位师生是:王建民(院保卫部女部长),池东明(中文系63级学生),唐淑萍(院党办主任),杨代蓉(外语系党总支书记),余力(数学系63级学生)。林明崖(中文系68届学生),中文系的才女,原定毕业分配《解放日报》社文艺编辑部,因在《红卫战报》上写过几篇影射批判张春桥的杂文,被从军

1980 年代思想启蒙感言

符利民 / 文

一直以为自己是比较“博学”的。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读过马恩列斯的著作。当年大一开“马列主义基础”，一周六课时，比任何一门专业课都多。教材是《联共（布）党史》，从中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有计划，按比例”，“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知道“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知道集体农庄是农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最凶恶的敌人”是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分子”……专业开课《语言学概论》，教材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从而又知道斯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兼语言学家的“全才”。“文革”中有幸偶尔看到《参考消息》，又知道亚非拉到处在盛赞咱们的“文革”和“世界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垦农场抓回上海隔离审查，后被折磨得形销骨立精神失常，头发长达一尺多，一天突然奔出隔离室，被专案组人抓回，仍斥骂她“装疯弄傻”，经送宛平南路上海精神病院检查，医生诊断说“是真疯，瞳孔都放大了！赶快让她脱离致病环境……”。中文系贺某，仅是红革会总部一名工作人员，竟前后遭到三次关押，因遭逼供信、批斗、恐吓、人身攻击时达两年多，身心遭到严重伤害。复旦历史系年轻教师王某（明史专家，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且遭粉碎性抄家，他的贤妻过女士含恨自尽于复旦园。为催逼交代所谓炮打张春桥的“一麻袋黑材料”，张春桥特派手下干将徐海涛（原上海警备区师政委，粉碎“四人帮”后自杀）主管其事，师院以直言敢谏的马洪林（《康有为大传》作者，今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教师蒋某、孙某、陈某等人，均遭隔离批斗。原“姚蓬子专案组”组长沈某（中文系67届学生党员），被“反审查”三年半，折磨得一身病。经报市公安局批捕的有“风华正茂

还知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能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一类的《语录》数百条，会唱《社会主义好》、《公社是朵向阳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一类的歌曲上百首。

时光走到1980年代初，终于发现自己原本不过一只井底蛙，一只受过高等教育“博学”的井底蛙。发现得益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的败落，“务虚会”的成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功力，同时也得益于一系列丛书的面世。如由包遵信、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邓朴方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汤一介主编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王元

“战斗队两名红卫兵：谢某（中文系，今安徽省文联副主席），李某（历史系，今国家级旅游学专家）。据夏乃儒、马洪林等教师回忆统计，师院十年浩劫中，先后因各种受审、检查、抄家、隔离等因素非正常死亡的教职员就有22人。（引自《马洪林文集》：《张春桥追查“一麻袋黑材料”的阴谋与诡计》第748页，文化教育出版社。）粉碎“四人帮”之后，据中共上海师院运动办公室1977年11月4日，为落实中共中央“23号文件”，所开具的署印证明：“上海师院因参与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受到审查迫害的师生员工达645人，隔离审查33人（32名学生、1名老师），进三脱离学习班79人，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和政治错误结论，记入个人档案的533人”。有的毕业生，因档案袋中塞进了炮打罪名材料，分配外地后被撤销公职，或拉下讲台，打入“劳改队”，被罚扫厕所、扫马路。上海红卫兵因“炮打事件”“受迫害程度的惨烈，由此管窥一斑。

（作者为上海体院人文学院新闻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化主编的《新启蒙》丛刊等等。严济慈、杜润生、陈翰伯、侯外庐、钟沛璋、钱三强等几十人的顾问队伍，丁学良、王焱、王小强、王岐山、王晓鲁、尹蓝天、包遵信、乐秀成、刘青峰等几十上百的编委豪华阵营，几十上百个新鲜新奇的课题，几十上百个新颖新特的书名，几十上百的熟悉而陌生作者、译者的名字……读这些书宛如“东海之”与“井蛙”的对话，让井蛙如我者目瞪口呆，惊喜交加。

如同积压十年的考生于恢复高考时的汹涌而入，憋了十年的阅读能量顿时作井喷式的释放。在“读书无禁区”的鼓动下，懒散的时间骤显金贵，疲软的神神经勃然奋发。狼吞虎咽，囫圇吞枣，半懂不懂，将信将疑，不求甚解，不知所云……全方位的熏陶渗透，群体性的扑面而来。振聋发聩，醍醐灌顶。

丛书从世界观的高度精选各门学科的知识精华，从整个人类文明的曲折发展与更迭中，记录一代国人对民族命运与人类未来的思考与探索。真正是天下视野、江海襟怀！全民激情燃烧的岁月！出版人与读者的应和，奏响了新一次民族复兴、思想解放的前奏曲。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的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为人。”

我终于知道，这个世界除了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自由主义”外，还是一种思潮，一种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主张以法律限制权力、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一种用市场经济、透明政治体制保障每一个公民权利的思想流派，也叫“自由主义”。也终于明白，有“剥削阶级共同的道德原则”、“万恶之源”的个人主义，也还有作为一些国家的思想支柱、根本信条，即最大范围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的个人主义。民主是对个人的尊重；自由、平等、人权是个人的政治诉求；宪政是个人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是对个人经济追求的承认与规范；文学艺术是个人体验个性的表达。这种个人主义，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同“唯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并不搭界。

其间听一位学者讲座，讲到人类社会形态的划分，有按“生产关系”标准划分的，即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

主义社会（其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按“生产力”标准划分的，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而前一种划分是主观杜撰的历史决定论。对于从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我者，头上的天又开阔了许多。还知道“社会主义”也有多种，除了咱们的之外，也还有尼赫鲁、奈温、穆加贝、霍查、波尔布特以及父子承袭的社会主义……

甚至一本诠释西方抽象画的小册子也给人以启蒙：曾经被人定位为西方人“吃饱了没事干”、“没落文化”的“抽象画”，其实不过是一种绘画表达方式。一目了然可辨认的物象写实性绘画，与无可辨认的自然物象、非描述性的绘画语言，正是丹青家族中的一对姐妹。当年中国美术界高层人物对抽象画的否定，对吴冠中画风的打压，在吴老仙逝后的今日，终于真相大白。

井口透一线亮光，到强烈的阳光照射，会让蛙们一下睁不开眼，要流泪，要心悸，要目眩。然而阳光对于寻求光明者是不可或缺的。以封闭为幸、孤陋寡闻为荣、信息封锁为“通灵宝玉”的格局终究要打破。不能再甘当井蛙，坐井观天。阅读无禁区，思考无禁区，探索无禁区，借鉴无禁区。世界原本多元，不能一把尺子量天下，一个巴掌作井天……

其间我等一行以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心态，着紧系风纪扣的中山装，南下深圳，恰如井蛙之见蓝天大海。踏入那片神秘的土地，见到港商住一晚宾馆花去上千元港币，我等一月的工资不够人家请一顿宴席；听到公司员工为老板祝贺生日以为丢尽人格，听到叫爱人为“老婆”，以为是“男女不平等”的铁证；看到官家子率先下海“春江水暖鸭先知”，看到贿赂走私大行其道半似公开，于是惊呼、惊诧、惊叹并起，喝彩、赞同与疑窦同生。人头簇拥的中英边界沙头角小镇，从打火机到电子手表、不打皱的化纤布段、夏士莲护肤霜，到低高档的西装、夹克应有尽有，来这里的人们“出门像公子，抢购像兔子，回去像骡子，结账像傻子”式的疯狂采购，跟面对出版界纷来沓至的丛书小册子，是一样地让人眼花缭乱。当牛仔裤、迪斯科，邓丽君的歌、《乡恋》“靡靡之音”四处传播，井蛙的窘迫、尴尬与渴望，也日见强烈。

此时，《随笔》、《读书》南北问世，《新观察》复

刊。我也陆续知道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知道《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知道《赫鲁晓夫回忆录》、《朱可夫回忆录》、《莫洛托夫回忆录》。它们的彼此参照，组成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断片。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方庄拜访曾彦修（严秀）先生，“高知楼”简陋的小书桌边那数千张卡片令我惊讶，老人就是从这些回忆录中剥茧抽丝，从历史缝隙中有许多惊人的发现。他说：为什么斯大林老讲“希特勒背信弃义”而罗斯福、丘吉尔从来不讲呢，其中的奥秘昭然若揭。蓝英年从苏联作协主席法捷耶夫的自杀，剖析当年的作家实况；从高尔基十月革命后享有20多个随从的厚遇，探到他后半生写不出大作品的缘由。后来张心阳“无一字无来历”的《带毒的亲吻》出版，点评勃烈日涅夫、苏斯洛夫、契尔沃年科，都是从这些资料中梳理出的发现。我跟心阳说：称你们是苏联问题的“三剑客”，不为过吧！联想到前年我去河南漯河南街村，看到高耸的华表前数丈高的斯大林彩色画像，民兵24小时“庄严守卫”，斯氏享受“本国”无缘享受的殊荣，真让人尴尬苦笑！

此间还读过由新华社记者郭超人所写的《双流镇调查》遵照伟大领袖“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的指示，每次政治运动剔除5%“一小撮”，然后剩下的95%又变成下次运动的100%，再剔除5%“一小撮”，如此循环下去，一个叫新店子的小街道，最后“专政对象”达87人，占成年人的74%，完全“干净”的不到26%。建设一队的“贫下中农”，没有一个有资格参军。不彻底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地结束20年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局面，就不可能义无反顾地把注意力吸引到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上来。据说该文曾引起高层的强烈反响，不久“阶级斗争为纲”宣布废止，接着是履历表上原先必不可少、打娘肚子里即定终身的“家庭出身”栏目取消，可算一个不小的“石破天惊”的壮举。

渐渐地“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不再那么洪水猛兽臭不可闻，以代表大家抒情为己任的作家不再那么红得发紫；马克思对前期的太平天国“强大革命”的褒扬，和对后期“魔鬼的化身”的痛斥，耳有所闻。也开始知道，有坚持政党办报、政府掌控媒体的国度，也有宪法明文规定政党不

许办报、政府不准掌控媒体的国度；有官员必须公开自己的财产接受全民监督的国度，也有将官员财产视为机密的国度；有成天讲资源匮乏、危机四伏以激励国人奋发图存的国度，也有成天喜报频传、生怕因报忧而致国人悲观沮丧的国度。

该归位的都该归位，该还原的要着手还原。“蒸发”了多少年的航天动力专家吴仲华终于墙内墙外重新吐香，“出土文物”沈从文终于重放异彩；20多年前给“老右”们带来灭顶之灾的“毒汁四溅”的作品，终还原为“迟放的鲜花”，最早写诗讴歌毛泽东、后来被画成嘴里衔着滴血屠刀的美女蛇的胡风，也还原其作家的本色；刘文彩院子里设水牢的子虚乌有终于真相披露；暴风雪中草原小姐妹龙梅玉荣的救命恩人——一个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达茂旗草原劳改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哈斯朝鲁，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于是国人或作“万岁”考，或追问“日记何罪”；或剖析“八旗子弟”现象，或比较《国际歌》与《东方红》的异同；或评论“处级和尚”、议论“武大郎开店”，或口诛卖国贼，笔伐“爱国贼”；或审视显规则，或破译“潜规则”；或重温“历史的先声”，或解读“历史周期率”；或从当年55万派“右”最后没“派”上几个的史实，诘问“扩大化”的自圆其说；或从上世纪60年代初饿死3000多万还是5000多万，追问大饥荒的制度原因。

或“交锋”，或说“不”，或对“说不”说“不”；或“不高兴”，或对“不高兴”不高兴；或说“被”，或议论为什么会“被”；或反思“犯错误”，或追思“犯正确”；或议论革命、改良、改善的利弊，或探究缩小代价减少折腾的药方……

其间，我又得到一本由汤一介作序、由众多高校教授编写的《中西五百年比较》，将起点定位为16世纪中叶中国同欧洲生产力水平大体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年代。打从500余年前明朝禁海始，整个中国就不停地“造井”，芸芸众生被铁桶的井壁困住不见阳光。皇帝老儿，诸多大臣，也一律坐井观天。渐渐地大家都麻木迟钝，随遇而安，成为盲蛙、愚蛙。尽管也有着可以跳出的机会，例如16世纪末、17世纪利玛窦等传教士东来，一批科学技术、天文历算随之传入中国，然而都失之交臂。1717年，号称开明的康熙在所谓“礼仪

“史民文化”与“史官文化”

黄一龙 / 文

“史官文化”这个东西，伴随着君主专制的中国历史，其存续凡几千年，学界对此已有共识。那原因细理起来比较复杂，简而言之就是枪杆子管住笔杆子使用笔杆子，笔杆子服从枪杆子护卫枪杆子。语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也出文化，把天下文化人置于最高权力监管之下，为君主记言记行立言驯民兼写诗作赋插科打诨逗乐子，是为“史官”。

古代西方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过和政权并立还有一个神权，笔杆子们多属“上帝的仆人”，和枪杆子及其政权没有那么紧密或甜蜜的关系。而在我们这里，上帝的儿子就是君王，君王背后的枪杆子是用来替天行道——就是替他老子行道的，所以笔杆子们除了君王以外，别无靠山，靠了君王，就当“史官”。只是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存在种种漏洞，总是“野有遗贤”，皇帝搜罗不尽，这就在史官之外出现了“史民”，为我们留下了值得对西方老外夸口的“优秀文化遗产”。说来有趣，“史民文化”的最有名的著作，竟是一位朝

廷正式任命的史官之作，那就是誉满全球的司马迁著《史记》了。司马迁因“犯错误”被捉进官里被施以腐刑被彻底边缘化妖魔化“分子”化，他发愤修史，“成一家之言”，其作品当然也就告别了核心意识形态，一视同仁地著录了林林总总的圣君贤相、游侠流民、成功流氓、失败英雄、市井无赖、朝廷命臣，“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不为尊者讳，不舔权贵痛，为世界留下一部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以后的官史，虽都遵从《史记》体例，但多是有组织有领导之作，难望它的项背了。关于“史民文化”的存在，“史官文化”论者大都未予深论，留下了研究和论说的空间。

史民们的“民史”，其实正是“官史”的副产品。还就史学而论，官史的根本特点，是创造历史的和记录历史的都是一伙“自家人”，自家人做了好事，就往天上吹，做了坏事就闭嘴不说还消灭罪证。而对于百姓来说，专制社会的英雄们做的坏事总是大大地超过好事，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于是“冤狱遍于域中”成为历史常态。

之争”中下令禁教，一个翻译 7000 部西方书籍的计划也随之搁浅，再次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以至今日，同时有八九十个城市宣布，要建成“国际性的大都市”，洋洋于“擅一壑之水，而跼埴井之乐”。归有光在《项脊轩志》中说：“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解放思想首先在解放眼睛，解放耳朵，解放嘴巴。让比较、借鉴、参照、拿来，成为必备常规。我们需要的是“德”“赛”先生兼有的发展观。“德”“赛”两位先生，一个也不能少。不能只承认人家自然科学技术发达，社会管理经验先进，而否定人家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方面的优长而拒之门外；不能经济上改革开放，思想文化政治上锁国闭关。有人担心门窗打开苍蝇进来，可以理解，但不能以此成为重新

关闭门窗的理由。何况窗外的空气质量、卫生状况，未必就比屋里差；何况人家先进的环保设施与机制，可以引进为我所用。同国际接轨，既适用于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于思想文化政治领域。只承认经济范畴的普适价值，而否定乃至惧怕意识形态上的普适价值，是既得利益者的偏见与缺乏自信心的思维聚合物。与其沉溺于关门自己给自己作揖，真还不如以博大的襟怀吸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精华以壮实自己。那将避免与减少多少社会与历史后遗症，迎来真正的长治久安；也将尽快寻到解开“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的钥匙，迎来全民真正的精神振奋与全方位的民族复兴。

（作者为宜昌市人大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面对这样的历史，弱者自然也喊冤也反抗，到喊冤无门反抗无路的境地，唯一能做的无非是把被掩盖的真相记下来，多数不会有太史公的运气和成就，也不曾妄想“秋后算账”，无非是怀着人类未泯的良心，希望后代有所改进，少蹈覆辙（当权的）和少受欺凌（老百姓）罢了。到了上个世纪，史官文化发展到极致。一切文化领域，都有相应的官府；一切文化人士，莫非某品官吏。史官学官诗官新闻官相声官唱歌官跳舞官，既受枪杆子的保护，也受它的指挥，否则“不开饭”，或者送去劳教劳改直至杀头。尽管那时的冤案冤狱远远甚于前代，“史民文化”的冲动有增无减，而“史民”的空间却急剧缩小终至于无，那就是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革得整个中国（不仅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了。

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给文化打开的一线门缝，就是政府不再统治和发放人民的饭碗，因而给“史民文化”的复兴留下了生机。加以恰逢信息时代，传播手段发生了大革命，原来已不容易的“防民之口”现在防成功了也不起作用，须要防民之脑且防民之手指头了。民间文化也就与时俱进，勃兴了起来。历史由“史官”们垄断随他们打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史官文化”还是“主流”，有组织、有经费，垄断了史料档案，但是“史民”的复出，对于习惯于任意裁剪真相的官史来说，就是千万双怀疑的眼睛和千百座另起的炉灶，他们形成新一轮的“史民文化”。先是从“史官”队伍（或称“体制内”）分蘖出既得官方默许，又得民间拥戴的非官史，《庐山会议实录》就是其卓越代表，它公布了“反右倾”及其后果的真相，令全国百姓大开眼界。甚有意思的是，这部“民史”的作者李锐，也是“史官”一类的“体制内”人物，也坐班房被边缘化妖魔化“分子”化，他的这部著作也是真实再现了政治家们的折冲樽俎应对进退，记录了胜利的领袖和失败的英雄，成为理解当代中国的一本百科全书。此后一大批回忆亲历历史大事真相的作品不断问世，各种“史民”大量涌现，大事小事不论，笔录口述互补，纸媒网媒并举，海内外兼行，著述蜂起，成果斐然，其鲜明特点与史官的官史形成鲜明的对照：

——不供奉先验的“指导思想”，秉笔直书，

追求真相。“秉笔直书”的这条原则，历来的官史也多标榜，可是从来无法真正落实。笔者曾经参加上世纪80~90年代《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它就宣布自己要“秉笔直书”的，但是其中甚多卷帙临到出版时，一个命令下来，某个人物的名字和事迹也就封笔不书了。这类事情想来任何当过“史官”的朋友都有经验的。

——不做也没有本事做起居注，因为“史民”们究竟难得具有李锐的经历和地位，他们只能直面民间，直面自己，书写真正的“人民史”。胡适当年提倡“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把中国文学从士大夫的垄断下解放到了民间，现在是“我手写我见”、“我手写我闻”、“我手写我的遭遇”，从而把修史大业从史官的手上解放出来，成为众多“史民”们的事业。

——不搞“宜粗不宜细”，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历史。历史本来就由具体事件构成，对它越“粗”就越抽象，越抽象就越好把生动的史实变成生硬的教条，遗忘历史真相。而史民们的旗帜，恰恰是“拒绝遗忘”！

——未必“追究个人责任”，但是坚持弄清责任，个人的归个人，集体的归集体，体制的归体制，历史的归历史。坚持不把历史搞成一摊糨糊。

——无须服从任何“标准答案”，无须取得权力部门的首肯。这自然得益于广泛无须向“体制”讨饭吃的空间。

——最后但非最次要的，是这些“民史”的主要内容，常是历史上的错误和挫折，冤屈和苦难，它们也歌颂，那对象多是弱者在苦难面前的高贵精神和尊严人格，而与官史的“歌颂为主”相区别。

以上所举诸端，当有种种遗漏，但是凡是“史民文化”，一定具有这些特点，倒应是不刊之论。从此可以看出，这样的“史民文化”，虽然出自自发又挥之不去，但是并不可怕并不可恨，它们的兴起和存在，至少可以在祖国的文化百花园里增加一点色彩，使它更加鲜艳。现行的文化政策是“坚持多样化，弘扬主旋律”，“史民”自居“多样化”，总可以和“主旋律”史官文化互相映照，互相校讎，和谐共处，互为补充，不必你死我活吧。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潘复生(1908-1980)

潘复生晚年一席谈

赵宗礼 / 文

32年前，潘复生在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招待所接受“监护审查”期间，现《南阳日报》社印刷厂厂长陈连兴（现年60岁），

有幸拜访了他，并与其畅谈。陈连兴通过仔细认真回忆告诉我，这位曾当了多年河南和黑龙江两个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政委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的潘复生，晚年的日子竟十分悲凉，当时充满着无限感慨、无奈、忧怨和悲伤。因为潘复生在河南60岁以上的老人们的心目中公认为“河南最好的省委书记”，一直受到河南人民的怀念和尊敬，所以才促成了此“访谈篇”的产生。

1978年隆冬，时为济南军区陆军78师某部正连职干部的陈连兴，奉命来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亚麻纺织厂，协调师营房科一位姓牛的军转干部的安置问题，住进了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招待所。闲聊中获悉“文革”中因支持“造反派”犯了“左”的错误的潘复生，就住在本楼二或三楼的一个小套间里，接受着组织上的“监护审查”，由6位着便装人员轮流看管着。陈连兴8岁时正赶上河南省委掀起的“大批右倾机会主义潘复生、扬珏（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的群众运动”，潘复生在当时的河南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只是“大批”却把“潘复生批香”了，孩提时代的陈连兴就从父辈那里知道，潘复生才真正是建国后最好的一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在合作化运动高潮时的“反冒进”，搞“大社化小社”、“主张退社自由”、“牲畜分槽喂养”、“增加自留地”等“求是”举措，把当时正刮起的“左倾冒进”、“左倾蛮干”所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批

潘”以后河南出现了大饥荒，其间陈连兴亲眼目睹了“左”祸给家乡人民造成的饿殍遍野惨状，陈连兴自己也差点儿饿死。孩提和青少年时期的陈连兴听到父老乡亲们经常念叨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是潘复生还是咱们省委第一书记的话，不至于饿到那种“人吃人”的程度。河南老一代人对潘复生的怀念和尊重是一致的，是发自内心的。陈连兴希望目睹一下潘复生这位高干的风采，更想和他攀谈一阵子，以便有朝一日回家乡时向父老乡亲们炫耀此事。在几句美言征得看管的同意后，陈连兴便来到潘复生住处，见到了时年已70岁的潘复生。当陈连兴向他自报家门，作了一番简要介绍，特别是表达了自小对潘复生的敬重之情后，这位当时虽然政治上已经潦倒，但依然是6级干部的潘复生，竟与正连职小军官一见如故似地畅谈起来。

潘复生说，我坐国民党监狱时，对自己为什么坐监，为什么遭受酷刑心如明镜。可解放后在组织领导河南、黑龙江两省政治运动和经济建工作中，一会儿说我“右”了，一会儿又说我“左”了，始终弄不明白。1958年7月河南批我时说“散布阶段斗争熄灭论”呀，“生产悲观论”呀，“包庇右派，破坏反右斗争”呀！还有什么在合作化问题的“反冒进”、“大社化小社”、“牲口分槽”喂养什么的，依我看是我一心想把河南各项工作搞好必须要说的话，要办的事。譬如当时河南省委常委会中的多数人，为了从农民口粮中多挤出一部分粮食充当征购任务，竟提出了3斤鲜红薯即可折合成1斤原粮（当时粮食卖给国家，留给农民的口粮是红薯）。而我和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竭力反对，我俩坚持认为5斤鲜红薯才能折合成1斤原粮。可是这件事后来就成了吴芝圃等人说我们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只顾农民群众，不顾国家利益，犯了“右倾错误”的一大罪状。说实在的，我在河南工作期间，在粮食问题上可能就有

点“保守”。这是因为,当时的河南确实地瘠民贫,生产条件低下,连年受灾,征购任务却很繁重,以至于缺粮情况相当严重。我记得可能是1957年春上吧,为解决河南的粮荒问题,我年初就派人调查摸底,及早动手向粮食部写报告,国家才从湖北等省调来大量的粮食,及时预防和避免了大面积的饥荒。如果当时就全部按有的人“左”的那一套搞法,说不定1957年春就出大问题,更不用说1958年夏、秋两季的大丰收了。可是当时连中央也说我“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批斗一阵子后撤职不说,还下放到西华农场劳动改造达三年半之久。

潘复生说,1966年元月中央派我到黑龙江省委主持工作后,我整天想着一定要谨记在河南工作时的教训,千万不能再犯“右倾”错误了,一定要紧跟毛主席。谁知这次紧跟的结果,却犯了“左”的错误。我到黑龙江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曾有一大阵子“造反派”把我当“走资派”批斗,每次遭批斗都是戴高帽子、打花脸受尽折磨。挨斗之后,我都是把高帽子一摘,花脸一洗净,又挺起腰杆千方百计去抓工作去了,总是竭尽全力想把“文革”大乱后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我当时这种积极站在群众运动前列的举动,还受到毛主席表扬呢!至于后来黑龙江省发生的两次较大的武斗事件,还有后来乱揪斗老干部的事,我应负制止不力的领导责任,但说我幕后操纵或唆使授意的,这的确是冤枉无辜。我是入党40多年的老党员,又是省委、省军区一把手,以至沈阳军区政委,无论怎么说也不会如此下作。但组织上却以这两次事件为主要罪名把我软禁起来,对我做出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多年来我一直享受“五员”(秘书员、警卫员、卫生员、炊事员、保姆员)的6级高干,现在没有一员不说,还失去了人身自由。本人即是到商店买牙膏、牙刷生活必需品类的小事,也得先向看管人员提出,经批准后在有人陪同监护的情况下,才能允许前往,甚至连在院里随便散步之类的单独活动的自由都没有。不仅如此,还株连亲人一大片。清明节时,我要求回山东泰安给我老岳母扫墓,组织上给的钱只够到泰安的往返路费,想多领一点就不给,我们连花自己工资钱的自由都没有了。前不久,我老伴亡故,如今我可以说是孑然一身。

我儿子从北京地质大学本科毕业后,由于我的影响,工作安排得很不理想,在广东以至于找个合适的对象都很难,已经快40岁的人了,却未能成家。据陈连兴仔细回忆,潘复生讲到老伴、儿子受株连的遭遇时,眼睛里充满着极度的无奈、感慨、忧伤和悲凉。

据陈连兴当时的印象,潘复生的个头大约在1.72米左右,属于中等身材,微长方形面目,只是有点消瘦,当时体重顶多在100市斤上下。他身着一身灰色中山装,床上的被子好像是浅绿色的。头发花白,当以白发居多。两眼炯炯有神,看人很慈祥,谈吐举止颇有文人雅士的风度。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孤苦伶仃地住在招待所的一个小套间里,正可谓风烛残年,形影相吊。简陋的住室里除了牙膏、牙刷、毛巾、衣服外,就是一个14寸的天津产的“北京牌”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和一套大字版的《毛泽东选集》了。由于潘复生的眼睛不好,即使看这大字号的“毛选”也得使用放大镜,所以桌子旁边还特意放置了放大镜,供他学习和写字时使用。

潘复生对陈连兴说,软禁以来,这套《毛泽东选集》他也不知道反复阅读了多少遍,但是越看越对自己几十年来一会儿犯“右倾”,一会儿犯“左倾”错误的原因越弄不明白。是毛主席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又那样说的话把我给弄糊涂了。在河南主政时对毛主席有些指示稍加迟疑和因地制宜,便说我“右”了;在黑龙江主政时唯毛主席的话是听,千方百计“紧跟”,又说“左”了。真是“右”也不是,“左”也不是,无所适从。始终弄不明白。开饭的时候到了,陈连兴陪着潘复生一起来到了一楼餐厅,排队各打了一份水饺。当水饺打到各自的饭碗后,年纪不到30岁的陈吃着都嫌凉,而潘复生同志又端着到楼上自己的软禁室吃了。事后我问他,他说配点开水可以吃。他屋里的暖气似乎也没有陈连兴们住的标间热,是他自己不要那么热?还是别人故意使坏,不给他供那么热?陈连兴没有问,此事更增加了陈连兴对潘复生的怜悯之情。

根据陈连兴的回忆,当时的潘复生也是企盼中央对自己的问题早一点做出结论,尽快获得“解放”,以便能够安度晚年。他还特别提到他在河南的“难兄难弟”杨珏、王庭栋二人。他对陈连

兴说,我在河南“犯右倾错误”时,杨、王他俩和我一案。文化大革命中他俩也和我一样犯了“左”的错误,可杨、王二人早获得了解放,且已恢复原职。文化大革命犯了“左”的错误的省委书记们,也都获得了“解放”,现在被“监护审查”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人了。为了获得“解放”,前段我曾把自己申辩材料托人已转到了叶帅手里,帮忙者说,叶帅也随即转给了华国锋,华主席也转到了中组部,是中组部搁了浅。(潘复生认为,很可能是时任中组部长宋任穷不同意,黑龙江省的“造反派”“文革”时整宋任穷等人整得很厉害,宋任穷可能误认为是潘复生幕后唆使。这或许只是潘复生个人的乱加猜揣?或许事出有因?或许确有此事?对此这里只能存疑了)。潘复生最后说,我相信组织相信党,坚信总有一天我的问题会水落石出的。

潘复生说的没错,1982年4月,中共中央对潘复生的政治问题做出结论,同意黑龙江省委对潘复生的审查结论,历史问题已经查清,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犯的 error 不作组织处理。遗憾的是潘复生竟没等到这一天,1980年4月潘复生病故。

相关背景材料

——32年前河南人反对“批潘”言论种种

1958年7月到1959年元月间,以吴芝圃为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加批判,同时大抓“小潘杨王”。其间,仅以南阳地区为例,就有9249个说实话的公职人员,3万多平民遭到批判或斗争(1959年元月30日反右斗争总结报告表13)。然而,即使在这种高度的“言论专政”的高压之下,河南各地私下里仍是一片“拥护潘、杨、王”的正义声音。

南阳地委1958年9月7日给河南省委写的“我区以反潘、杨、王反动言论为中心的整风运动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称:“这次批判潘、杨、王斗争阻力确实很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论在各个方面都有市场,有的人甚至公开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反对我们对潘复生等人的斗争。如南阳县就有个富裕中农说,谁想叫我说潘复生不好,除非把我杀了。泌阳县也有人说这样的话。新

野县有个富裕中农串联5个乡200多个农民群众到乡政府,企图干扰,阻挠批判潘、杨、王大会的召开。据淅川县的调查统计,地富反坏分子19600多人中,因拥护潘、杨、王观点需要斗争733人;富裕中农33110人中,因拥护潘、杨、王论点需要辩论930人;145482个贫下中农社员中,因拥护潘复生论点忘本变质应辩论的641人;7959个队长以上干部中,因资本主义思想严重,拥护潘、杨、王论点,抵制党的政策的就有65人。据内乡县对1636名教师调查,有严重潘、杨、王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应当辩论的59人,应当再划为右派的26人。据南阳中心支行的调查,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应当斗争的6人,占机关干部总数的6%。

1958年9月1日邓县县委整风办公室写的“全民揭发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杨、王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总结报告”说:“据对邓县二初中26位教师的思想调查,其中有23人就赞同潘复生说法和作法。如教师李天道说:‘合作化清是逼出来的,潘复生说的没错!’据统计,全县暴露出赞同潘复生论点的有15.1万多人,共暴露出不同意见557651条”。

相当一些人对潘复生的一些论点,公然表示赞同。如在对待“阶级斗争熄灭论”上,有的人就是认为当前不能再抓阶级斗争。县医院老中医芦良才说:“凡是参加了革命工作的人,都是一心一意地干,在革命阵营内部哪还有阶级敌人?依我看,对每个同志不管成分好坏和历史问题大小,都应该一律看待。”县工业局干部郭天信还说:“合作化后地主、富农都入社成为社员。机关通过肃反,农村经过镇反,哪里还有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谁有现行活动抓谁整谁才对。”林扒小学教师贾荣说:“土地法上有明文规定,不满18岁的儿童不能当地主看待,既然如此,为啥现在各学校还在贯彻阶级政策呢?”该校另一位教师杜显说:“去年在教师队伍中划右派是多此一举,知识分子没啥可反,过去有句俗话说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都是小秀才,造不了反。”王沟教师张德说:“我认为大右派是客观存在,本质决定;小右派是心直口快,是吃嘴上亏了。”在粮食问题上,大部分干部和教师更拥护潘复生的观点,认为口粮留量就是偏低、偏少,确实不够吃。教师李

富堂说：“如果说粮食问题不是主要矛盾的话，为啥现在家家户户到处都在议论粮食问题呢？”桑庄教师腰保明说：“农民大干一冬，苦干一春，麦忙天吃的稀溜溜，饿的脸皮消瘦，咋干重活？”林扒教师李三刚说：“原来党宣传说，开荒三年不交粮，说是既利国又利民。现在为啥连自留地也收走了。”教师张修堂说：“‘双统’不自由，吃的稀溜溜，每人每天不顶一斤粮，食堂改成每天只两顿饭。光说粮食政策好，就是吃不饱，打死也不说好！打死也不说潘复生坏！”教师邵荣申说：“潘复生说‘双统’好像一根绳子拴在农民脖子上，这话真是不假，就是粮食指标太低，吃不饱，卡的死。”县医院干部杨荣保说：“粮食问题不能用回忆对比的方法来认识，一对比就明显发现，现在吃的粮食远不如过去。”县银行干部陈效文说：“今年夏季丰收了，可粮食留量还是那么少？拿着钱到市场上也买不到一点吃的。”

在对待潘复生等人提出的“大社分小社”问题上，有不少人也提出了支持潘复生的看法。县人委会吕吉乐说：“我看小农经济能促进经济发展，一家一户弟兄们多了，如果不分家都比着不干，而分家以后就立即各为其家大干了，庄稼比着种的好。农业社我想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潘复生的大社划小社就是能促进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县人委会干部王宗本说：“实现农业机械化没有合作化的基础我看也可以，人家美国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了机械化了吗？”县公安局干部王九如说：“我看小农经济就是好，要不到的话，今年夏季的小麦为啥增产了？”教师李振安说：“潘复生提出的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这才真符合共产党说的大仁寓于礼义的说法。”教师张惠芳说：“合作化后就是不自由，人力代替大黄牛，拉犁拉耙的是剪发头，潘复生说得不错。咱们谁敢说，说了、辩论你！”张村教师江心珠说：“有史以来都是男管吃，女管穿，现在男女不分都叫下地劳动，这咋能算合作化优越吗？”

在增加自留地和“开放自由市场”方面，也有人表示出了对潘复生的论点的赞同。县三中教导主任李耀华说：“多分自留地，就是能刺激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要不社员们为啥不休息，没明没夜地去到自留地里干活呢？”县医院干部王荣芝说：“扩大了自留地，多打了粮食，虽说是社员个

人的，但还不是我们国家的？再说了，社员们都有吃的了，也就少给国家找麻烦了。”教师赵琢义说：“潘复生叫多分自留地是关心农民的具体表现，如果说自留地不好，为啥苏联现在还有？为啥中央就没让取消呢？”不少人都认为“十项布告”、“开放自由市场”的作法符合社会主义规律，符合群众要求，是得民心之举。县医院干部王崇信说：“市场自由开放多好，到街上想吃啥买啥吃，现在啥也没有，拿着钱花不出去。”教师郭志荣说：“如果没有自由市场调剂，群众遇到天灾人祸时怎么办呢？”

个别人用讽刺挖苦来抵制批潘复生运动。林扒中学教师黄建训在自家的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潘复生太右了，吴芝圃太左了。”门头横额是“省委失衡”。新铺完小教师杨子富说：“我原来认为共产党怪好，从对潘复生没事找事上来看，我看共产党扯淡。”保宁小学教师海光照说：“我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一切事物，用此一分析就把地主们分析得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教师孙海周说：“合作化啥自愿不自愿？清是逼出来的，‘双统’是靠逮捕人完成任务的！”县商业局干部吕善富说：“潘复生说河南特殊就是不假，陕西省去年人均免购点500多斤，而河南仅360斤。”教师孙敬宇说：“啥合作化是条幸福路，依我看入社后是叫群众活受罪的。”

批判潘复生以来，邓县全县已收回自留地68928亩，耕牛2663头，驴马3006头，猪羊8886头（只）。不少富裕中农把已退出来的东西送回社里，当前，有一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仍然有抵触情绪，有的人恐慌不安，怕被辩论或斗争。如构林乡富裕中农袁明堂说：“讨论时说的再好我也不相信，因为粮食不够吃是铁的事实，潘复生的话没错！”杨林乡富裕中农王风德说：“潘复生犯法，群众没犯法，为啥没收俺们的自留地？”歪子社支书赵朝文说：“牲口分槽喂养咋能算错？咱们社的牲口要不是分散分槽喂养早就死光了。”“批潘”高潮时，方城县独树公社有个农民在几个大南瓜上刻了“纪念潘复生”，“拥护潘、杨、王”等几行大字，有人借此事汇报地委、请示咋办，地委也不了了之。可见当时南阳上下明的暗的都是抵制“批判潘复生”运动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黄宗江(1921—2010)

黄宗江的新居

沙漠 / 文

快乐的宗江已于2010年10月28日,化为一缕轻烟袅袅上升进入天国,而后缓缓回落尘世,入土为安,和爱妻若珊永远定居在北京万安公墓。这里是名人公墓,有许多文化名人安息于此,彼此串门儿、互访,颇方便,爱热闹的宗江不会寂寞。特别是他的恩师曹禺是他们的近邻,他可以时时去请教,恩师肯定不吝赐教。

宗江不久将入住的宝宅,是当年老伴离世后,宗江和女儿们精心选购的。墓碑上刻了“阮若珊、黄宗江之墓”。是大书法家苗子书写的。那时黄宗江三字是红色的(表明此人还活着)。宗江非常满意自己的新居,他给亲朋好友发函,邀请老友们若来京,务必到此一游。吊慰长眠于此的这对老夫妇。

诸位见到的这张照片,是我两年前去北京时,看望若珊姐时留的影。我打电话告宗江:“给你们上坟了,黄宗江三字还是红的,我提前拜祭了。”宗江回应:提前上坟,够意思,我感动。

宗江的新居虽不是豪宅,却是名人公寓(公墓),算不得很气派、很讲究,但比他们生前住的“八一电影厂干休所”有着天壤之别。这里阳光充沛,绿化一流,空气新鲜且自由,风景这边独好。

这里有老伴、有朋友,有创作自由——想写什么写什么,不用审批,无须担心,没有阳谋、阴谋,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宗江还求什么?这是神仙世界!这是修来的福。宗江何年何月能入住新居,他自己说了不算,说了算的是上帝或阎君。

2010年他进入89高龄,传统拜寿习俗做九不做十,好友们为他提前庆九!在寿宴上他谈笑风生,大家频频举杯祝愿他长命百岁!他乐呵呵笑个不停,待百岁后再相聚那多美妙!老寿星快乐着呢。

这样的幸福时刻,他会想到这庆九的寿宴竟是送行酒!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欢乐聚会吗?他和朋友们都想不到老寿星离那个神仙世界不远了!

仅仅三个月后,宗江病,结肠癌,早期。手术很成功,但由于年老体弱,肺部感染,送进重症监护病室,这里住院费每日高达万元(自然都是公费支付),他是部队的离休高干,是文艺界的大名人,他得到高度关注,最好的治疗。一度病情平稳,又转危,报过病危又平稳,反反复复,在重症监护病室住了近一个月。

朋友们担心、揪心,为他祈祷平安。他在重症监护病室,竟然满不在乎,嚷着要出院,要回家。“什么了不起,不就是癌吗?咳,不就是癌!手术,切割就行了……我想吃杏仁豆腐要冰镇的,我要吃……想吃……”被誉为美食家的他在重症病室的病床上,依然琢磨着吃,他心态良好,乐观着呢,仍是爱闹腾的老顽童模样。

朋友们为他祷告:“吉人天相”!以为他会转危为安。

孰料,仁慈的上帝竟收下了他!据说天国需要笑声,才把他接去的,以贵宾身份请去的,很风光呢。

不信?请瞧瞧吧:天国的“欢迎”比人世的“告别”更隆重、规格更高。满眼望去,全是文化名流、大学者。文艺界大名鼎鼎的编、导、演、大明星、大腕……来了那么多,全是老朋友老相识,宗江人缘好,能来的都来了。

咦,怎么京剧的四大名旦:梅、尚、程、荀,特级大腕名须生谭鑫培、余叔岩、孟小冬和言慧珠竟也大驾光临!他们并不都认识黄宗江,但久闻此君酷爱迷恋京剧,不仅是头号戏迷,且是闻名遐迩的“戏痴”。他十分仰慕京剧界的大师泰斗。2007年CCTV戏曲频道为他做了一期节目——《戏痴说戏》。他笑咪咪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我是戏痴!痴痴地爱着京剧,爱着老一辈的名角,如

今当红的年轻的角儿,我也爱。我一生听的戏看的戏太多了,我今年86岁,听戏已87年。”主持人瞪大了眼:“黄老,您听戏87年?您高龄86呀!”“没错!我在娘胎已受到胎教,呵呵。我在美国讲学讲授的是京剧——在美国一大学讲了三学期。我曾和北京人艺副院长英若诚在美国联袂演出英文版的昆曲《十五贯》片段,我演娄阿鼠,大得好评。可惜我没有嗓子,是破锣嗓子。‘祖师爷不赏饭吃’(这是‘行话’——没有嗓子当不了唱戏的演员。)无奈,我才演话剧才写作的……”戏痴宗江对京剧刻骨铭心的爱深深感动着京剧界的大师、大腕,于是多位他仰慕的京剧界早期的大师泰斗相约同来参加这盛会。这真是破天荒的欢迎大会!

早已在大厅迎接他的老伴若珊相拥着久别的良人,紧紧搀扶着依偎着他,这感觉真好。夫妇忙不迭地招呼着,久违了的先期来到天国的恩师、同行、仁人君子诸亲好友。啊!朝思暮想的人们,你们好!一片欢迎声、一片问好声。个个欢笑着,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呵!熙熙攘攘,天堂充满了笑声,一似笑声大合唱,哈哈哈哈哈!其中引吭大笑的男高音,声音特别洪亮,细辨听,竟,竟,竟发自黄宗江!奇哉,他怎么有这样动听响亮的声音?人逢喜事精神爽!奇迹是可以创造的!

宗江的加盟,天堂多了笑声!

快乐的宗江使天国更加快乐!

朋友们,别忘了到宗江新居做客——北京万安公墓(黄宗江三字已是黑体字)。他们会热烈欢迎,热忱款待。你们还可以拜谒诸多文化名流,呼吸新鲜自由空气!

附记:

我是个爱怀旧的人,爱哭的人,到了这把年纪,老友一个个西去,我哭了这个哭那个,告别夏公,我哭。宗江说告别厅里最伤心,哭得最痛的是沙漠。是的,我很痛。我哭的不仅是夏公一人,我哭关爱我的亦师亦友的长者一个个走了。我写《哭光年先生》,一直流着泪写。我哭的也不是他一个,老一辈艺术家、艺人都排着队西去了。

但,有着70年友谊的宗江归天,我没有哭!我一直想着丹青(宗江的爱女,身为香港的教授)从北京来电相告:“爸爸心态好得很,他说:‘不就是癌吗?有什么了不起,手术……’”。丹青说:“爸

爸并没有脱离危险,但他竟提出要吃这个,想吃那个,点了许许多多他爱吃的。他那么乐观,心态好极了……爸爸即使迈不过这坎,也没有遗憾,是的,没有遗憾。”丹青怀着深深的爱,平静而从容。说到爸爸一辈子爱吃,此时此刻还想着吃,她笑了,我也笑了,电话在笑声中结束。丹青真棒!她如此洒脱。

宗江终于没有迈过这坎,丹青电话告:“爸爸走了,很安详。在美国,爸爸这样的高龄老人离世是要庆祝的,庆祝他美好的一生!在我们这里用‘庆祝’不合适。我不知该用什么词表达得准确。为了爸爸美好的一生,请爱他的人们不要悲伤!阿姨不要难过。”

丹青说得好,不悲伤!生死看得开,正确面对死亡。

我顿悟,我不再为高龄老人西去而哭。生老病死是人生规律,喜丧不悲伤!我没有去北京相送,寄去500元请丹青代购一大大的漂亮的花篮。写:亲爱的宗江快乐地走吧。沙漠率小明、雷婷祖孙三代敬献。我要求安放在宗江看得见的地方。我相信宗江看见了,他会莞尔一笑。他会记起当年他向我老伴中敬告别时,宗江、宗英、宗洛三兄妹送了最好的花篮放在沙漠和孩子们献的花篮一旁,中敬看得清清楚楚。如今中敬宗江老友重逢,谈起此事,会说:送你我的花篮,何其相似乃尔,那么漂亮!一个是‘三兄妹献’一个是‘祖孙三代献’,有趣啊!你我消受倍感欣慰。哈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痛悼李普

李公谦逊涵尊容,珠玑文章掷金声。
开国有幸留隽影,浩劫无奈蹲牛棚。
竭虑殚精研略策,阔论高谈善倾听。
临池挥毫风雅见,斗士西行泪纵横。

李普伯伯仙逝,友朋闻之,无不动容。于光远、孟苏、李锐、张玉珍、胡绩伟、狄沙、庄重、何方、宋以敏、戴煌、潘雪媛、钟沛璋、陈敏、张思之、崔军、彭迪、钱行、方徨、郭玲春、胡冀燕、张抗美、谷明诸君嘱余赋诗,代他们同表哀悼之情。

赵来群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深夜

女书法家冯铸

礼谦 / 文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大幕。次日清晨，在武昌阅马场湖北军政府门前，有一个11岁的女童写字义卖，为起义军助饷，她就是此后名振遐迩的书法家冯铸。是什么原因使尚在髫龄的冯铸投入到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中去的呢？这得从她自小受到的教育和影响说起。

书法女神童

冯铸，号冶吾。1901年（清光绪27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滠口镇十里乡东冯家塘村的一个书香之家。祖父冯干臣是清末秀才，擅长诗词楹联，尤其爱好书法。家藏汉砖一块，光洁如镜，以木架支托，教儿孙沾水习字。祖母除操持家务外，兼司磨墨，供全家写字之用。父亲冯拙石（又名白石），业中医，也是饱学之士。堂伯父冯家灏，亦为书法名家，诸体均擅，尤以苏字称著。

冯铸两岁时，祖父和父亲就教她读诗认字，3岁开始练习书法。习字时，祖父要求极严，仅执笔一项，就练了一个多月。要求做到“直体端坐，凝神专注，秉笔中正，腕平笔直，五指协力，抽之不去”。每写一字，祖父依照《永字八法》，按侧、勒、努、趯、策、掠、啄、磔逐笔点评，因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7岁时，就能写擘窠大字，书写对联中堂馈赠亲友，为乡里所传颂。

为开阔眼界，增长才智，冯铸8岁时，在祖母带领下，北上京师，观摩历代碑帖，游览京华胜迹，从中吸取滋养。回武汉后，又在伯父冯家灏悉心教导下继续苦练，并与书法界开展学习交流，提高甚快，为不少著名字号书写了匾额，顿时名传三镇。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作为一家之主的冯干臣，也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比如他就没有让自己的孙女裹小脚，冯铸因而保持了一双天足。这在今天看来似为生活

小事，但在当年却是一件使四乡八邻惊诧的不寻常事件。冯铸也因此有了个外号，叫“冯大脚”。

1911年，各地“保路斗争”风起云涌。这一斗争，与劳苦大众的“抗租”、“抗税”斗争相结合，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此时，冯铸正跟随冯家灏在武汉进行书法创作，参加社团活动。也就是从这时起，她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迪。

冯铸从小就与萧林昌订婚。萧氏也是书香望族，清末有不少人东渡日本留学，有些还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前，在日本铁道专科学校留学的同盟会会员萧曰昌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萧震昌（萧林昌堂兄）相继归来，直接投入到湖北新军中去，做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和发动士兵的工作。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冯铸也逐步参加到群治学社、文学社的一些活动中去了。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首义的第一枪。一夜之间，攻占了湖广总督衙门，控制了武汉三镇。次日，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并推举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

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冯铸在萧曰昌的指引下，与父亲冯拙石一起，奔赴武昌阅马场，在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门前，泼墨挥毫，写字义卖，为起义军助饷。众多围观者见此情景，啧啧称奇，消息迅速传开。素有翰墨雅兴的黎元洪得知此事，即命侍从召见冯氏父女。经当时已在都督府任秘书的萧曰昌介绍，黎元洪要求冯铸当面试笔，冯铸从容濡墨铺纸，写了一联赠送黎元洪：“春雷动地苏万物，辛亥义举复神州”。黎见冯铸挥洒自如，笔法质朴遒劲，厚重雄健，清逸秀挺，不禁拍案叫绝。立即写了“女士义举”一幅回赠。当黎得知冯铸也是黄陂人时，更为高兴，表示要收这位既属翰墨之同好，又有桑梓之谊的小同乡为义女。冯铸征得冯拙石的同意后，遂拜黎元洪为义父。此事引起新闻界的极大兴趣，广为传播，成为辛亥革命时的一段佳话。

辛亥起义后，湖北革命军民与前来镇压的北洋军队展开了40余天的武汉保卫战。这时，冯铸仍然与革命文学团体紧紧站在一起，继续以鬻书所得罄囊助饷。

1912年初，民主革命暂时受到挫折，刚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应黎元洪的邀请，作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在胡汉民、廖仲恺等数十人的陪同下，于4月9日到武汉视察。4月12日，同盟会湖北支部在武昌阅马场附近的湖南会馆举行欢迎大会。会场上布满了各界名流的颂歌、赞辞，琳琅满目。冯铸出于对革命领袖的敬仰，书写了一副对联，张贴于醒目处。联曰：“所作空前绝后其人长乐永康”。上联歌颂了孙先生的丰功伟绩，下联表达了对革命伟人的衷心祝愿。言简意赅，质朴无华，加之隶书大字，颇具功力。孙先生及随行人员得悉此联出自11岁女童之手时，不禁交口称赞：“真是书法女神童！”当时参加了欢迎大会的《民国公报》记者陈霁云在所撰写的《中山先生驻鄂记》中，即时将此事作了报道。自此，“书法女神童”冯铸之名，更是传遍四方，慕名求书者接踵而来。

1913年，冯铸的书法作品被选送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出，一举夺魁，评为世界儿童艺术作品一等奖，获金质奖章一枚。

江浙投师 法有正宗

为寻求名师指导，法有正宗，冯拙石决心携女远游求师。1914年初赴上海，寻得隐居沪郊的“清道人”李瑞清。李氏为清末民初五大书法名家之一，其书法艺术熔铸古今，并集成《清道人临阁帖》一部传世。清道人见冯铸书法已有根底，而且聪颖好学，欣然收为弟子，教她习练魏碑。经李氏精心培育，严加磨炼，冯铸的书法从形体到意韵有了质的飞跃。临别时，她秉笔书写“寿”字中堂一幅，敬献严师。李氏亦挥毫题写“气可吞牛”四个大字，勉励自己的第一个女弟子，并以《清道人临阁帖》相赠。

同年4月，冯铸父女又去杭州，拜谒书画篆刻大师吴昌硕。吴氏是一位既秉承传统，又善于变法，饮誉海内外的艺术家。在这位大师的教导下，冯铸广习隶、篆各体书法，融会于自己的创作之中，深得吴氏嘉许，以石鼓文书写了“篆隶摩空”一

幅，作为奖励，并亲自刻了一套印章，赠给了自己的得意弟子。冯铸感激之余，临别时又大书“寿”字中堂一轴，敬谢恩师。江浙求学归来后，冯铸全身心地投入书法创作交流活动，在书法界的知名度不断提高。

1916年6月，“窃国大盗”袁世凯病死后，黎元洪按当时的《约法》，继任民国大总统。黎为给义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先是推荐冯铸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习。后在冯拙石的陈请下，让有外文根底的冯铸未婚夫萧林昌入“交通传习所”深造学习。而目睹京城官僚腐败，官场的虚伪，冯铸父女则于1917年春离开了北京，有幸避开了“张勋复辟”造成的更为混乱的局面。

冯铸之未婚夫萧林昌，字孟壬，号梦云。1899年生。三岁丧父。少年时期，由亲戚资助，入汉口法文学堂学了法语。1921年，“交通传习所”与“北京邮电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扩建为“交通大学”，经岳父申请后，他成了北京交大第一期的学生。

萧林昌在北京交大学习期间，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了“五四运动”。在有3000多学生参加的五四游行示威中，他高举用法语书写的声讨“背公理而逞强权”的帝国主义、揭露卖国贼曹汝霖（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媚外求荣”罪行的标语牌，参加了冲击曹汝霖住宅，火烧赵家楼等行动。“五四运动”期间，他与郑振铎等知名人士在斗争中建立了友谊，以后还时有诗词唱和之作。

1923年，冯铸与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归来的萧林昌结婚。她自沪杭学书归来，至22岁结婚，这六七年的时间，其书法不断精进，与各界名士学者有大量酬答之作，给武汉著名商户写了不少匾额。1914年她为汉口黄鹤楼下的摄影店“品芳照相馆”书写的招牌，至今仍悬挂在这个老店的门口。湖北省博物馆也收藏了她所书写的隶、篆、真、行等各体遗墨为珍藏之宝。

鹑鸽双栖 相夫育子

冯铸结婚后，寓居汉口三元里。萧林昌仍回平汉铁路局任职。由于铁路员工薪金较为丰厚，而且职务提升较快，家庭生活优裕。林昌工中楷，冯铸

我国首枚地对地中程弹道导弹常规弹头研制纪实

王菁珩 / 文

艰险任务

1985年7月一天下午,已临近下班时间,办公室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在厂的保密专线电话里,传来核工业部军工局刘果局长的急促声音:

“老王,国防科工委来电话,国外急需一种能形成威慑力量的地对地中程弹道导弹的常规弹头,能否在半年内交付?你们研究一下,下班前给我一个答复。”我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连声说:“好!马上研究,下班前答复。”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厂从1982年开始常规弹头的调研,1985年加

书法作品上下款往往由其书写。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为亲友所称赞。有感于家庭生活之幸福,乃将寓所冠名为“鹤鸽楼”。

“鹤鸽楼”生活,既幸福而又有艰辛。从1925年至1935年间,冯铸生了4个儿子,都亲自抚养,萧林昌因公奔波在外,家务悉由冯铸操持。

尽管家务缠身,但冯铸仍濡墨习字,日课不辍。即使在回娘家乡居之时,也写了不少中堂屏联,署名“山峪冯铸”,匾赠亲邻。

1936年,萧林昌调往粤汉铁路局工作。为适应这一变化,先是举家迁至武昌县花林居住。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时,萧林昌又远在湖南衡阳,冯拙石老人为照顾爱女,特地从乡下赶来,将冯铸全家迁移到汉阳蔡甸,借居于世交吴小梅家中。吴氏为当地世家,藏书颇丰,交往文士不少,这又给冯铸提供了施展才艺的环境。

国难家破 兵燹洗劫

抗日战争中,武汉形势日趋紧张。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家庭不幸也频频降临。精心培育冯铸成材的祖父母辞世后,1940年萧林昌又因患肺癌久治不愈,于1941年秋病逝。这对冯铸和全家人更是极为沉重的打击。丈夫去世后,冯铸为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计,只得去当家庭教师,但薪资微薄,难供菽水。不得已,乃将婆母、儿子送回溇口老家,独自在汉口谋生。为节省房租,寄居在汉口唐家墩之

世交杨彦臣家中。当时武汉成为二战时期与中国结为盟友的美国轰炸的重点,冯铸寄存杨家的全部物品,包括李瑞清、吴昌硕两位大师的手迹和赠送的字帖、印章等稀世之宝,以及她与各界名流酬答的大量书法作品,都化为灰烬,这对于她,真是致命的打击。不久,举家迁居至谯家矶,在当地乡办小学教书,勉强度日。

历尽炎凉 东流归去

日寇投降前夕,避难异乡而又时时挂念女儿的冯拙石不顾年迈,从湖南常德冒险归来,在冯家塘重操旧业,治“水臌”(血吸虫病)杂症。虽收入有限,但对女儿一家多有照顾。然而,不久善治“水臌”的拙石老人,不幸自己竟染病不起,冯铸在极度悲恸中,精神几乎崩溃。

冯、萧两家的族人,在冯家塘、溇口、谯家矶等地的,为数不少。然而,冯铸亲属今非昔比。有些昔日亲如家人的,如今却形同陌路。在炎凉世态中,她求告无门,只能靠自己苦撑。1949年5月,武汉刚刚解放,新的人民政府尚未建立,穷途潦倒的昔日书法名家冯铸,成了饥饿线上的挣扎者。她孑然一身,怀着绝望的心情,于当年7月长江水汛到来之际,离家出走,渺无踪迹。按当时情况分析,她是投入了浩浩长江,东流逝去了。

一代著名女书法家,就这样从人间消失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大了开发力度,集中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开展了不同类型导弹弹头的调研和预研。技术研究部利用核武器退役的高能炸药部件,进行了常规弹头起爆方式等试验。1986年6月,在六厂区623工号,进行了常规弹头1:1静爆威力试验,这是一次从弹头设计、装药、起爆方式、到测试方法和爆炸效应的综合检验。也是展示厂在设计、精密机械、火工、无线电、爆轰试验独特的综合技术优势。总参、国防科工委、二炮、航天部、中船总公司及核工业部有关人员参观了试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赢得兄弟单位好评。岸对舰半穿甲型弹头研制方案和可行性报告,在激烈竞争中一举中标。常规弹头无线电引信机的研制,取得重要进展,增强了厂承担大型常规弹头研制的信心。

20分钟后,有关负责人员来到办公室,根据“形成一种威慑力量”的要求,提出了初步战术指标和技术方案。但总体设计与无线电引信机,能否在短期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是交付的关键。在议论中大家认为:二二一厂在我国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的16次国家核试验、核武器化批生产中,锻炼成长了一支忠诚于核科技事业,勇于创新,拼搏奉献,能打硬仗的科技队伍,和业已形成的严肃认真、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万无一失的科研作风。只要我们凝聚科研人员的智慧,利用核武器研制、试验、定型的科研成果,采取非常规的措施,产品可以在九个月内交付。意见很快传上去,军方组建了“××工程”办公室,并指出:“此项任务是一项指令性、时间性、保密性很强的任务。”“二二一厂在该任务中处于特殊地位,是成败的关键。”“厂长作为任务的第一责任人。厂要作为一项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做到保质量,保保密,保进度交付。”

1987年1月,军、厂双方草签了常规弹头研制合同。厂产品代号为“118”,确立了“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特事特办”的工作方针,军、厂召开了技术协调会,签订了研制、试验、技术鉴定、产品交付合同。合同的签订职工情绪高涨,各级领导和职工纷纷表示:要创造性地把“118”任务和厂的战略调整做好,让国家放心。厂、矿党、政、工、团齐心协力,努力拼搏,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制中。厂健全了“118”设计师系统,在关键技术岗位上大胆启用年轻技术人员。技术研究部的工程技术

人员在主管火工技术的吴、邢副总工程师和叶副主任领导下,组织进行了多次爆轰试验,完善了总体结构设计。又应用某型号核武器研制、试验成果,通过大量的计算、分析、论证,减少了某项大型环境试验,缩短了研制进程。质量管理处制定了关键部组件质量考核指标和产品验收原则,组织关键部件“QC”小组的技术攻关。企业改革办公室加大包、保、核和经济责任制考核奖惩力度,推行双向考核。有关机关职能处(室)考核分厂的包、保、核指标,分厂考核总厂机关职能处(室)经济责任制完成情况。陈总工程师和任副厂长、主管无线电技术的吴副总工程师经常带领设计、生产、质量、器材业务处领导深入第一线,现场办公解决问题。器材处同志把急需器材送到车间。党群系统的同志深入基层,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科研生产第一线,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团员的突击队作用。总厂工会带着慰问品,看望深夜加班的职工。食堂为夜班职工准备了可口的饭菜送到车间。

正当“118”任务全面推进时,青海省省长宋瑞祥向厂长和书记传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二二一厂报告的批示:“我不懂这一行,是否要考虑他们提出的问题,请爱萍同志酌处。”张爱萍作了长达927个字的批示,指出:“二二一厂在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工作中,在科学家们共同努力下,作出了特大的贡献,在发展我国核武器方面建立了历史功勋。”“我个人意见,同意采取第二方案所提的原则。”(注:第二方案即对二二一厂撤点销号)还提出了撤点销号几条具体意见。看着这长长的927字批示,我思绪万千,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迷茫。原想“118”任务的到来,可能带来厂调整的转机,现在看来已不可能了。但基地如何撤,如何妥善安置好职工还存在一线希望。老的肌体消亡了,还可以产生新的基体。我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情,盼望中央对厂调整文件的下达。

3月,二炮技装部栗副部长受张爱萍同志委托,只身来到二二一厂调研,听取了厂、矿领导关于转民和厂调整的设想和建议。视察了正在进行的“118”产品环境试验。参观了一、二、三、四分厂和三、四、六、七厂区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试验装备。栗副部长离厂前表示,二炮愿与二二一厂在

河北共同兴建厂安置部分职工。我们又写了一封长信,请他转交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盼望小平同志给予指示。

1987年春节,大年初一举办了厂、矿首届迎春团拜会和大型游园活动,厂、矿职工喜气洋洋庆贺1986年核武器产品优质交付,厂、矿财政实现盈利的目标。青海省委、省政府发来贺电,部领导来电慰问。二二一厂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欢乐的气氛。大年初二,一分厂系统室的科研技术人员,主动来到实验室进行无线电引信机的调试。吴副总、分厂领导也亲临现场看望同志们。同志们感慨地说:“64年突破原子弹草原会战的劲头又回来了。无线电引信机科研技术人员夜以继日,顽强拼搏,协同攻关,3月中旬,实现了联机成功。”

胜利曙光

为迎接“118”技术鉴定会的召开,厂召开了小型协调员会。一、二、三分厂和技术研究部领导表示,实干、巧干一个月,实现无线电引信的技术突破,完成“118”各项环境实验、总体结构设计和技术文件准备,确保鉴定会如期召开。军方领导来厂视察,看到紧张进行中的“118”产品环境试验和研制的无线电引信机技术难点取得突破,质量保证系统有效运转,他们高兴地表示,同意鉴定会如期召开。7月28日,“118”技术鉴定会在二二一厂举行。会议充分肯定了二二一厂应用核武器技术、装备、定型的考核工程系统、先进炸药配方和等静压技术的装药工艺、多项大项环境试验、新研制的无线电引控系统,各项技术指标,达到规定的要求。“118”产品通过部级鉴定,可投入批量生产。这标志着厂已掌握了常规弹头设计、装药、试验、无线电引信机爆高的精确控制。正是由于这些关键技术的超前预研,技术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保证了“118”总体目标的实现。地对地中程导弹常规弹头的研制生产,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历史责任

核工业部二二一厂在完成我国第一代核武

器研制生产历史使命后,于1987年6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批转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关于撤销核工业部青海二二一厂的请示》的国办发(87)40号文件(简称40号文件),厂情的急剧变化,职工心里一时失去了平衡,跌入失落感的深谷。整个金银滩草原像开了锅似的,失落、伤感、惋惜的情绪笼罩着草原上空。有的说“为之奋斗几十年的核武器工厂,中国人民利益所在的单位,就这样撤了,太让人寒心。”有的说:“过去是突破原子弹、氢弹,现在是滚蛋、完蛋。”221人将面临一场利益大调整的严峻考验。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痛苦、最艰辛,也是最不愿看到而又发生了的事情。种种的担心、忐忑不安的忧虑、重大的责任一下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核工业部蒋心雄部长、李定凡副部长、刘书林顾问、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工委业务部门领导率部司、局领导,来厂宣讲40号文件,蒋部长在处职以上干部会说:“由于世界和平和战争观点重大转变,我国国防建设指导方针,从临战时期的国防建设转变为平时时期的国防建设。”“随着国防建设战略方针的转移,我国核武器研制、生产任务布局也要进行调整。撤销二二一厂是中央经过调查研究,长期酝酿,反复论证,慎重作出的正确选择。”“要求大家特别是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转好感情的弯子,理顺情绪,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理解40号文件的积极意义。”“要珍惜二二一厂集体荣誉和历史功勋。坚持边生产、边调整,逐步收缩转移的方针,为调整作贡献。”他们召开不同类型人员座谈会,深入车间看望一线科研、生产的职工等。讲话和活动,在干部和职工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员工逐渐认识到二二一厂的撤点销号,是国家战略调整的需要,是特事特办的国家行为,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大家纷纷表示,要以“118”任务为支撑,维护厂区稳定,推动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妥善安置、核设施退役处理、基地移交和平利用三大任务完成。

正当一些职工难以接受撤点销号方案,质疑谁向中央打的报告时,传来二炮栗副部长的口信说,小平同志认真看了你们带去的资料和信件,沉思了一会儿说:“可惜是可惜。15年打不起仗

来,就是要压缩,也只能这样办。”听到小平同志也发了话,我们对保留二二一厂队伍,不再抱什么幻想了。一心一意按中央部署和要求搞好撤点销号工作。

有惊无险

“118”生产紧张、有序进行,产品交付迫在眉睫。为满足无线电引信机批抽检需要。一分厂系统室决定,开辟第二调试现场。引信机调试工作的加快,外协厂某关键元器件,供应上满足不了需要。厂当机立断,改变供货单位。派出一分厂质管科领导和技术人员,与研制厂协作攻关,试制出合格的元器件,完成了技术定型,保证了关键元器件供应,调试出多台引信机一次通过抽检,为实弹试验完成了最后准备,也为今后产品维修创造了条件。

1987年11月,满载“118”科研成果和职工的希望,装运产品的火车专列从青海金银滩草原出发,驶向太原卫星发射试验基地。车厢里欢快的谈笑声和沉甸甸的责任交融在一起。两眼望着窗外静坐在卧铺上的系统室的李主任设计师陷入了沉思,从1987年大年初二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日夜奋战,渡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无线电引信机通过了部级技术鉴定。但引信机能否在预定高度引爆将面临严峻考验,他感到犹如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心头。餐车张管理员一声“开饭啦!”老李才从沉思中惊醒。火车运行两天,来到山西雁北的一个小火车站,由于一时缺乏起重设备,20多名年轻的作业队员硬是把越野汽车从火车平板车上抬了下来,大轿车、卡车陆续从平板车上开了下来。产品、装备和生活用品,分别运往营地和技术阵地,准备工作顺利完成。

根据气象资料,发射选定在19日下午4时。那天清晨,湛蓝的天空,飘浮着朵朵薄纱似的青云。队员们精神饱满地来到发射阵地,进行发射前的各项准备。满载火箭弹体和弹头的密封汽车,缓缓驶入发射阵地。在发射旅长指挥下,身着深绿色工作服的战士,安全、准确地卸下弹头。进行弹头与火箭体水平对接。导弹在托架支撑下,缓缓地垂直竖起,平移 to 发射架上。一辆辆满载燃料推进剂的汽车驶入阵地,身穿防化制服、面

戴防毒面具的战士接通导管,将推进剂注入弹体。耸立在发射架上的导弹,如同即将出征的勇士,昂首直刺苍穹蓄势待发。我和吴副总来到离发射架195米的弹头遥测指挥所,9号指挥长由一分厂吕副厂长担任。1号总指挥长发出口令:“9号进入零前30分。”9号指挥长回答:“明白。”并发出指令:“零前30分,×××装置打开。”

年轻技术员小周,按9号指挥长的口令,冷静、准确地操作旋钮,指示灯打开。随着启爆最后几分钟的到来,异常情况出现了,零前3分钟时,×××装置第一次操作,指示灯不亮,操作不成功。弹头遥测指挥所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9号指挥长发出第二次、第三次口令,操作均未成功。9号指挥长向我们报告:“是否延后10分钟。”

我和吴副总当即表示:“同意。”

9号指挥长立即向1号指挥长报告:“×××装置出现故障,请求延后10分钟发射。”

1号指挥长说:“同意。”

小周随即搬出第二台仪器,操作了三遍,仍未成功。我和吴副总眼神凝聚在一起,当即向9号指挥长说:“向1号报告,停止发射。”

9号指挥长向1号报告说:“停止发射。”

1号指挥长表示同意。头部遥测指挥所内一片寂静,人们的脸色低沉,神经骤然绷得很紧。半小时后现场召开了试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发射试验葛总指挥宣布会议开始说:“二二一厂操作能不能证明×××装置没打开呢?”

吴副总回答:“没打开。”

葛总指挥果断地说:“现在只能卸出导弹燃料,分解弹头。二二一厂尽快采取措施,排除故障。什么原因造成的故障,希认真研究。”

“同意。”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王厂长,你有什么意见?”坐在对面的杨副司令员问。

“同意停止发射。我们将尽全力,尽快排除故障。”我马上回答。

杨副司令员接着说:“看来,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我也同意。说明今天同志们的操作和处理是正确的。在试验中暴露出问题,应该说是件好事。下步在卸出燃料和弹头分解中一定要注意安全。”散会后走出会场,望着黑云密布,一颗星星

也看不见的阴暗天空，回到头部遥测指挥所，除留少数同志处理现场外，其他人员回营地。在营地，队员们三三两两在一起分析查找原因。而厂的作业队领导小组会紧张进行，部队计划部张部长和核工业部军工局陈常宜副局长、宋家树总工程师参加了会议。

会议决定：(1) 成立以任副厂长为首的弹头安全分解小组，确保弹头安全分解，做到万无一失；(2) 成立以吴副总为首的故障分析小组，尽快找出故障原因，采取措施，确保下次发射试验成功；(3) 设计人员尽快赶来基地。

第二天一早在火车专列的餐车上，通报了情况指出：当前最重要的是稳定情绪，查找原因，以最快速度排除故障，保证下次发射成功。吃完早饭回到营地，传来有关方面基于安全考虑原定的实弹飞行试验取消。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我方坚定自信地说：“我方坚持继续试验，保证近几天内排除故障，采取可靠措施，确保下次发射成功。”意见反映上去，没有回复，看来在等待我们工作的结果，这更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压力。

中午时分，太阳高照，晴空万里。我和厂办公室宋副主任来到发射阵地，与已到场的发射旅参谋长亲切握手，在参谋长的指挥下，战士们沉着、稳健、有序地工作，卸出燃料的工作准备就绪。××基地技装部张部长走过来，热情地说：“王厂长，你们回去吧！我们放心。”我说：“现在也没事，我们在这里看看，战士们可以放心操作。”我们直到下午1点半才离开。分离的弹头安全运入技术阵地，弹头安全地分解。故障分析小组和从厂赶来的设计人员对××装置进行一系列试验，通过多次模拟实验和反复分析研究，第三天故障原因找到了。在这不平常的几天里，每次发射试验领导小组开会，我作为发射试验副总指挥，一直保持与故障分析小组的热线电话联系，及时在会上通报故障排除进展的新情况，以增强领导小组成员的信心。延迟发射后的第三天下午，在试验领导小组会议上，最终取得共识认为：厂通过多次模拟实验，原因已经找到，所采取的措施切实可行，可以100%保证试验成功。会议倾向第二天发射。22日晚传来消息，上级同意23日再次发射并指示：做好，做细，确保安全。我们连夜召开作业队领导扩大会议，宣布再次发射的消息。挂在

大家心头上的石头终于落地，大家决心举一反三，查缺补漏，精心操作，确保再次发射成功。

23日清晨，空气清新而沉静，太阳跃出地平线，早早地露出了笑脸。发射准备有条不紊地进行，军绿色的导弹威武地耸立在发射架上。在冬日绚烂阳光的照射下，导弹像巨人，显现得更加亮丽、多彩、壮观。我们在弹头遥控指挥所，对××装置进行演练操作，获得成功。杨副司令员和葛总指挥看到两个指示灯都亮了，露出了笑容，握着我的手说：“祝你们成功。”“谢谢你们的理解支持。”我回答。队员们静静等待“零”时的到来。夜幕降临，原本晴朗的天空，布满乌云，顿时下起瓢泼大雨，人们的心情又蒙上一层阴影，只好耐心等待。半小时后雨过天晴，倒计时开始，弹头遥控指挥所一片寂静，只有仪器上的闪光点在不不停地闪烁。我们静静等待3分钟的到来。9号指挥长发出零前3分钟口令，××装置成功打开，大家面部绷紧的神经顿时舒展开来。1号指挥长发出“5、4、3、2、1，点火”口令后，导弹在深夜零时点火成功，随着隆隆的震天巨响，火光划破夜空，尘土滚滚飞扬，绿色火箭喷出一束白炽、红亮的火焰，托着“118”弹头缓缓升起。××秒钟，火箭向北飞去，消失在茫茫苍穹之中，天空留下一道绚丽的白色烟迹。×××秒火箭与弹头分离，××分钟末区传来消息，观察到目标，弹头在预定目标成功爆炸。人们从各指挥所，从山坡，蜂拥般涌向发射阵地。发射阵地沸腾了，到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人们含着热泪拥抱、跳跃、欢呼。现场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杨副司令员宣读了部队首脑机关发来的贺电，指出：“这次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导弹武器研制水平又有新的发展……标志着二二一厂在转移尖端技术，开发常规军品方面取得的成功，为增强国防又作出了新贡献。”核工业部发来贺电：“118弹头从研制到实弹飞行试验成功仅用了10个月，这个速度是空前的，是二二一厂广大职工贯彻边生产、边调整方针，顾全大局、团结奋战、艰苦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取得的丰硕成果，再一次证明，你们是一支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能攻关，素质好的队伍。”双方领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互赠锦旗。在当天部队举行的招待会上，计划部张部长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可以说是患难之交，现在让我们共

享胜利的喜悦，实现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射精度，无线电引信机达到理想的战标。”实弹发射试验的成功，实现了从核武器技术向常规武器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在型号上的突破，填补了我国战略导弹核常兼备的空白。

原计划10月底交付的常规武器弹头产品，军方要求提前到10月28日零时交付。原本非常紧张的交付计划，再提前三天可以说是相当困难。但国家需要就是命令，我们召开了紧急生产会议，调整劳动组织，按小时进度倒排作业，实行产品总装、系统联试不停的连轴转作业计划，职工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强化服务意识，上道工序做好为下道工序服务，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地完成任务。10月27日中午12时，厂长在出厂的质量文件上签了字。产品顺利装上火车专列，28日“零”时准时从厂发出。

继续冲刺

随着职工安置工作的展开，厂内对“118”后续任务是否全部承担产生了分歧。在生产例会上，部分单位领导表示：由于“两个安置办法”（1）和政策细则逐渐明朗，职工、家属思想异常活跃，担心221基地一分为二时，留基地的二二一厂炸药加工爆炸伤亡事故重演。而这一次安置对职工波及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往年，不主张多承担后续任务。在会上，我们没有简单地作决定，而是在会后分别召开了厂、矿办公会、职代会主席团会、主要分厂领导座谈会、最后召开有总工程师、生产副厂长、副总工参加的小型会议，认真分析厂撤点销号形势。认识到落实国办发（87）40号文件的“两个安置办法”，涉及12个部委和总公司，有一个协商、磨合的过程，目前还难以出台，职工的安置年内不可能有大的动作。“118”任务的实践，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厂区要稳定，队伍要有凝聚力，就必须有科研生产任务支撑，厂、矿这部机器就会围绕任务完成有序运转；有任务就能锻炼队伍，提高员工素质；有任务就能为厂积累资金，改善职工福利；有任务就能实现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撤厂。为了保持“118”产品技术上的一致性，我们有责任承担全部后续任务。最后主管科研生产的几位领导一致表示：“从

形势和利弊分析，任务我们应全部接。厂长，你拍板吧！你说怎么干，咱们就怎么干。”已是水到渠成的时候，我兴奋地说：“好！任务全部接下来，咱们一块儿干。”在第二次召开的厂、矿办公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全部接受“118”后续任务。

厂内思想是统一了，但上级主管部门从今后产品维修上考虑，提出后续任务的无线电引信机由另一家单位承担研制和生产。虽然我们表示强烈的不快，但难以说服上级主管部门，决定两个单位研制的无线电引信机一同参加“118-12”飞行试验。

1988年5月22日，在太原卫星试验基地，进行了“118-12”飞行试验，试验中搭载了另一个单位研制的无线电引信，经飞行试验的分析比较，厂研制的无线电引信机，动作程序正常，技术稳定可靠，达到各项指标要求，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上级决定“118”后续任务的装置和无线电引控系统全部由二二一厂承担。军厂双方很快签订了后续任务批生产合同，我们的技术人员、工人、干部情绪饱满，严肃认真，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万无一失地忘我工作，按合同要求，保质、保安全、保保密，圆满完成了后续批生产任务的交付。从1987年40号文件下达到1991年，累计实现常规弹头销售收入×亿多元，其间，国家减少拨给厂撤点期间维持费一个多亿元，取得销售利润近×千万元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社会效益。这是二二一厂科研技术人员和全体职工，在中央和核工业部的领导、关怀支持下，贯彻“118”任务的特殊性、政治性、保密性的丰硕成果，这是二二一人用智慧和力量，用忠诚和奉献奏响奔向新征程的一曲凯歌。在中核总公司年度工作会议上，二二一厂受到表彰，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成功研制“118”并批量生产，维护了基地的安定团结，为撤点销号赢得了方案调研、“两个安置办法”制定的宝贵时间，实现了相对集和合理分散妥善安置了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完成了核设施的退役处理，还金银滩草原一片净土和蓝天。1994年6月15日，厂向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正式签订移交协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化剑为犁的核武器基地。实现了撤点销号的软着陆。这是221人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在新形势下交给祖

1945年8月 牡丹江焦土之战

闫强 / 文

焦土之战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情况

1945年8月9日清晨5点左右，照例打开收音机听“新京中央放送局”“放送”。伪满时把长春称“新京”，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把广播称之为“放送”，广播电台称之为“放送局”。当时日本人把大量日语词汇混到汉语中来称之为“满语”，其目的是想从语言上同化中国人。

突然从收音机中听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反复播放了几次，我和父兄们都感到很是诧异，怎么回事？因为平时从未这样广播过。平时战报都是由东京日本大本营发布，只是美空军B-29轰炸沈阳、鞍山等地时才由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战报，而且从来也没这么早过，都是晚上。我们正在莫名其妙，接着听到：苏军不法越境……我们顿时精神紧张起来，转而又高兴起来。紧张的是牡丹江要成为战场了，高兴的是日本鬼子要垮台了。

1903年以前，牡丹江这一带人们称之为黄花甸子，主要是沼泽地带，中东铁路建成后，设立了牡丹江站，在现在的文化宫，为的是给机车供水，所以建立了水塔，水源地建在现在的南市街检察院前面那个泡子处。当时是活水，南湖公园的南湖、月牙湖，直到发电厂附近的泡子通着，然后流入牡丹江河流中。当时以火车站为中心，形成了集市，货物集散地，其范围也不超过现长安街两侧、东一条路、西二条路之间。1932年5月日军占领了牡丹江，但是由沙皇修建由苏联继承的中东路，日本是不敢侵犯的。1934—1935年间日本修筑了图们—佳木斯的铁路，至此，从“新

京”（长春）—图们—佳木斯铁路可以通车了。当时有个日本人叫做山岭贞二坐飞机在牡丹江、宁安两个盆地上空巡视了一遍，回去向日本关东军军部建议，在牡丹江设立铁道局，他任首任局长。他认为，比起宁安来牡丹江是铁路枢纽，有中东和图佳铁路。以后日本又在牡丹江设省、市建制，成立了伪省公署、市公署。把牡丹江市划分为旧市街、第一新市街、第二新市街。旧市街，以中国人为主要居民，在老火车站（文化宫）以南，有商店、烧锅、妓院、大烟馆，有富人区，也有贫民窟。现文化宫以北，红云桥以南称为第一新市街，主要是日本商业区。有银行、高冈号等百货商店，三菱株式会社、铁道局，最繁华的是“银座通”。虹云桥以北称为第二新市街。伪省、市公署在这里，主要是日本居民。他们是日本官员、铁道局职工及干部，很少有中国人。

1945年，日本战败前的牡丹江主要是作为日本反苏基地而发展起来的。号称“马来亚之虎”、后被盟军定为战犯而被绞死的山下奉文大将（在牡丹江时是中将），其官邸就在现在的中药厂的地址。另一名清水中将在苏联对日宣战后，在牡丹江指挥日军抵抗苏军。其官邸在一二一厂爱民街处。除此之外，伪满的第6军管区司令部也设在牡丹江，现红旗医院处。

牡丹江四周环山，日本利用这个地形，在市区边缘山麓下建立了军营、仓库和司令部。在海浪建立了巨大的军用飞机场。现西十一条路以西地区被称之为261部队，军马场南部被称为39部队，正北山开有山洞，东北山，现机车厂以北有日本军用仓库储存粮食。这些地方都有铁路专用线。铁岭河南山有日本军营及日军疗养地。市内

国和人民的一份完美答卷。

221基地（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老家，后来的二二一厂），现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首府—西海镇，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如今绚丽的“蘑菇云”已经散去，银滩草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敞开胸怀迎接八方宾客。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日本军、警、宪、特及其走狗多如牛毛。可以说牡丹江就是一个大军营。谁要控制了牡丹江,谁就控制了东满地区。所以说牡丹江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也说明为什么苏联出兵东北最激烈的战斗是在牡丹江进行的。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这地方,在牡丹江设立了日本领事馆。1941年4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和苏联签订了《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后,回国途中领着他女儿松冈洋子到牡丹江视察,在当时的铁道局厚生会馆做了报告。之前几年,伪傀儡皇帝溥仪也到牡丹江“御巡幸”,住在站前大和旅馆,检阅了小学生体操表演,并到北山顶观望了牡丹江全貌,而后建立了一个碑,碑座上写着:皇帝陛下御览地。这个碑座1954年还存在,不知什么时候拆掉了。为了溥仪到北山巡幸,从车站到北山的路上全是黄沙铺地,并专门修了一条道,以使汽车开到山顶上,这条路现在还存在。

日军在牡丹江焦土战之经历

“新京中央放送局”在播送完苏军越境消息之后,接着又播送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通知他苏联废除1941年签订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宣布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即对日宣战了。

我们家人在惊惧和喜悦心情平静下来以后,上班的准备上班,上学的准备上学,我就背着书包上学了。没有估计形势多么严峻。

牡丹江离苏联不到200公里,一有风吹草动,牡丹江就紧张起来。1938年在中、朝、苏边境张鼓峰发生了日苏冲突,人们称之为“张鼓峰事件”,苏联称之为“哈桑湖事件”——在苏联哈桑湖地区。迄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军事博物馆还展览当时苏军使用过的机枪、迫击炮。1939年在中蒙边境诺门汗地区,日苏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当时称之为“诺门汗事件”。在这两次事件中牡丹江市受到影响,官方叫居民挖防空壕,晚上实行灯火管制,警察检查各家晚上是不是漏灯光。从海浪机场到铁岭河南山有几十束探照灯光照射天空搜寻,看是否有苏联飞机。虽然形势很紧,但是社会活动一切都正常进行,机关照常上班,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

1941年4月苏日签订了《日苏互不侵犯条约》。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苏日两国都忙于对付自己的对手,两国之间相安无事。所以牡丹江虽处在战时状态,但市面倒也平静,没想到日本会垮得这么快,真是兵败如山倒。

我就抱着这种心理状态到了学校。一进学校,气氛全变了,停止上课。日本校长枥久保义荣给学生训话说:过去战场离牡丹江很远,在太平洋上,现在牡丹江成为战场了,我们要像冲绳岛抵抗美军那样抵抗苏军。冲绳岛战役是1945年4月由美军进行的,日本军队和居民包括老年人、妇女、中学生都参了军和美军作战,有的儿童被疏散往日本本土,在运输途中,轮船被美国潜艇击沉。冲绳之战日本共死亡30万人,其中平民死亡20万人。

日本校长训完话后宣布停课,要学生回家准备参战。我们同学之间也就没有说笑的了。

8月10日父兄还是上班了。电台还在播音,午前10时左右,突然播出:苏军飞机200架经穆稜上空往牡丹江方向飞行中,我们家人顿时慌了。家里也有防空壕,不过因为没有实战,主要是为了应付检查,糊弄鬼子的,所以挖个壕,铺上几块板皮,盖上一层土,就算防空壕了,一点实用价值也没有。现在一较真,日本人也不管了,警察也不来检查了。苏军飞机要来了,我们倒真想防空壕了,可是来不及了。在惶恐中不知所措,幸好苏军飞机没来轰炸,于是赶紧拆旧防空壕,重新挖,重新盖。

8月11日家父不上班了,哥哥还上班。我们开始重新把防空壕往深里和宽里挖,然后用枕木做横梁,再铺板皮,蓬上土,壕顶的厚度有一米左右,机枪扫射,弹片是穿不透的,只要炸弹不落在正顶上,那就是比较安全了,再也不糊弄鬼子了。

我们觉得奇怪的是,怎么电台什么也不播了,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傍晚6时左右,我看到了有十几架飞机,从东南方向沿着发电厂上空飞来,在夕阳反射下看见飞机撒传单,传单是一闪一闪的往下飘落,经东一条路上空,听见几声嘭嘭声,飞机向西北方向飞去,在军马场上空又向东北方向飞去。这时,牡丹江顿时大乱。这是牡丹江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轰炸,虽然只不过扔几颗



牡丹江东宁要塞位于东宁境内，是侵华日军为防御苏联的进攻而修筑的军事筑垒，正面宽 100 多公里，纵深 50 多公里。曾屯驻日本关东军三个师团，计 13 万多人。东宁要塞是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战场。

炸弹。人们互相传说着传单。说传单告诉人们，叫日本人投降，中国人要穿黑衣服，朝鲜人穿白衣服以便和日本人区别开。我们立刻把“国防色”即浅草绿色衣服换了。伪满时浅草绿色称之为“国防色”，因为一般用于国防的军用品都用这种颜色。同时居住在市区的汉族、朝鲜族市民无组织的自发的向市郊—兴隆、卡路屯、放牛沟、羊草沟等地疏散，这已经是晚上，电也停了。日本居民，青壮年都被征召入伍，妇女儿童都在机务段前面的西运转货物处乘客车向西撤。因为人多，只允许人乘车，挤得满满的，行李、大包、小包扔得满地都是。这时我们感到形势和 1938 年不同了，那时候除了晚上灯火管制外，别的社会秩序都正常，而现在日本人撤退了，也就是要完蛋了。

我们住在铁路西局宅，位于西七条路—西十条路之间，当时是市的边缘地区，都是铁路员工，很有组织性。大家一商议，决定不向市郊疏散，各家就都搬进防空壕里居住了，开始了五天五夜的防空壕生活。说来也怪，这时邻里之间没有吵嘴骂架的事，大家互相团结。

仅仅一宿的功夫，市里居民就都撤空了。

我同班一个同学，他家往四道疏散，路过铁岭河，看到日军用军用卡车，一车一车地把日本兵往东方前线输送，回来时拉的是日本难民，主要是妇女儿童，日本兵截住往四道疏散的人说：“前边死啦死啦的有”。于是他们又往西边的放牛

沟疏散了。

8 月 12 日开始，日本军队开始放火了，就是说日本人要进行焦土之战了。首先从西局宅附近卖生活必需品的株式会社开始烧起大火，把一些罐头烧得噼噼啪啪地爆炸，太平路上的满洲中央银行、高冈百货商店和最繁华的银座通（现解放路）满街都着起了火，车站也点燃了。

傍晚，最后一架小客机，从西十条路民航机场向西北方向逃去。夜幕降下来，突然砰砰听到爆炸声，紧接着就看到大火球冲天起，有三五十米高的烟

柱，夹杂着大火球然后散成蘑菇云状，很类似以后从电影里看到原子弹爆炸那样。火球光呈现黑红紫色夹杂在黑烟中，看样子是点燃的汽油桶爆炸，一个接着一个。甚是恐怖，人们顿时惊呆了。本来八月夜晚，各种昆虫特别是蟋蟀都在鸣叫的时候。可是这时除了汽油桶爆炸声之外，却静得出奇。人们谁也不出声，面目毫无表情。向市内看去，一片火光，有的日本人把自己的住宅也放火烧了，牡丹江市陷入火海之中。

有一个叫老柯的，他疏散到海浪，日本的军用机场在海浪，海浪军用机场比西十条路民航机场大多了，那里还有军用仓库，我们学生曾到那里去“勤劳奉仕”过（义务劳动）。老柯说，他看到海浪机场全都是大火。起初还以为是苏联飞机炸的，其实，那时苏联飞机夜里倒不来轰炸了。这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了。人们什么也不想，也不想这就是战争，以后还要怎样，会发生什么事情，例如杀人、抢劫、强奸，谁也不知道。

第二天早晨即 8 月 13 日，我们一看民航机场全落架了，飞机库、候机室全烧完了。大街上已经没有人了，偶尔看到日本军用卡车在爱民街（当时叫金铃街）巡逻，驾驶楼上放着机枪，日本兵戴着钢盔。市区基本上没行人了。

黄花铁路东侧，图佳和滨绥铁路相夹的地段人们称之为 261 部队，这是个什么部队呢？这里有粮食仓库，还有机床、磨擦压力机车间，令人奇

怪的是这里还养着猴子、兔子、老鼠。专门有人饲养它们。我一个小学同学就在这里当饲养员。当时市面上根本就没有卖花生的,可是成麻袋的花生却用来饲养这些猴子、兔子、老鼠。1945年“牡高”(牡丹江国民高等学校——伪满四年制中学)和“女高”(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也是四年制中学)四年级学生全部停课,到这里“勤劳奉仕”。由于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日本青壮年都被征召入伍,劳动力极度缺乏,所以日本就抓劳工到煤矿各种工事部门当苦力。学生力所能及的,就叫他们来“勤劳奉仕”,来“勤劳奉仕”的学生们男生干各种体力活,女生给纸袋刷猪血。那时没有塑料袋,据说这是为了用这些刷猪血的纸袋干燥后装粮食。然后送到太平洋扔到被美军封锁的海里,利用海水涨潮的浮力把这些粮食冲到海边,供被围困的日军捡着食用。

还令人不解的是:火车客车从车站开出,经过这地方,即使是白天,也必须把胶布窗帘放下来,车厢打开电灯,过了拉古或者温春之后才允许把车窗帘打开。列车进入牡丹江之前到拉古或温春也必须把窗帘放下来。

261部队除了粮食仓库储粮外,还有堆在场地上的—垛垛的粮垛。每垛都有10米宽,5米高,50米长,全用苫布盖着。日本人也放火把这些粮食烧了。这些粮垛的大火从8月13日烧到12月下雪后才熄灭,中间下雨都没浇灭。

8月13日“勤劳奉仕”的男生就没人管了,他们在261部队住宿,平时有日本兵站岗,女生不住宿回家。这时候学生们就开始逃跑了,我认识一个学生家住在西局宅,不敢回家,怕日本人来抓,就躲在我家的防空壕里,叫我到他家通风报信。其实,日本人已无暇顾及他们了,日本人自己已经保不住了。晚上,铁岭河南山开始出现大红灯—危险警告信号,人们传说苏军到了磨刀石。

从这天开始,苏联的飞机两架、两架地巡航飞行。起初还有些害怕,躲在防空壕里,时间一长,觉得没什么事,于是从防空壕里出来。飞机是在远方飞行,有时看到飞机上机枪扫射的火花,只要飞机不飞到头顶上,也就不钻防空壕了。因为当时还没有喷气式飞机,是螺旋桨式的,所以听到飞机声后再钻防空壕也不迟。我们纳闷的是

为什么一架日本飞机也没有去迎战,日本空军哪去了?

8月14日下午两点左右,突然,一辆日本军用卡车开来,停在我们家的旁边,下来一个日本兵模样的人向南边的飞机场跑去。就在这时候有两架双翼的苏联飞机,机身上明显的红五星标志,降落在飞机场跑道上却没有停下,慢慢地滑走。我站在高处看,估计飞机离我们有500~1000米远。我又看见一个日本兵从南边往北边跑,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忽然听见咔咔清脆的两声枪响,飞机很快就起飞了,从军用卡车开来到苏联飞机降落,到又起飞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事后人们猜想是不是飞机来接谍报人员了?飞机飞走后人们慌张起来了,一辆军用卡车停在眼前,这不是轰炸目标吗?于是人们齐心协力砍苞米秸把卡车盖得严严的伪装起来了,这辆卡车在苏军来了之后,被苏军开走了。之前我从卡车驾驶室里捡到了一条军用毛毯,邻居则把一个预备轮胎搬家去了。

从8月9日开战已六七天了,在防空壕里也过了四五天了,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人们是听天由命了,头几天的恐怖感也淡了,由于西局宅离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仅一街之隔,放火烧的二层楼落架了,胆大的人开始到这些没烧完的仓库拣还没有烧完残留下来的东西。有烧炸了的菠萝、蟹肉、鱼肉罐头。由于伪满日本人实行“经济统制”,这些东西在市面上是绝对买不到的,老百姓物品极度匮乏,施行配给,粮食都不够吃。所以也就不管卫生不卫生了,拣起来就用手抠着吃,我也加入了这行列里来,觉得挺好吃的,还拣了一些拿回家去。于是出现了新词汇“拣洋落”。很快就流传开来了。“拣洋落”是有“瘾”的,越拣胆越大,那时就有“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之说了。

8月15日早晨,我到仓库去看见了还没烧完的砂糖,这可是宝贝,挺高兴。于是我就往面袋子里面装,正在这时候,看见大人们突然往外跑,而且穿过还没着完的落了架的火堆,我抬头一看,一个日本“军曹”(事务长)拿着军刀,嘴里大喊着“八嘎”向我们冲来。成年人们从火堆里窜出去了,我不敢窜火堆,我就迎着日本“军曹”走去,在他面前敬了一个礼:用日语说:兵队先生(日语发音是“黑衣带衣桑”,是日本儿童对日本士兵

的亲切的称呼)对不起……这个日本军曹手横握着军刀用日语骂了一声“滚蛋”,吓得我真可用这个词来表达:抱头鼠窜。经过这一锻炼,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如果那时一刀砍下来,我早就完蛋了。

实际上,这时候日军已经是败军之兵了,在市面上看不见日本军了,苏联已兵临城下,一江之隔了,日本人已不再敢得罪中国百姓了。可是对中国人的“国事犯”、“思想犯”还是下了毒手的。我同学的父亲,就是被日本临退却前从铁岭河监狱里提出来去处决,后来车翻了被砸死了。日本人抓了多少“国事犯”、“思想犯”,又处死了多少,日本政府是不认账的。日本在牡丹江实行焦土战时,把牡丹江的市政档案,如上下水道的图纸都烧毁了,以致战后中国地方政府都弄不清本市的地下管道情况。但日本政府对自己的臣民情况,却充分把握。例如一个中国名叫于贵清的日本遗孤,是1945年在林口县日本军溃败时,他亲生父母把他给了养父母,养母临终前才告诉了他生父的名字,于贵清找到了日本驻华使馆,日本使馆查到了此人,并给于贵清做了基因鉴定,承认了他是日本遗孤。而且按日本政府政策他的中国妻子也算日本国籍,并发放生活费,他的子女,18岁以上者,只能带回一名,它的儿子于志国在牡丹江广播集团做广告工作。日本政府把日本文化厅出版的《为从中国归国者:生活日语》给他寄来,还附有磁带。1999年他父子两人找我学了日语,当时于贵清已经59岁了。

现在把话题谈回来。

8月16日早晨8时左右,听见很强烈的嗡嗡声,抬头看见从东方飞来黑压压一片飞机,我们急忙躲进防空壕内。接着就是突、突、突、突、突、突,这下子,可把全家人都吓坏了,大眼瞪小眼,不知所措,真感觉到似乎世界末日要到了。我父亲平时说他自己是不信鬼神的,而且还领过我哥哥晚上专门到坟地里证明没有鬼。可是这时候吓得连连祷告: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我身上穿的衬衣,随着机枪、机炮、炸弹爆炸形成的气浪而有节奏地煽动着,我们从来没见过这场面,虽然平时也谈论战争。约摸经过半个小时,有点麻木下来,我也不知怎么的,把脑袋探出防空壕口,看见飞机三架、三架地编队,有轰炸机,有战斗机,飞

机机头发发出闪电色的火花,还有机枪、机炮扫射。我不知怎么的,竟然查起飞机架数:一架,两架……查到34架时,我父亲一把把我扯进防空壕里,说:“你不要命了”,我也才反应过来,真是危险。就这样,我们全都在防空壕里傻呆着,到10时左右,扫射声、轰炸声停止了,飞机也飞走了,人们都从防空壕出来,互相庆幸着,还都活着,而且没伤一根汗毛。人们也奇怪,怎么一间民房也没炸毁,一个弹痕也没有。可是却听见子弹嗖、嗖……在头上飞响。有经验的人说这不要紧,子弹离我们很远,如果是扑、扑的声音,那得赶快趴下躲起来。这时有一家住在局宅西部的人说,在西十条路,有500名左右的日本兵集结,日本军官在飞机轰炸下,骑着马,奔跑指挥。战后,我们在261部队前的公路上看到一个炸弹坑,有四、五米深,把公路截成两段。日本兵的尸体在铁路旁仰着。这个地点离我家也就一公里左右。

中午,枪声逐渐平静下来,左邻右舍的人都彷徨着,无所事事。傍晚6点左右,传来话告诉人们都系上红胳膊箍去迎接苏联红军,人们准备了水、黄瓜,抬着到爱民北街,我也跟着。这时看见一队苏军,端着盘盘枪(冲锋枪),这是我头一次看见冲锋枪,而日军则是九九式步枪。比起苏军武器来,日军是全面落后了。一位懂俄语的人领着我们喊“乌拉!乌拉!”我们把苏军当做解放者来欢迎。至此,苏军把牡丹江市彻底占领了,再往西就没人家了。苏军到爱民街头后准备休息。突然从爱民街和另一条街交叉的三角苞米地里射出一黑枪,把一个苏联军官打死了。苏军立刻把这块苞米地包围了。8月17日搜出一个日本兵,让他自己挖个坑,然后叫他把皮靴脱下来,手表摘下来,就把他枪毙了。苏军给他们的军官立了一个碑,这个碑在1950年被他的亲属移走了。

战后,在羊草沟避难的一位说,8月16日那天他查了一下,有200架飞机。

1945年8月16日,我终身难忘,懂得了什么是战争,什么是轰炸,平时那么耀武扬威、“武运长久”、“取得赫赫战果”的“大日本皇军”,一下子“忽啦啦似大厦倾”,真是兵败如山倒!

战后,我从苏军给日本战俘出版的报纸上看到一篇日本在牡丹江战区的司令官清水中将军的谈话。他说,日军准备在林口一带集结6万人民兵

一个被俘志愿军战士的自述

王二根 口述 李文林 整理

1946年春，按照阎锡山推行的兵农合一制度，我与本村（山西忻县忻口村）武温治、刘年根、王润维、王二田等十几个年轻人当了常备兵。当兵后的第二年，我与武温治等四人又被抽调到省政府侍卫队。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我与武温治两人成了解放军62军军直属山炮营的解放军战士。随后我们进军西北、西南，参加了甘肃关山打马鸿逵与四川彭山县半面街剿匪等战斗。

赴朝作战与北汉江被俘

约在1951年的1月间，正是我国抗美援朝

力抵抗苏军，但没有来得及集结，苏军就冲过来了。报上还报道在整个东北战役中，日军伤亡6万人，苏军伤亡1.5万人。有意思的是一个翻译说美国给日本扔了两颗“空中爆雷”。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武器，原来这就是原子弹。

1945年9月2日晚，忽然全市响起步枪、冲锋枪枪声，接着就是满天花火，这时候才知道日本帝国已投降，并且在投降书上签字，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是苏军在庆祝。

直到1979年7月3日《解放军报》转载了苏联军事刊物的一篇文章：苏军进攻牡丹江方向的战斗。我才明白原来1945年8月16那场200架飞机轰炸、扫射是为了掩护苏军渡过牡丹江。该文章把“刺梅果”即青梅村译成“刺梅伙洛”，为此我还给《解放军报》报社写过信。当时苏军从青梅村方向到铁岭河南山，全面强渡牡丹江。苏军出动了大批坦克，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苏军沿着光华街推进，日军凭借桥洞子铁路做屏障在人民公园一带抵抗。战后，我们学生打扫战场时，我看到一个遗留下来的苏军钢盔，一颗子弹正中射透红星。可见战斗多么激烈。中午，苏军占领了

不久的时侯，我们山炮营在四川彭山县合编入60军180师的师直山炮营（营长叫杨银盘，四川人），我在炮一连弹药四排。为了作好赴朝参战的准备，我们部队徒步走到甘肃天水，再坐火车抵达河北省的泊头镇。在此下车后，在一个叫伦敦村（村子的名字可能不确）的小乡村住下来。春节过后，我们改换了全部武器装备（除山炮外，其余皆苏式武器），改换了军装被服，随时准备出发了。

入朝的确切日子记不得了，只记得在3月中旬，正是第四次战役已经打了将近两个多月的时侯。我们在安东下车后，徒步跨过了鸭绿江。由于

已成废墟的火车站，在火车站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战后苏联在车站前修了两座苏军军官墓，有名有姓。以后听说这两座墓被移到北山烈士塔，北山烈士塔两边有两座苏联墓碑就是。现在在铁岭河南山驻军某部院内有座苏军纪念碑，碑文用俄文写着：永久的光荣，给予英雄们，给予坦克手们。

以后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苏联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东北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是在牡丹江进行的。至此，我为牡丹江而自豪了，我经历了那些战斗时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次大规模200架飞机的轰炸是在牡丹江进行的。我们应该向全国，全世界表明这点，趁着我们这些人还活着，二战史研究者、专家、历史学家，应该研究这段历史。

以上，完全是凭个人记忆写的，手头没有任何资料。

（作者为前牡丹江军马场中学离休教师，剥离“企业办社会”后转市第九中学）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第180师不幸落入包围圈,经浴血奋战,仍损失惨重。图为被俘的志愿军指战员。图片采自赵建利、梁育红著《烽火三八线——第五次战役战事报告》(2007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敌人的飞机太猖狂,只能昼伏夜行。三八线以北没有打战。过了三八线,进入南朝鲜,也是昼伏夜战。第五次战役一开始,我们就参战了,我们的任务是插入南北汉江之间消灭敌人。仗打得很艰苦,战士们伤亡不少。我们不仅打过了北汉江,而且接近了南汉江。可就在这个时候,几倍于我们的敌人包围了我们。上级命令北撤,我们山炮营掩护步兵先撤。撤至北汉江的时候,由于敌人占据了渡口,封锁了江面,过江时就有几百战士被水冲走、淹死。不过,总算撤过了北汉江,但一切供给全部中断了,几次冲杀也没有成功。上级又命令我们轻装突围,于是我们把山炮、电台等统统拆开损毁,连牲口也解开放脱,每人只带了一杆枪,分散突围,朝北奔去。某日天明了的时候,就看到了围堵的敌人,已经两三天没有吃东西的我们,再也无法前进了。就这样,一万多人的180师半数当了俘虏。一次被俘这么多人,这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是出了名的。这是1951年5月底的事,也就是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又过了五六天或六七天的时候。几年以后才听说,我们师的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同志带领几十个战士打了一年多的游击后也被俘了。他是志愿军战俘中官职最高的人。据说,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被俘总数

有两万多人,而我们师就占了四分之一。我们师唯有重炮营没有落入敌手,因为重炮是用汽车拉的,从公路上跑脱了,而我们的山炮是牲口拉的,根本跑不脱。另外还听说,我们师540团的二营因故没有参加第二阶段战斗,那么,该营的损失也就不会大了。

在巨济岛战俘营

我们被俘后,先是被临时关到某城一个监狱中,不久又转到釜山,很快就入了敌人设在巨济岛的战俘营,在此熬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战俘被编成六个大队,我在第一大队86铁丝网。伤病员另外编成一个队,由我们侍候照料。我们睡在装过大米的草袋上,四个人一个铺。吃的是扁大米,实际就是压扁了的露仁子大麦,我们忻州人叫露仁草麦。每天两顿饭,一天只给吃一斤,相当于九两多。也有点菜,喝些带鱼汤什么的,总之,谁也吃不饱,个个都是面黄肌瘦的。因为美国还纠集了其他国家的少数军队参战,他们自称什么联合国军,所以,看守我们的兵有加拿大人,菲律宾人,土耳其人,等等,不全是美国人。白天,我们多是呆呆地坐着。坐在帐篷里,可以听见铁丝网外转来转去的宣传车上播出的什么关于战俘的日内瓦公约。出帐篷解手要请假,必须按时返回。每星期都有宗教教育课,什么耶稣教、天主教、佛教。课前发给每人一本小册子。来传教上课的外国牧师、神甫、僧人等都会说中国话,其中一个美国老牧师曾在我国山东住过多年。牧师宣讲时,总要说些什么“你们造了孽,是耶稣拯救了你们。”有时我们被派去做苦工,就是到码头上卸轮船上的货物。遇上卸罐头等食品时,也能撬开吃上些。说实话,只要你规规矩矩,不闹什么事,管理人员并不随便打骂人。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优待俘虏。

然而,这里并不是风平浪静的,而是斗争很激烈,就是那些要到台湾投奔蒋介石投奔所谓中华民国的战俘与我们这些一心想回祖国回大陆的战俘间的斗争。两派战俘背后都有领导,但都在暗中指挥着,不露面,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谁是领导,只是后来在一次两派武斗后,一个原山炮营的排长周荣秀(陕西人)和观察班班长范永清

(山西太谷县城内人)被人家认出来,另外圈起来了,我们这才知道,他们是铁丝网内我们这一派的领导。想到台湾的那一派显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后来才听说,他们里面钻进不少名为战俘实为台湾派进去的特务,怪不得有些人那样猖狂,做反共宣传,还行凶拷问我们。例如,一个任中队长的俘虏(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是江苏或浙江一带人),就相当凶狠,拷打审讯过我们,我怀疑这家伙很可能就是一个真特务,假俘虏。同住在一个帐篷中的战俘谁也不敢公开说自己想回哪里。听说某铁丝网中有一个四川籍的战俘,他想回大陆的心思不知怎的被另一派知道了,竟被活活打死,还把心掏出来示众。由此可以想见,后来大多数的战俘(据说有1.4万多人)之所以到了台湾,回到大陆的只是少数(据说总共6000多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遭另一方的毒打,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当然不能否认,确实有那愿到台湾去的人,这原因很复杂,而俘虏中相当多的人是在解放战争中起义过来的,或者是解放战士,他们的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再加上另一派的反共宣传,就更容易动摇了,这应该是主要原因。也有的老战士是怕回来以后挨整,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问题,也就顺水推舟,选择了到台湾的道路。总之,在巨济岛时,多数人都很悲观,以为不知哪一天要被拉出去,被机枪扫了。

我为什么要“回共产党中国”

我是一个在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咱们解放军里都呆过的人,我就是一个解放战士,但我亲身体会到两个军队是两重天。晋绥军官兵关系就跟猫鼠关系一样,当兵的怕当官的,当官的可以随便打骂当兵的。至于生活,无论是衣服穿戴,还是吃的喝的,兵与官无法相比。但是解放军官兵平等,官不能打兵,当兵的犯了错误,全是用批评教育的方法,用同志们帮助的方法。不仅如此,当官的有什么不对的话,当兵的也可以提出意见,这是晋绥军中绝对见不到的。解放军里,当官的与当兵的吃喝穿戴几乎没有多少差别。那时候,还没有实行什么军衔制,连地方上的官也还是供给制,没有实行薪金制哩。另外,解放军不仅重视对战士的思想教育,还非常重视对战士的文化

教育,尤其是在四川的那一年,抓扫盲抓的特别紧,我这点读书看报的本事,主要还是得益于那一年的扫盲。晋绥军里,谁管你扫盲识字呢。所有这些都深深感动了我,教育了我,深深感到解放军才真正是人民的军队。因此,我一投入解放军,就爱上了这个军队。无论在行军作战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力尽所能,吃苦耐劳,勇敢作战,从不落后,算得上是尖子兵。1949年冬,也就是参加解放军半年多的时间后,我就入了党(时在甘肃)。也就在这一年,在进军四川的途中,又立了甲等功。赴朝之前,我已被提升为副班长了。所以,我是铁了心要回祖国,回大陆的,且不说家里还有我的母亲和妻子、小女,所以,我是拿定了打死也不到台湾去的决心的。

1952年后半年的一天,我们铁丝网内的战俘被叫出来,排成五行。每一行的人逐个走进被指定的一个帐篷(共五个帐篷)。当我进入一个帐篷时,只见对面坐着一个外国人,大概就是中立国的人吧。帐篷里就我们两个人,再无旁人。我一进去,他就问我:“你回哪里呀?”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回中国。”他又问:“回哪个中国?”我坚定地说:“回共产党中国!”就这样简单地问答之后,他很快填了一张卡片交给我。我拿着卡片(卡片上写的是外文,我当然认不得)退出来,门外站着的一个外国人接过我的卡片看了后,领我绕出原住的那个铁丝网,到了另一处地方。这里全是要回大陆的人了。从此,我们就与要到台湾的战俘分隔开了。有一个战俘本心是想要回大陆的,也许在那个问话的篷子里没有回答清楚,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卡片上一定是填着回台湾。当他走出帐篷后,一个外国人要领他返回原住的铁丝网时,他醒悟过来了,哭着闹着怎么也不回去,说是他要回大陆中国。幸好他遇上那个美国老牧师,他哭着向老牧师求情,在老牧师的帮助下,终于为他改了卡片,与我们到了一块。几天后,我们就被运到了朝鲜半岛南端的巨州岛上,而回台湾的仍留在巨济岛上。当我们离开巨济岛经过从前的铁丝网时,我亲眼看见铁丝网内跟我原在一个排的二班某战士噙着泪水看我们,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情——他也是想回大陆的人啊!可是,也有一些战俘向我们挥手喊叫什么:“咱们大陆再见!”言外之意是,他们总要反攻大陆,取得反共

复国的胜利。当然,我们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对他们喊:“咱们台湾再见!”叫他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巨州岛战俘营

巨州岛是第八战俘营,有10个铁丝网,我在2号铁丝网内。我们先住的是帐篷,后来修了铁棚子,就住进了铁棚子内,一个棚子里住几十个人。比起在巨济岛时,这里就自由得多了,铁棚子门上没有守门人了,在自己所住的铁丝网内,可以随便串门了。我们铁丝网里的领导人也露面了,这就是原山炮营后勤处处长彭??(山西人)、连长冯玉林(山西兴县人)和范永清等几人。他们与其他铁丝网的领导也能相互联络,靠的是编好的手势和暗号。究竟巨州岛战俘营中谁是最高领导,我至今也不知道,当时只听说有个什么政委是大领导。在2号铁丝网内,彭??等人公开领导我们活动、斗争,还组织我们识字,学文化,党员还过组织生活。

虽然这里的战俘都是要回大陆的了,但我们的领导人并没有放松警惕,生怕有人用威胁利诱的手段,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改变回国的主意,于是便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组织了纠察队,我都参加了。纠察队分四个班,有40多个人,其任务就是暗中监视那些被怀疑为意志不够坚定的人,特别是在他们被派出去做苦工时,纠察队总要想办法派几个队员一同到工地上做工,悄悄监视他们的行动。

那时候,虽然当兵的大多没文化,有不少人还是文盲,但由于战俘营里人很多,特别是有许多学生兵,所以人才还是不少,有能工巧匠,有会吹拉弹唱的,有懂外文、会说外国话的。有的人用罐头盒做成小号,用其他材料做成胡琴。他们还为我们演出过《白毛女》。那些懂外文的人从捡来的外文报纸上能知道许多新闻,特别是有关停战谈判和谈判战俘问题的新闻,听他们一说,对早日回国就抱有更大的希望了。当我们知道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时,还开过追悼会。1952年的国庆节,1953年的劳动节、青年节、“七一”等节日,我们都搞了庆祝活动,在铁丝网内还举行了游行示威,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等口号。

最使人难忘的还是1952年的国庆。其时,我们从巨济岛来到巨州岛还不久。为了制作国旗,我们将美制雨衣拿到伙房汽油桶上烤热,再搓一搓,就将绿颜色搓掉了,变成了白布,再从医院里弄上红黄药水、药品等东西,将白布染红,再画上黄五角星,就制成了国旗。当我们将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都高兴地跳起来了。我还是负责保卫国旗的呢,所以更是激动。可惜国旗升起之后不一会儿,就被瞭望哨上的兵发现了,于是铁丝网外的守兵要进来干涉,我们顶住门,不让他们进来,还用石头打他们,他们实在没办法了,就扔进毒气弹来,呛得我们要死。对于升了国旗的7号铁丝网,守兵们竟动用了机枪,扫死500多人,跟我原是一个连的张树森同志就是在这次扫射中死去的。即使这样,我们的同志还是宁死不屈,我们的领导更顽强,领导我们绝了三天食,以示抗议。此次国庆事件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外界,国际红十字协会也知道了,曾派人来视察过。事情过后,领导人彭××对我们讲:“同志们,你们说咱们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咱们胜利了!咱们的斗争祖国人民知道了,世界人民也知道了!”

遣返以后

1953年7月底,朝鲜终于停战了。还在停战前的4月份,伤病员就遣返回国了。

8月间,我们从巨州岛坐船到了南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上岸之后,到了那停战谈判的板门店,这里也是交换战俘的地方。一到板门店,我们就把身上的衣服撕烂扔掉(上衣背后印有英文“俘虏”的字样),脱得只留下了裤衩。我们控诉敌人对我们的虐待行为,我们的一些人被记者围起来,记者们一边问,一边记。我们受到前来迎接的志愿军亲人的热情接待,让我们理了发,洗了澡(在战俘营里,我们从来没有洗过澡),换上新军装,第二天就坐上火车,第三天就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我们原炮一连共回来70多人,与我患难与共的本村武温治、本县聂计宝(城南大王村人)等也回来了。

我们先回到东北辽西省(今辽宁省)昌图县金家镇,这里设有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简称“归管处”),在此进行整训学习。整训前,领导作了动

员报告,讲了政策,让我们检查交代,交代被俘后的表现,主要交代有没有变节失密的问题。大多数人都实事求是地作了检查交代。实在说,你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看得见,想隐瞒也不好隐瞒。最后,说是按照“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置”的二十字方针办事,但执行起来却又是另一回事,百分之九十多的党员被取消了党籍,连长以下的人都被安置回了原籍。对于我们的军龄,只承认被俘以前的,战俘营中二年多的时间就不被视作军龄了。对于这样的处理,我们很不服气,提了很多意见。有的同志因为憋着一肚子气,开会时背对会台而坐,但这又管什么用呢?你那战俘营中顽强不屈的斗争,被人家一笔勾销了;人家一说就是:你们比刘胡兰怎样?比狼牙山五壮士怎么样?比这个英雄怎样,比那个烈士怎样,其言外之意就等于说,当了俘虏就不应该活着回来。

在金家镇归管处整整整训了一年。1954年8月,我们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拖着一条不光彩

(上接第92页)三个问题是,皖南事变遭受这么大大损失,固然是蒋介石的罪恶阴谋所致,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是否也有值得总结的教训呢?恕我不揣冒昧,认为还是有点值得商榷。首先是中央对当时国共关系的严重形势估计不足。毛泽东虽讲到“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但又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央确定在皖南取让步政策(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江北)。这一指导思想,不仅影响中央,也影响了新四军。

再就是中共中央对新四军正副军职的配备上,尽管有当时复杂背景的原因,可后来实践证明是不妥的。军长叶挺,是北伐名将,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可这时已为非党;副军长项英,同时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军政委),又是1928年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在主力红军长征后,曾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领导留下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便是以这批红军为骨干而组成、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军主要领导人格局,与共产党其他部队明显不同。加之,叶多次长时间外出,约有一半时间不在军部,更形成以项为主要领

的尾巴回到村里,真是有苦难言啊。在村里,我们这些人也是被上边视作“内控”人员(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所以“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与武温治也是被清查的对象。后来听说,我们师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同志也被开除党籍和军职,安排到一个农场改造思想。每想到吴成德同志的这种可悲可叹的下场时,自己思想上的包袱似乎也轻了一些。

总算老天开眼,“文革”终于被彻底否定了,1980年中央下发了《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的文件,即74号文件,为我们这些人彻底平了反,我与武温治的党籍都恢复了,战俘营里二年多的时间也算作军龄了,这才使我放下背了几十年的包袱,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了。还教我感激的是,从1987年起,国家又对1953年之前(即实行义务兵役制之前)参加过军的解放军战士每年发给生活补助费,使我们老有所养。我衷心感谢党,感谢人民,感谢我们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责任编辑 杨继绳)

导。据李一氓(新四军秘书长)说,开始有段时间中央来的电报提到叶军长名字的次数也较少;1940年春中央有一电报,要项英直接负责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

以上两点,又演化出在北撤路线和星潭镇突围决策中的矛盾和问题。在这两方面,项、叶都发生过意见分歧。结果是前者的意见占了上风。

皖南事变后,有一种看法:如果早在11月份直接渡江,是可以过去的;或者不优柔寡断,下大决心,早走两三天,即使走“迂回线”,也许就能冲过去,因国民党军队也只比我军早到一两天(李一氓语)。还有一种看法:如果军分会不在百户坑开那个长达7小时的争论突围方向会议(后决定原路撤回),因我新三团已打进星潭镇大街,只要增援部队继续打下去,就能从旌德县冲出重围(军参谋处作战科副科长叶超语)。这些意见,我看是有道理的。

感谢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织了一个既能提纲挈领,又能妙笔生花的写作班子,为我们编著出了这部好书。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故事报》的“精神污染”案

高跃男 / 文

《故事报》“精神污染”冤案,开端于1983年秋,至今已经过去27个年头。时至今日,世人只知《故事报》当年发表了淫秽作品,却不知道原来这是一起子虚乌有的冤假错案。分管意识形态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于1994年春做出检讨和道歉。胡乔木虽曾给抚顺市委打了电话,市委也做了详细记录却就是不公布真相,不原原本本地向下传达胡乔木的检讨和道歉。

《故事报》当年由抚顺市群众艺术馆主办。被诬为精神污染时,每期发行量已高达260万份。1983年秋,报纸还在正常运行当中,大祸突然从天而降。

那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市委宣传部打来电话,要编辑部准备好从创刊到最近一期的整套《故事报》,准备两套,分别送市委宣传部和省委书记郭锋处。第二天一上班,市文化局党委书记与几名本局的同志,来到《故事报》编辑部,严肃宣布《故事报》暂时停刊整顿。随后,省委工作组也进驻。

编辑部紧急集合开会。一开始就直奔“主题”:《奉天拆白党》一稿是怎样出笼的?报纸编委、编辑杨尚青介绍:“拆白党”系自然来稿,作者沈阳人,其他情况不详。稿件首先由他审读,提出备用。他在发稿单上签有审读意见,大意是:我们不要过多地刊登现实生活中阴暗面的作品,应注意挖掘一些揭露旧社会黑暗的作品。这篇稿子可考虑刊发,一时尚拿不准,可开个会,大家议一议(大致回忆)。他将稿件签完,就出差到外地着手建立发行站去了。二十多天后,他回到编辑部,《奉天拆白党》已经见报。他还特意找出发稿单,见上面由编辑部主任、主编、支部书记、艺术馆馆长均分别签字:同意。同意尚青意见。同意可以发表。

杨尚青介绍完情况,即建议,将原发稿单调出查验。主编金某在惶惶不安中,从文件柜里拿

出所有稿件档案。经查,所有刊发过的稿件,均一一存档,唯独《奉天拆白党》的发稿单缺失。杨尚青预感问题严重仍紧追不舍,无果。杨继续紧追,要金某作出解释,金嗫嚅着说,这个发稿单丢失,原因我不清楚。稿单上原有签署意见,我记不得。此时,支部书记高凤奎发言说,杨的回忆基本属实。

看看天色已晚,主持会议的原文化局党委书记冯志恩宣布散布。

三十年后,杨、冯均已离休。一天朋友聚会,杨偶遇冯志恩,当年与《故事报》冤假错案有利害关系的金某已过世,胡乔木也逝世,杨便毫无顾忌地向冯问起当年关于“拆白党”发稿单存档不翼而飞的事件,当时为什么正追到关键时候,冯竟突然宣布散会呢?冯说:“当时呀,明镜似的,那发稿单除了金某故意藏匿或销毁,还会有其他别的结论吗?组织上已经心知肚明了,在当时要让他承认这个事实那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他与你不同,出事之后,他非常害怕。他的父亲是被人民政府镇压的,他本人又是摘帽右派。后来艺术馆所以让他担任主编,是因为他对故事比较熟悉、热心。想不到突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他能不紧张吗?”

《故事报》被诬为“精神污染”,起因是上海艺术馆的两个人,给上海《解放日报》写了所谓的揭发检举材料,《解放日报》发了内参。说抚顺《故事报》发表了许多不健康、对读者有毒害的作品。其中有《奉天拆白党》一稿,详实地介绍了旧社会嫖妓的全过程。胡乔木不调查,不调阅涉案作品,就在内参上作了批示:如查实,编辑、作者、发行人员,均应按刑法严肃惩办。

据事后听说,辽宁省委书记郭锋曾打电话询问中央领导人批示以《故事报》为典型反对“精神污染”,有何政治背景,但没有获得确切的消息。郭锋一面打探消息,一面审读已经出版发行过的

几十期《故事报》。审读完毕之后,告诉省委宣传部,并未发现黄色的东西,我看顶多也就有些灰色罢了(大意)。紧接着,重点审读“精神污染”代表作《奉天拆白党》的省、市两级工作组也先后传来消息:“奉天拆白党”非但没有旧社会嫖妓全过程的黄色内容,而且应该说不失为一篇优秀作品。在全部已经出版发行的《故事报》作品中,也未发现有不健康乃至黄色描写的作品。但省委宣传部的一些同志却主观臆测,胡乔木作为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同志,决不会空穴来风,更不会在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轻率地作出如此重要的批示。于是便将抚顺市委宣传部分管报刊出版工作的副部长杜贤书叫去,进行谈话追查,先对其进行“忠诚”教育,然后以勒令的口吻,令杜贤书负责追查、交出有精神污染内容的另一种版本的《故事报》。杜贤书当时对此虽然有些义愤填膺,却也不敢辩驳,另外,他心里也多少有点七上八下,但最后,他还是在省委宣传部同志面前,斩钉截铁地说:“我敢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保证,《故事报》绝对没有第二种版本。绝对没有!”

此时,从中央宣传部来的一位新闻局长到抚顺坐镇。随后,北京新华总社派来两名女记者。在采访完市委书记、宣传部、文化局和《故事报》主编金某等一干人之后,两人又坚持要采访杨尚青。听完杨的采访介绍后,两人与杨热情握手道别。

两记者回京后,新华社对《故事报》“精神污染”事件,并未发表任何文字。

但《辽宁日报》社的一位记者到抚顺采访其他方面的消息,恰遇《故事报》主编金某,金某就主动向其“介绍”,杨尚青有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作品的“背景前科”。因此,《故事报》发表的一些有问题的作品,大部分都经他编发,云云。事后,《辽宁日报》便以《水正落,石欲出》为题,在一版刊出该报记者的采访。称杨有写过“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作品的前科,因此《故事报》有问题的作品大都由他“编发”云云。

第二年春,“污染案”悄悄有些平息。因为查无实据,杨便首先拿起法律武器,将《辽宁日报》采写“水正落,石欲出”的记者告上沈阳中院法庭。法庭虽然接了案,却也觉得无所适从。因为上牵中央、胡乔木,下涉中央辽宁省委的机关报,无

奈只好传当事记者到庭,进行所谓“调解”。

法庭上,该读者表现得非常“谦和”。杨问他,什么是编发?与签发有何区别?又问他,杨写过什么“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发表在何处?该记者一律答以“我有愧”,从不正面答复。并称,他到抚顺原有别的采访任务,只是在某一个场合,偶遇《故事报》主编金某,就顺便采访了他。回到报社,向赵总编进行汇报,总编批示:立即见报。第二天,就在《辽宁日报》头版刊发了。

当时,“文革”刚过,百废待兴,沈阳中级法院对此类案件也感到束手无策。只好调解为当事记者向杨道歉,报纸表态,只能以刊发由杨撰写不涉及《故事报》内容的稿件,以示“平反”。这段事背后还有另一番缘由。

一年前,金某未经编辑部讨论,下聘书将上海《故事会》某主编聘为《故事报》顾问,并邀来抚顺向编辑部讲课。此举遭到以杨某为首的部分人的抵制,可能是此事触发了上海两名告状者。

原来两名告状者均为上海艺术馆上海《故事会》的工作人员。当时上海《故事会》的发行量向上增长,抚顺的《故事报》也长驱直入上海,在上海占有了相当一部分读者。也许是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阵地,先投书《辽宁日报》,并未引起重视。几日后,以杜撰出的所谓“精神污染”的“事实”,向上海《解放日报》投书。胡乔木根据《解放日报》的“内参”,做了“严厉”的批示。

杨尚青在结束了对《辽宁日报》记者的诉讼之后,先后给胡乔木写了三封信,不见只字回复。但抚顺市委从宣传部的三位部长到市委书记刘振华、副书记祁茗田,突然有如走马灯一般,纷纷找杨谈话。有的甚至将杨带至县里或北京进行谈话。有的安抚,有的撇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杨尚青又给中纪委书记陈云写一封申诉信。信发出后的第十一天,杨忽然接到发自北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挂号信件。

杨将中纪委来信及市委宣传部接胡乔木电话记录抄件,一并交当时的市委书记刘振华,要求公开见报,为《故事报》及部分被诬作品平反。并提出,抚顺《故事报》应对上海的两个诬告者进行司法诉讼,要求赔偿,刘振华说:“让我考虑考虑吧!”后刘调任山西省副省长,当然就再无下文了。

胡乔木通过中纪委的复信,声称他并未收到

读《茂林悲歌》

刘谓福 / 文

写史书很难,其中又以写去此不太远的史书尤难。故有“前朝史书后朝修”之说。但是,近日我读到一本跳出这一窠臼的书,即《茂林悲歌——皖南事变全景扫描》(中央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以下简称《茂林悲歌》)。

在皖南事变 70 周年之际,出版这本大手笔、高品位的著作,是对事变中的英烈们的最好纪念。读完这部近 500 页的著作,我的印象是这本书可读、可信、可思。

所谓“可读”,是指皖南事变中,国民党顽固派调集 7 个师的 7 万多重兵,围剿、追杀奉命北撤的新四军军部及其只有 6 个团的部队,后者于极其不利的形势下被迫奋力拼杀、英勇突围,遭受了重大损失,铸成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此书围绕这一鏖战展开,血雨腥风,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气壮山河。因而,有很强的可读性。

《茂林悲歌》对皖南事变中敌我双方的描述,可说是居高把握,精心铺陈,有详有略,俱显功力。你看,顾祝同、上官云相蓄谋策划,调兵遣将,密下战令,严厉督战,对新四军“决予进剿、彻底肃清”,活画出蒋介石的心腹干将、铁杆反共的反动嘴脸和恶毒用心。处于铁壁合围中的新四军官兵,则浴血奋战,辗转突围,有 3000 多名指战员英勇牺牲;而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掩护下,终于有 2000 多人九死一生成功突围,充分展现了这支抗日铁军的英雄本色。上饶集中营中,4000 多名新四军被俘人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施行的饥饿、体罚、酷刑,甚至对我女战士调戏侮辱等,都表现了英勇不屈、大义凛然的气概。狱中临时党支部(小组),还成功地组织了 3 次越狱暴

寄给他的三封信。

半年之后,市委决定《故事报》复刊。组织上决定《故事报》仍由金某任主编。

报纸虽然复刊了,虽然有惊无险,但发稿更小心了,一些稍有锋芒的稿件都被退稿。复刊时

动。所有这些,《茂林悲歌》都写得缜密细致、有声有色、扣人心弦。

所谓“可信”,是说《茂林悲歌》采用的史料比较广泛、全面、严谨、客观,因而所描述的皖南事变这一重大史实是可信的。有道是:史料是历史的生命,首先是占有较全面的史料,然后才是采取正确的研究方法,得出合乎史实的结论。《茂林悲歌》就体裁而言,虽不完全是历史研究论著,但在“全景扫描”中,大凡涉及史料时,也遵循了上述原则。这,就是我说它可信的依据。

《茂林悲歌》围绕两条线展开,一是新四军北撤的具体路线,每一天的行程和遭遇围剿及突围的详细境况;二是国民党重兵对不足万人的新四军机关和部队进行严密合围,步步为营、务求全歼的一系列战斗。同时,披露了中共中央的有关电报指令,以及蒋介石直接指挥这一围剿的凶残电令、“口谕”。还以事实揭露了蒋在事变中间、尔后,一面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公开谎称“已下令撤围”,一面在背后严令顾祝同、上官云相快速“一网打尽,生擒叶(挺)、项(英)”的两面派嘴脸;在事变尚未完全结束的 1 月 17 日,蒋便迫不及待地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赤裸裸地暴露了蒋对新四军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狰狞面孔。

那么,上述史实的史料取自何处呢?一方面是来自突围出来的新四军老战士,包括采访健在的,阅读已去世的所写的回忆录;另一方面是来自国民党高中级将领的回忆文章以及档案资料。后者中有时任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时任上官云相第 32 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武之葵,时任第 40 师少将

只发行不到 3 万份。后来,这些被退稿件,大都被发现刊载在其他故事报刊上。复刊后十余年一直未超过 5 万份。一蹶不振,实在无奈,于 2009 年夏天宣布停刊。(责任编辑 杨继绳)

副师长陈士章,时任第108师648团团长周祖尧等的回忆录;还有蒋介石日记和台湾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中有关皖南事变的内容,等等。

这些史料,虽叙述者的立场、观点有所不同,有些事例也有一定出入,但基本史实是大致相同的。这样,正可从正反两面印证、互为补充,从而增强了《茂林悲歌》的可信度。

所谓“可思”,是指《茂林悲歌》翔实而全面的史料,引发我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明白了不少过去长期萦绕脑海而难以弄清的问题。

我思考、弄清的第一个问题,即蒋介石对这支抗日有功的新四军为何既令其北撤,又在其撤移中借口“违纪”而“决予”围剿、歼灭呢?其根本原因是,新四军的迅猛发展,触动了蒋介石这个独裁者的神经。于是,他定下两手毒计:教你从军部驻地云岭径直渡江北撤——对此“蒋军高级人员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是借(日本鬼子)刀杀人”(陈士章语);你若向东绕苏南再向北撤,我就在皖南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你——其实早在1940年10月顾祝同就奉命“拟定了调兵堵击的计划”(岳星明语)。皖南事变后不久,毛泽东就尖锐地指出:“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毛泽东选集》第三卷918页)这“三个一”中,核心是“一个领袖”。他蒋介石的“一个领袖”的权力、地位是至高无上、不容置喙的。这从实质上讲,就是“朕即国家、即党、即主义”,奉行的是金口玉言,生杀予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无毒不丈夫。这样看,蒋介石置日本鬼子侵占我大量城市、土地于不顾,而从皖苏浙赣四省调集原拟抗日的军队急赴皖南,蓄谋发动皖南变事的隐秘玄机,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问题是,蒋介石既然这样崇尚权力,树立其领袖的绝对权威,那么他在以往和后来的战争中为何老打败仗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是出于一己私利和代表买办封建集团的利益,而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相对立。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等部队则与其完全相反。从此书中可以看到,在新四军撤离云岭时,那种军民难分难舍的鱼水情,还有突围出来的人员所谈路途中许多群众不避艰险,在吃、穿、住、行等方面给予的帮助、解救,

是何等生动,何等感人啊!有鉴于此,才形成在蒋喜形于色地大谈“制裁”新四军胜利、撤销其番号,对他的有关将领、部队论功行赏的喧嚣声中,中共中央公开独自宣布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任命新的军领导人,而且很快新四军有了新的的发展,成为一支更强大的抗日队伍。抗战胜利后,由新四军、八路军等部队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把蒋所统帅的数百万军队打得节节败退,很快逃到台湾孤岛去了。

《茂林悲歌》让我再思考的是关于人性、道德的问题。蒋介石为实现其独裁政治的野心,密谋调兵妄图将新四军9000多人围剿堵击、赶尽杀绝。我认为,这实际上是蒋介石对共产党军队的一次动态大屠杀。这反映在泾县茂林一带,以及随后的上饶集中营。对许多新四军中高级指挥员直至战士,不经任何法庭审讯、判决,就肆意枪杀、活埋,动用酷刑,有的被折磨至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里无视国际公约,根本没有民主、自由、法制,只有疯狂杀戮、道德沦丧、灭绝人性。

书中有一细节,即赶修上饶至重庆的载波电话工程。过去,两地联系多用电报,电话须经泰和、赣州、衡阳、桂林、贵阳等处接转,既慢又不清楚,还易泄密。从1940年秋,顾祝同就严令有关领导人十万火急地限期修建两地间的保密载波电话线,要求每周两次汇报进度,并以“完不成任务要杀头”相威逼。结果,在12月中旬提前完工。自此,“顾祝同多在夜间从家里同蒋介石直接通话”(顾的随从副官徐延辉语)。

由此,我们更有理由断定,皖南事变这一惨烈悲剧,完全是蒋介石一手操纵、导演的。蒋在大会上自我标榜对新四军一向是“隐恶扬善的大家长”,暗底下又指令属下对其大开杀戒。这两者一明一暗,一善一恶,两面一心,相辅相成,都是蒋法西斯独裁政治的专利,他没有也没想通过民主、法制的任何程序。这使我想近期引起我国思想界重视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的一句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回头再看蒋的绝对权力——独裁政治,必然是绝对腐败。而这种毫无人性、违背道德的“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的腐败政权怎能不激起广大群众的反对和讨伐,又怎能不很快走向垮台呢!

《茂林悲歌》让我思考的第(下转第88页)

再谈毛泽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起草者

高放 / 文

贵刊 2009 年 7 月号发表新华社资深记者庄重同志的《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文中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的这篇《敦降书》的“真正作者,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陈其五,而是我本人——庄重”。据我所知,原新华社记者陈其五早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逼迫他尽快投降、交待问题时,就敢于公开申辩。这篇《敦降书》在 1948 年 12 月间就是淮海前线司令部交给他起草上报的。为此他遭到更严厉的批斗。我还查到 1999 年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安徽省志》人物志第 66 卷第 492~493 页。其中写道:陈其五(1914~1984),宣传家,安徽巢县人,1934 年考入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和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 年参加中共,翌年参加新四军,历任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等职,他“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后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对瓦解国民党军起着重要的宣传作用。”我曾依据翔实资料写成《也谈〈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起草者》,发表于《百年潮》2010 年第 4 期。我认为,很可能是当年淮海前线司令部粟裕将军交给陈其五和庄重两人分别起草,最后采用的主要是陈其五的稿子。所以陈其五敢于在“文革”那种险恶的环境中不畏强暴,直言不讳该文是他起草的。可是《毛选》第 4 卷该文的题解却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的一篇广播稿。”建议将来再版《毛选》时,题解最好改为:“这是经毛泽东同志修改的淮海前线新华社记者起草的对杜聿明等劝降书的广播稿。收入本书时标题又作了修改。”

近日又读到贵刊 2010 年第 7 期庄重的《淮海战役日记摘抄》,其中 1948 年 12 月 17 日这一天的日记有这样一段话:“粟裕对我说:‘对杜聿明的口语广播词起草任务,我就交给你了!’这是命令,我欣然接受。我说:‘我又写了一篇《劝杜聿明投降书》。’粟接过稿子连看两遍,说:‘好!合乎

要求,就这样发了吧!’这篇劝降书,当天夜里新华社总社就全文广播了,题目改成《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后边的署名也改了,内容有几处也做了技术性的修改。这是毛主席为我修改审发的第一篇稿子,他改得好。”我认为庄重日记中所说的毛主席当天就把劝降书改为敦降书一事,似乎不准确。我查对了 1948 年 12 月 22 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第 1 版左中位置发表的新华社淮海前线 17 日电:“人民解放军中原和华东两司令部本日发出对杜聿明邱清泉李弥诸国民党将领的劝降书,全文如下。”全部电文只约有 800 字。当时用的就是《劝降书》,直到 1960 年 9 月这份《劝降书》收入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4 卷时,才把标题改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竖排本第 1373 页)。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 四,原则上—稿—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 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来 信 摘 登

《炎黄春秋》编辑部：

感谢贵刊在 2010 年第 10 期上发表了《恐怖的红八月》一文。文中列出各学校被迫害致死的老师时，有一句“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员杨俊被打死，教员郑之万(女)跳楼自杀。”近日得知，郑之万老师健在。她在“红八月”中被剃了头发，但是没有跳楼。我为这个错误非常抱歉。我跟郑之万老师通了电话。我向郑老师道歉，我庆幸她活着，还特别感谢她同意帮助查找“红八月”中在人大附中校园里被打死的一名女人的名字。在《恐怖的红八月》中限于篇幅，我没有写出人大附中红卫兵还打死了至少两名校外的人，其中之一是一名该校高二女生的爷爷、住在北京大学承泽园的孔海银老人(8月29日)，一名是在校中南小楼被打死的所谓“女流氓”。郑老师见到过这个女人还给过她水喝。我真诚希望读者对我的有关文章提出批评和指出错误。调查采访是我的主要研究方法。我在这里再次感谢所有帮助过我做调查和指出过我文章中的错误的人。

王友琴

读完贵刊第 10 期《恐怖的“红八月”》一文。令我无比震惊，也终于解开我心中郁结已久的谜团。

一群天真未琢的中学生，未谙世事的孩子，忽然之间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罪魁祸首当然是“文革”的发动者、组织者。在那红色恐怖的年代，每天都在以“革命”的名义制造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红色 8 月”只是冰山一角！我的同学阿尔丁夫(蒙古族，时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编辑)在复兴门外大街上亲眼目睹，几个女中学生围住一位瘦弱的白发老太太，一阵雨点般拳打脚踢，将老人活活打死，然后扬长而去。当时我任教的辽宁朝阳铁路中学也是一片混乱。历史教师曹希彬，因是上海人，就被打成“上海黑帮”头子，愤而跳楼，含冤而死，年仅 32 岁。1926 年 3 月 18 日，段祺瑞执政府卫队悍然向和平请愿的爱国群众

开枪，当场打死 47 人。鲁迅先生悲愤难抑，写下声讨文章：“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乱如麻”，并称这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准乎此，1966 年 8 月，实为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月！

现在，80 后、90 后的年轻人视“文革”为天方夜谭，简直不可思议。如今，还有一位“老革命”、“老领导”要为“文革”翻案，主张还要搞“文革”，不仅是匪夷所思，而且是倒行逆施。我们今天生活在和谐幸福的新时代，应当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如果搞得不好，“文革”惨剧卷土重来，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读者 王龙章

更 正

2010 年第 9 期第 12 页左栏第 17 行“紫云英号”有误，应为“紫石英号”；第 75 页左栏 21 行“圣约翰女子中学”有误，应为“圣约瑟女子中学”；第 11 期第 19 页左栏倒数 13 行提到的“学习毛泽东，超越毛泽东”有误。王任重只提过“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的口号，后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第 12 期第 36 页左栏提到的“1975 年 1 月邓小平复出后”有误，应为“1973 年”；第 12 期第 43 页右栏倒数第 11 行“中共采用‘围魏救赵’之法”有误，应为“傅采用‘围魏救赵’之法”。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
鸿顺园 528 信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编：102488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图书出版代理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全国300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具有图书期刊发行资质,销售网络覆盖新华书店、卓越网、二渠道等,是一家集出版、印刷、发行、推广一条龙服务型的正规图书出版代理结构。

业务范围:

- 个人出书: 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 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 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 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 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 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 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出版: 音乐出版、戏曲出版、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 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代理发行 版权交易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版类型:

- A类: 国内出版社出版, 国家标准书号, 可在国内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 香港出版社出版, 有正规版权页条形码与标价, 但不能在国内主渠道等发行销售。
- C类: 无书号出版, 用于交流与赠送, 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 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出版价格:

- 1、大32开本: 封面用250克铜版纸, 赠送勒口, 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三千元, 300页出版100本四千元; 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 封面用250克铜版纸, 赠送勒口, 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4千元, 300页出版100本五千元; 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 A类型出版的书, 1000册起印; 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 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 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 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 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 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 每月编辑出版作品近百余部; 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 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 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出版服务热线: 010-58608407 82057551

传 真: 010-586084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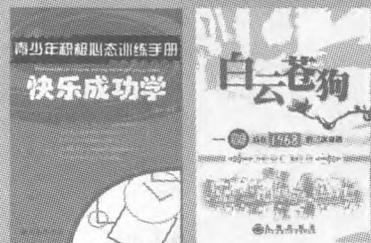
登陆网址: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chubanfaxing.com

公司名称: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 102218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作品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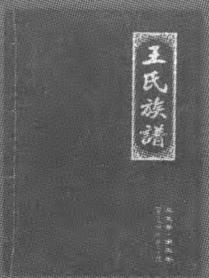
老人出书
历史见证

两千元起编辑出版：回忆录、自传、个人文集！

- 出书范围：**
- 1、个人文集：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回忆自传：革命、受难、创业、怀旧等回忆录、自传。
 - 3、先辈遗文：先辈遗文集、先烈纪念集，家族先贤传、家史档案。
 - 4、家史家谱：家族百年史、家族大事记、家族老照片、家谱族谱等。

基本价格：

“个人文集、回忆录、自传”一般32开本，“家史传记、家谱族谱”一般16开本，封面与照片铜版纸彩印，内文黑白胶印，胶装或线装。二百页出版50本二千元起，设计、排版与加印彩色插页费用另行计算。



家族出书
文化传承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家史传记、家谱族谱！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

相关说明：1、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需办理出版书号的我们编辑、设计制作样书后另行安排。

- 2、出版附赠光盘，需要整理文稿、专题创作或录音摄像的另行协商。
- 3、北京客户上门服务，外地客户来电咨询赠送样书。

服务热线：010—68920114 62525116

编辑接待：北京市海淀区图书城文化步行街25号（大明岛眼镜城）三楼

出版展示：海淀图书城64号（雪芹书画社）二楼大厅 邮编：100080

公司名称：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z.net)

长途免费电话
400 633 2311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11年第**1**期

我看“中国模式”

逃港潮与相关政策变迁

胡乔木词与杭州毁墓拆碑

肥东县大李大队1960年饥荒调查

潘复生晚年一席谈

一个被俘志愿军战士的自述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元